

社会科学类国际交流刊物 ISSN1000-7326

学术研究 2/90

ACADEMIC RESEARCH
Journal For World Exchange

广东省汕头渔业用品进出口公司

“双鱼牌”渔网、渔具，传统名牌，饮誉中外，远销8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量占全国同类产品的75%。哪里有海洋，哪里就有“双鱼”。

总经理：李洪杰 地址：中国广东汕头市南海路24号
电 话：274406 274996 274288 电报：5095汕头
电 传：45420 传 真：86-754-271043 邮 码：515011



脱发者的又一个福音
 广东省韶关市
 皮肤病防治所
 推出科研新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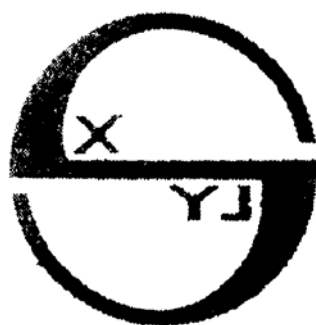
高效毛发生长素

粤卫妆字第05—001号

韶关市皮肤病防治所毛发病研究室医疗咨询服务部，由黄祖迪副主任医师等主诊，专治斑秃、全秃、普秃、脂溢性脱发和各种毛发病，兼治黄褐斑、雀斑、白癜风等，另设美容护肤咨询服务及教学，已收治患者万余例，疗效显著，欢迎垂询。

地址：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南路63号
 电话：80449 72624 邮码：512026





学 术 研 究

编 辑 者 学 术 研 究 编 辑 部
 广州市越秀北路222号
 邮 政 编 码: 510050

出 版 者 广 东 人 民 出 版 社
印 刷 者 广 东 新 华 印 刷 厂
发 行 者 广 东 省 邮 局
订 阅 处 全 国 各 地 邮 局 (所)
国 外 总 发 行 中 国 国 际 图 书 贸 易 总 公 司
国 外 代 号: BN268 北 京 2820 信 箱

代 号: 46—64 国 内 定 价: 每 册 1.50 元

国 内 统 一 刊 号: CN44—1070

ISSN 1000—7326

广 告 经 营 许 可 证 号: 粤 工 商 广 字 01044 号

本 刊 每 逢 双 月 25 日 出 版

弘扬孙中山精神, 团结爱国, 振兴中华

- 在孙中山基金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叶选平(6)
治理开发相结合, 走治山致富之路 郭荣昌(8)

精神文明建设

- 精神文明的内部结构和外部联系 范英(14)
谈人口素质要素及其相互关系 梁明福(18)

哲 学

评陈白沙哲学思想本体论“范畴体系”

- 与章沛同志商榷 刘焜炆(21)

语 言 文 学

论欧阳山的典型观

- 为欧阳山文学生涯65年而作 易 准 陈 衡(26)

文艺的时代性与持久性如何统一

- 以《高干大》为例的局部探究 黄伟宗(33)

四十年来古文字学的新发现与新学问 曾宪通(38)

“贄”、“币”辨 李中生(43)

《封神演义》的阐教和截教考 胡文辉(47)

历 史

魏晋南北朝隋唐经学论略 章权才(51)

洋务运动的批判者——郭嵩焘 吴义雄(55)

矢诚维大局

- 民初黄兴心态一说 王 杰(59)

“翰海”是湖不是山 王廷德(63)

洪宪时梁士诒密电签名是他人所为 陶季邑(67)

稿件主审 张硕城

责任编辑 黄荣显

责任技编 陈沛林

经 济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与隐忧

——兼论香港、东京、新加坡三大金融中心的关系……………何小锋（69）

香港与中国内地的经济联系

……………美国斯坦福国际研究所课题组（林江译）（77）

香港汇率制度变化的前景与可能性选择……………杨杰明（83）

政 治

论舆论监督向权力监督转化……………张继红（88）

学 术 报 导

广东省党校系统讨论加强党政干部学哲学的意义和方法

……………郑俊钦 刘 波（92）

孙中山基金会在中山市成立……………林有能（93）

国务院四部委八学会联合开会研讨山区优化开发综合治理……………谭湛明（94）

姚美良先生约请广东文史学界人士共商纪念中国近代史开端

150周年事宜……………李鸿生（95）

梁士诒功过评说纷纭……………张富强（97）

广东省中国语言学会学术代表团访问澳门……………韦 恩（98）

企 业 之 窗

基层企业党组织如何发挥政治核心作用

——广东韶关第一棉纺织厂的调查

……………黄广保 张硕城 梁桂全 郭基亮（99）

书 评

《辩证逻辑概论》评介……………陈先达 赵总宪（103）

书 海 酌 蠡

“赤县”试释（张剑·20） 释“轻则寡谋，无礼则脱”（雷庆翼·13）

释《离骚》“忽忽”（江林昌·87）

ACADEMIC RESEARCH

NO. 2, 1990

CONTENTS

- Enlarge the Spirit of Dr. Sun Zhongshan Being United and Patriotic
and Developing China Vigorously — A speech at the Inaugural
Meeting of the Foundation of Dr. Sun ZhongshanYe Xuanping (6)
- Combine Harnessing with Developing to Make the Mountain Areas
RichGuo Rongchang (8)
- The Internal Structure and External Links of Spiritual Civilization
..... Fan Ying (14)
- On the Key Elements of Population Quality and Their Interactions
.....Liang Mingfu (18)
- Comment on "the Category System" in Chen Baisha's Philosophical
Ideas of Ontology—to discuss with Mr. Zhang Pei
.....Liu Kunyang (21)
- On Ou Yangshan's View of Typicalness—written for the 65th
Anniversary of Ou Yangshan's Literary Career
..... Yi Zhun & Chen Heng (26)
- How to Approach the Unification of the Times and Lastingness of
Art and Literature—A partial research basing on the novel
"Uncle Gao".....Huang Weizong (33)
- The New Findings and the New Learnings of Chinese Paleography in
the Past 40 Years..... Zeng Xiantong (38)
- A Distinction between "Zhi" and "Bi"—two kinds of gift in
ancient China..... Li Zhongsheng (43)
- A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Religious Schools of "Chan" and "Jie"
in TALES OF GRANTING GODS— (A historical novel written
in Ming dynasty..... Hu Wenhui (47)
- A Brief Comment on the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during the
Time from Wei to Tang Dynasties.....Zhang Quancai (51)
- Guo Songtao, An Opponent of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Wu Yixiong (55)
- Work Sincerely to Maintain the Stability of the Situation—
A viewpoint on Huang Xing's mind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Wang Jie (59)

- "Han Hai" Means Lake, Not Mountain Wang Tingde (63)
- Liang Shiyi's Signatures on Some Secret Telegrams during the Hong-xian Period Were Done by Somebody else.....Tao Jiyi (67)
- The Advantages and Problems of Hong Kong as a Center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an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ree finance centers: Hong Kong, Tokyo and SingaporeHe Xiaofeng (69)
- The Economic Links between Hong Kong and the Interior of ChinaAn International Research Group at Stanford, U.S.A.
(translated by Lin Jiang) (77)
- The Prospects and Active Probabilities of the Exchange Rate System in Hong Kong.....Yang Jieming (83)
- On the Variation of Supervision from Public Opinion to Authoritative BodyZhang Jihong (88)
- The Departments of the Party's Schools in Guangdong Discussed How to Intensify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Cadres' Study of PhilosophyZheng Junqin & Liu Bo (92)
- The Foundation of Sun Zhongshan Has Been Founded in Zhongshan City.....Lin Youleng (93)
- Four Ministries and Commissions under the State Council and Eight Federations of Sciences Discussed How to Develop and Comprehensively Tackle the Mountain Areas.....Tan Zhanming (94)
- Mr. Yao Meiliang Invited the Personalities of Guangdong Literature and History Circles to Consult about the 150 Years' Commemoration of China's Modern History..... Li Hongsheng (95)
- Various Viewpoints on Liang Shiyi's Merits and ShortcomingsZhang Fuqiang (97)
- The Scholars from Chinese Linguistics Federation of Guangdong Visited Macao Recently.....Wei En (98)
- How Should the Party Organizations of the Enterprises at Grass-roots Level Play the Political Core Role—An Investigation on Shaoguan No.1 Mill of Cotton Textiles.....Huang Guangbao, Zhang Shuocheng, Liang Guiquan & Guo Jiliang (99)
- Comment on AN INTRODUCTION TO DIALECTICAL LOGIC Chen Xianda & Zhao Zongxian (103)

弘扬孙中山精神, 团结爱国, 振兴中华

——在孙中山基金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1990年3月11日

叶选平

今天, 在孙中山先生逝世65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之际, 我们怀着对这位伟大的革命家深深崇敬的心情, 聚集在孙中山先生的故乡翠亨村, 隆重举行孙中山基金会成立大会。请让我和大家一起, 向大会致以热烈的祝贺!

孙中山先生诞生在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侵略我国、清王朝统治日益腐朽的年代。当时的中国, 对外丧失主权独立, 对内没有民主自由, 国家极端衰弱, 人民非常困苦, 中华民族濒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就在这个历史关头, 孙中山先生第一个举起民主革命的旗帜, 1894年在夏威夷创建兴中会, 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响亮口号, 进而在广州组织了第一次反清起义。1905年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 提出以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共同纲领。他在极端危难条件下从事推翻封建王朝的革命活动, 奔走于亚洲、美洲、欧洲各地, 集结革命力量, 筹集革命经费, 连续策动了多次武装起义。1911年辛亥革命的胜利, 终于推翻了清朝政府, 废除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 创建了亚洲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制国家——中华民国。随后, 他为着捍卫民主共和制度, 又发动了反对袁世凯独裁专制的

“二次革命”和“护国运动”, 进行了两次“护法”斗争。在重重困难中, 他同帝国主义所支持的大小军阀进行不懈的战斗。到了晚年, 他又积极联合苏俄和中国共产党, 大力扶助工农运动, 为推动革命进程和实现国家统一而奋斗到最后一息。孙中山先生把整个一生都贡献给中华民族解放事业, 不愧为中华民族最杰出的民族英雄和最优秀的代表之一。

孙中山先生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 他善于从世界发展大局中来推动国家的进步。他为了整治中国的贫困落后, 深感必须大力发展实业。民国成立后, 他以更大的精力倾注于国家建设问题, 力主变闭关自守为国门开放, 提出要善于利用和引进外国资金、人材、技术和外国经营管理方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他又制订了《实业计划》, 期望以大工业为中心, 利用外资进行现代化建设。这充分表现了孙中山先生的宏伟气魄和战略眼光。今天, 我们要认真研究和汲取孙中山先生关于实行开放、利用外资建设现代化工业的进步设想, 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坚持改革开放政策, 博采天下之所长, 为我所用, 加速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

孙中山先生十分重视发扬民族精神。

他认为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并不逊于西方，中国的历史悠久、土地辽阔、人口众多尤为别国所不及。他以生为中国人而感到自豪，坚信中华民族是个有希望的民族，只要万众一心，发奋为雄，迎头赶上，就能“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与列强并驾齐驱”。今天，我们要大大发扬孙中山先生这种崇高的爱国精神，加强团结，为振兴中华和全人类的进步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孙中山先生十分重视广大华侨和港澳同胞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重大作用，并且重视国际间的友好交往。他依靠华侨组织革命团体，筹集革命经费，进行革命宣传，赞扬“华侨是革命之母”。辛亥革命后，他号召华侨回国经营实业，认为华侨在国外受新式教育，感受世界最新潮流，掌握最新科学知识，因此必会大大有利于“祖国实业前途之发展”。他还善于争取国际援助，广泛团结国际友人，并把“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作为自己的崇高理想和奋斗目标。孙中山先生不仅是中国的，也是属于全世界的。今天，遵循孙中山先生的遗愿，我们要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广泛开展经济文化交流。中国人民十分珍惜这种友好交往的情谊和成果。

孙中山先生十分重视道德教育，认为一个民族“有了很好的道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他屡屡告诫人们“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他很重视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培养有革命理想的新人，要求“人人应该以服务为目的，不要以夺取为目的”。他襟怀豁达，仁厚谦和；对正义事业坚贞不移，从不计较个人安危得失。孙中山先生虽身居大总统、大元帅高位，但轻车简从，生活俭朴，廉洁奉公，不谋私

利。今天，我们要大力提倡孙中山先生所主张的人人“为国家、为人民、为社会、为世界来服务”的献身精神，进行革命理想和优良品德的教育，努力提高全民族的素质。

孙中山先生的崇高思想和伟大人格是中华民族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对革命和建设理论的创造性探讨，给人们留下了珍贵的思想遗产。孙中山先生是我们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骄傲，他的名字是团结、爱国的象征。今天，一切真正希望中华民族兴旺发达的中国人，不论他居住在什么地方，不管抱持何种政治信仰，都对孙中山先生满怀崇敬之情，都希望看到孙中山先生的爱国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而我们弘扬孙中山先生的爱国精神，广泛团结海内外炎黄子孙，增强民族的凝聚力，为共振中华、同襄统一、促进人类进步事业作出贡献，这也是孙中山基金会设立的宗旨。

承蒙诸位厚爱，聘任我为孙中山基金会名誉会长，我既深引为荣，同时又感到责任的重大。虽然才疏学浅，但对这一件利国利民的事，我一定尽自己的努力，乐助其成。这里，我热切期望海内外各界人士齐心协力，各尽所能，共襄盛举，为实现孙中山基金会的目标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谨祝孙中山基金会成立大会取得成功，基金会的事业兴旺发达！

治理开发相结合 走治山致富之路

郭荣昌

一、广东山区开发治理的概况和成效

广东的国土是“七山一水两分田”。全省有48个山区县，大都分布在粤东的莲花山和粤北的九连山一带地区。这48个山区县的国土面积有11.44万平方公里，占全省的64.3%；耕地面积1554.3万亩，占全省的41.1%；人口2467.1万，占全省的41.6%。从面积和人口来说，山区是广东的大头。山区开发治理情况如何，对全省经济发展关系甚大。因此，如何加快发展山区经济，是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广东山区的潜力在山，优势在山，希望在山，致富在山。从1985年以来，广东省采取了一系列优化山区开发和综合治理的重大措施：1985年作出了十年绿化广东大地的决定，并实施省人大通过的关于治理韩江、北江上游水土流失的议案；1985年底召开了有市（地）、县（区）委和乡（镇）党委书记参加的大型山区工作会议，总结山区致富的经验，纠正一些干部“在山厌山”的错误认识，提出“治山致富”方针，推动了山区的造林种果，促进了山区资源的保护和开发，使广东山区的开发治理工作日益深化，取得了显著成效。

经过四年来的努力，全省共造林5080万亩，种果700万亩，封山育林4239万亩，全省已基本消灭荒山，活立木从1984年的1.38亿立方米增加到1988年的1.93亿立方米，森林覆盖率从1985年的27.7%上升到1988年的41%；城乡节柴改燃率达80%以上，每年节约木柴500多万立方米，砍伐量从1985年的443万立方米减少到1988年的215万立方米，森林资源的年耗量由1985年的1447万立方米降到1988年的800万立方米，同期年生长量由1064万立方米增到1480万立方米，年生长量已超过消耗量600多万立方米。四年来还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093平方公里，其中水土流失最严重的韩江上游已治理1386平方公里，占应治面积的54.2%。同四年前相比，全省的山林版图扩大了，光山秃岭减少了，水土流失减轻了。

生态环境的改善，山区资源的合理开发，为山区经济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据原有43个山区县（总面积10.55万平方公里，总人口2095.6万）的统计，1988年的国民收入达175.63亿元，比1985年（下同）增长92.8%，比全省同期增幅高1.38个百分点；工农业总产值（1980年不变价）达

161.03亿元，增长61.35%，其中工业总产值92.99亿元，增长102.7%，比全省同期增幅低4.63个百分点，农业产值68.04亿元，增长26.14%，比全省同期增幅高0.84个百分点；乡镇企业总收入达91.76亿元，增长220.73%，比全省同期增幅高35.20个百分点；财政收入达8.96亿元，增长85.89%，比全省同期增幅高23.18个百分点；粮食总产659.20万吨，增长4.56%，水果总产61.34万吨，增长199.37%；农村人均收入达608元，增长55.10%。由于山区经济的持续发展，使1985年仍有近400万人口未解决温饱的问题逐步得到解决，到目前为止，已有90%以上可以越过温饱线，全省48个山区县约有1/4的县进入了经济振兴阶段。

可以说，1986年以来的四年，是广东几十年来山区生态环境改善最大的时期，是山区经济发展最旺盛的时期，山区已走上生态、经济良性循环的轨道。

二、把“十年绿化广东大地”当作治理开发的重大工程来抓

实践证明，山区的治理开发关键在于造林绿化，因为它是山区建设不可逾越的基础工作，是最有效的综合治理开发措施。“十年绿化广东大地”就是基于这一认识作出的决策。

过去，许多山区“靠山吃山”，但吃山不养山，多砍少种，甚至光砍不种。结果越砍越穷，越穷越砍，形成恶性循环。森林的大破坏，导致水土流失日益严重，农业生产极不稳定。全省水土流失面积从解放初期的8000多平方公里扩大到1984年的1.2万多平方公里，波及70多个县，许多

山区是“小雨小灾，大雨大灾，无雨旱灾”。水土流失严重的韩江上游山区，“晴天张牙舞爪，雨天头破血流”。水土流失，给农田水利设施和航运事业带来巨大灾难。80年代初期，全省受泥沙危害的山塘水库达850座，河道800多条，江河通航里程从解放初期的1.6万公里减到1.1万公里，珠江流域每年总输泥沙1亿吨，相当于23万亩良田。大量事实说明，林业是“农业之母”，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广东山区要改变落后面貌，必须从改善生态环境入手，狠抓造林绿化和治理水土流失。为此，采取了如下措施：

（一）各级领导带头办造林绿化点。规定省、市、县的党委书记、农委主任、林业局长要亲自办造林绿化点，摸索经验，作出示范，指导面上。同时建立县级领导任期绿化目标责任制，要求五年全部荒山种上树。每年由省组织两次大检查，好的通报表扬、给县委书记晋升工资，差的出示“黄牌”（提醒注意）、通报批评。四年来共有84个市县受表扬（其中有的县受过两次表扬），16位县委书记晋升了一级工资，10个县（区）被提醒注意，1个市受通报批评。由于奖罚严明，促使各级领导亲力亲为，精心组织，有3个头年受批评的县，第二年便得了“奖牌”，只有五六十万人口的荒山大户紫金、丰顺两县，分别一年就高标准造林100万亩。

（二）实行“造、封、管、限、节”并举。就是把造林绿化当作一个系统工程来抓，既开源，又节流，在造林的同时，封山育林，加强管护，限制砍伐，改燃节柴。与此相适应，建立采种育苗、工程造林、护林防火、改燃建灶四支专业队伍；在宣

贯彻《森林法》的同时，围绕护林防火，各县制订具体法规，基层制订乡规民约，务使综合措施落到实处。

(三) 实行科学造林。从选种育苗、备耕整地、栽植管理，直到封山育林和防火、防治病虫害等，都制订统一的规范和标准，严格把关，确保造林质量。全省普遍推行工程造林，四年工程造林总面积达1084万亩（其中速生丰产林287万亩），成活率在90%以上，落实面积达95%，从而改变了“年年造林不见林”的状况。

(四) 多渠道筹集造林资金。采取“七个一点”的办法筹资，即国家支持一点，银行贷给一点，省财政拿出一点，市县财政安排一点，乡镇投资一点，部门支援一点，群众自筹一点。用这个办法每年筹资3亿元左右，四年共筹资10亿元以上，解决了造林资金的困难。

在造林绿化的同时，治理韩江、北江上游的水土流失。治理工作总结过去的教训，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相结合，并且实行“四个转变”，即由过去的集体派工治理转向由农户或联户承包治理；由过去单一、分散治理转向以小流域为单元的综合治理；由过去的单纯治理转向经营开发性治理；由过去的边治边破坏，转向防治并重、治管结合。从而使整治工作搞得比较扎实。四年共治理2098万平方公里，使水土流失最严重的面积减少了一半。在已整治的面积中，建谷坊34110座，拦沙坝6478座，造林135万亩，种经济林果43万亩，种草13万亩，绝大部分工程达到治理标准，水保工程完好率达95%，造林成活率达90%。

实践表明，山区造林绿化，不仅能涵

养水源、保持水土、改良土壤、调节气候、净化大气、美化环境，而且开发了荒山，培育了新的资源，有效地协调了生态与经济的关系，优化了经济开发的条件。造林绿化搞得早搞得好的肇庆市和韶关市，经济建设就一直走在全省山区的前面，水土流失最严重的梅州市，这几年狠抓生态建设，经济发展速度大大加快。许多干部说，造林绿化不仅获得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而且还获得了社会效益尤其是政治效益——焕发了山区人民的斗志，提高了党和政府的威望。

三、合理开发，变资源优势为商品优势

广东地处亚热带，多数山区在北回归线附近，尽管有自然灾害多、交通不便等劣势，但有山地多、气候适宜于发展速生经济林果，以及地下资源丰富，可以发展资源型工业等优势，部分靠近沿海的山区县还有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条件。四年来，各山区县在综合治理的同时，立足本地优势，组织合理开发，努力变资源优势为商品优势。

(一) 兴办绿色企业，发展经济林果。各山区在造林绿化时，因地制宜，长短结合，在发展用材林的同时，大力发展果、药、杂和其他经济林木，并且把它当作企业来办，实行适度规模经营、集约经营和综合经营。这种绿色企业，近几年发展迅速，许多山区县已实现县有万亩片，乡有千亩点，村有百亩场，户有“几小园”。肇庆市9个山区县，四年来已建起松脂、南药、水果、桂树、竹子、木炭六大基地，面积达1400多万亩，占宜林山地总面积的

60%，使山地年平均亩产值从1984年的12元提高到1988年的29元。韶关市各县共兴办了2.9万多个“小五园”和13个万亩连片的农业开发区。梅州市各县已建立起水果、竹子、紫胶、烤烟、茶叶、南药七个商品生产基地，共达1056万亩。

由于山区普遍办了绿色企业，农民有了近期收入，不再靠上山砍树糊口，有效地保护了森林资源。“承包一片山，造好一片林，种好一园果”，已成为山区农民致富的主要途径，吸引不少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也纷纷回家办绿色企业。

(二) 全面开发农业，发展拳头产品。四年来，各山区县结合造林种果，全面开发农业。粮食方面，针对人多田少，中低产田多的状况，大力引进和推广杂优水稻和杂交玉米，努力提高单产。韶关、梅州等市，杂优稻种植面积已占总面积七成以上，促使粮食连年增产。近年来在山区的杂交玉米已种植70多万亩，每亩比常规种植增产50公斤以上。“两杂”的推广，大大缓解了山区粮食短缺的矛盾。畜禽方面，重点开发本地的名牌产品，如新兴县的簕竹镇，在三个专业户的带动下，全镇饲养良种鸡200多万只。

不少山区县还通过统一规划，连片开发，建设具有本地特色的商品生产基地。如梅县有10万亩沙田柚，高州县有16万亩优质荔枝，新兴县有5万亩红江橙，信宜、高要、德庆、阳春四县共有40多万亩南药，英德县有8万亩红茶，饶平县有2万多亩优质名茶，南雄县有10多万亩优质黄烟，还有大埔县的芦笋、新兴县的笋竹，等等。这些产品的开发，促进了加工工业的发展，既富县又富民，大大优化了山区

的产业结构。

(三) 开发地下资源，进一步发挥山区优势。我省山区水电、矿产资源丰富。四年来，我们统筹安排，合理利用，加快了开发速度。小水电方面，近四年建成投产的装机容量共28.38万千瓦，到1988年底，全省小水电装机容量达174.12万千瓦，年发电量49.5亿度，约占全省总发电量的20%，山区有99%的乡、80%的村和85%的农户用上了电。同时有计划地开采稀土、硅铁、锡、锑、锰、煤、石灰石、大理石、花岗岩等资源。另外，新发现优质饮用矿泉水35处，已办厂28间，年产6万吨。许多乡镇和农民，通过采石开矿，很快脱贫致富。

(四) 发展资源型工业，实现加工增值。各山区县在合理开发地上地下资源的同时，根据市场需求，稳步发展系列化加工的龙头企业，大体有五大类：一是林土特产品加工企业，包括造纸厂、纤维板厂、松香厂、油墨厂、竹木家具厂；二是农产品加工企业，包括水果加工厂、葡萄糖厂、缫丝厂、麻纺厂、卷烟厂；三是以矿泉水和果汁为主的饮料厂；四是以石料、矿产为主的建材厂、冶炼厂；五是“三来一补”和“三资”企业。山区资源经过系列加工，产值成倍增长。如广宁县引进葡萄糖、彩色油墨、微粒板和印刷包装四条生产线，年增产值6800万元、税利1300万元；云浮县引进先进石料生产线，办起现代化石料加工企业，带动全县办起中小型建材厂1050家，1988年石料工业产值达1.4亿元、税利3000万元；南雄县引进先进卷烟生产线，使1988年的烟草种植、加工、销售产值达2.2亿元，税利达4000多

万元；罗定县引进价值5000多万美元的9800多台（套）生产设备，办起以服装、麻纺、缫丝为主的外向型加工企业70多家，1988年收入直接加工费200多万美元、间接加工费500多万元人民币，外贸出口创汇3530万美元。这些县的加工企业，资源和技术结合较好，起步较高，产品质量较好，已成为县的经济支柱。

四、加强领导，精心组织， 努力提高治理开发水平

山区的治理开发，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必须加强领导，精心组织，才能提高治理开发的水平。

（一）统一各级领导的认识，确立“治山致富”的指导思想。山区长期贫困落后，原因何在？出路何在？初期，各级领导的认识是有较大分歧的。1985年以前一段时期，有些山区干部只看到山区条件差的一面，没有看到有利的一面，错误地认为，只有走出山门，到沿海地区经商、办企业，才能脱贫致富，结果多数亏损，有的还上当受骗，背了一身债。针对这种情况，广东各级领导引导山区干部分析山区贫困的原因，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并且运用先进典型，不断深化这一教育。近两年来先后推广了高州县开发荒坡种植10多万亩香蕉的经验，广宁、曲江等县集约经营山地和发展资源型工业的经验，推广梅州市综合治理水土流失和始兴等县加强森林管理的经验，从而使“治山致富”逐步深入人心，成为各级领导的自觉行动。

（二）正确处理治理与开发的关系，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单纯治理，缺少近期经济收入，是难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的。因此必须采取治理与开发相结合，兼得生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具体做法是：长短结合，以短养长，立体开发，综合经营，实行“山顶造林种树，山腰种果种竹，山脚种茶种药，山下养鱼放牧”。梅县市治理水土流失，实行林果草牧结合，用牧草养猪，用猪粪种果，用果草促林。这样农民从治理中得到了近期的经济收入，而长期的林业收入也已经看得见，摸得着，从而努力拼搏，耕山不止。

（三）重视科技投入，提高治理开发效益。治理开发是一门科学，它要求人们严格按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否则劳民伤财或事倍功半。对此，我们首先抓科学规划。强调各县要作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摸清本地资源，掌握市场情况，作出扬长避短的开发规划，选准拳头产品和龙头企业。其次，抓良种繁育。从省到市、县和乡镇，层层办良种林果苗圃场，统一供应农户种植，尽量减少杂劣种苗。再次，狠抓关键性的种养加工技术。如造林普遍搞营养器育苗，种果普遍搞嫁接种苗，畜禽业突出抓防疫技术培训推广。

此外，抓科技进山。由省向所有山区县派科技副县长，发动科研部门对口扶助。省科学院在阳山县办点，以综合治理开发石灰岩地区为题，帮助该县全面改良种养业品种，扩种杂交玉米，发展反季节出口蔬菜，使绝大部分贫困户较快地解决了温饱问题，有的已走上致富道路。在各级科研部门的努力下，山区四年来实施“星火计划”189项，投资1亿元，1988年已实现产值1.2亿元，税利3000多万元，全部投产后将实现年产值2.1亿元，税利5000多万元。

(四) 实施优惠政策, 发动部门扶持。为了帮助山区治理开发, 广东自1984年以来, 先后制定6个政策文件, 包括“七五”期间免征贫困乡村农业税和贫困地区乡镇企业所得税; 减少山区木材统购任务和实行木材一家管理、多家经营; 鼓励发展民营采矿; 扶助发展交通运输; 对利用外资和引进紧缺人才给予优惠; 适当增加山区贷款指标; 每年安排造林种果专项资金2000万元, 小水电贷款贴息资金2000万元。同时组织各级各部门对口扶贫。从1987年起, 由省直单位派工作组对口扶助25个比较贫困的山区县, 努力发挥部门优势, 从财力、物力、技术、信息等方面给

予扶助。三年来, 共帮助解决开发资金6亿多元, 上了200多个骨干项目, 大大促进了山区经济的发展。

山区开发治理工作是一项综合的系统工程。山区开发治理好则使其向良性循环方向发展, 这对全省经济的发展有着长远和重大的生态、经济、社会的效果。而且是一项费省效宏的优化工程。同时, 山区开发治理的实施和实现, 又需要社会各行各业给予高度的重视和大力的支援, 只有全党全民真正关心山区之日, 也就是山区振兴到来之时。

作者单位: 中共广东省委

责任编辑: 谭湛明



释“轻则寡谋, 无礼则脱”

雷庆翼

《左传·鲁僖公三十三年》载:“秦师过周北门。左右免胄而下, 超乘者三百乘。王孙满尚幼, 观之, 言于王曰:‘秦师轻而无礼, 必败。轻则寡谋, 无礼则脱, 入险而脱, 又不能谋, 能无败乎?’”一般将“脱”注为“脱略”即粗心大意。按: 脱, 即脱。脱, 《说文》:“消肉臞也。”段注:“此义少有用者, 今俗用为分散遗失之义。分散之义当用脱, 手部脱下曰: 解脱也。”脱, 乃脱, 就是分散、混乱。“无礼则脱”是说不按军礼行事, 组织就会松弛、涣散, 战斗力丧失。此“礼”指军礼, 实际上是一种严格的纪律约束, 也就是军令、军法。《论语·为政》:“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 “礼”

的作用就是“齐”, 用来使人们的行动一致。“秦师轻而无礼”包括两件事: 一是“轻”, 即轻狂骄傲; 一是“无礼”, 即不遵守法规。据《吕氏春秋·悔过篇》:“过天子之城, 宜裹甲束兵, 左右皆下, 以为天子礼。”秦师仅脱去头盔而不戴甲束兵是无礼。“轻”主要指“超乘者”, 即跳跃上车的有三百辆战车之多。轻狂骄傲则不能深谋远虑, 不守法规纪律涣散缺乏战斗力。故下文接着说:“入险而脱, 又不能谋, 能无败乎?”进入险要的骍山, 军队却混乱; 在混乱之时, 又缺乏谋略, 必定要失败。

“书海酌露”责任编辑刘斯翰

精神文明的内部结构和外部联系

范 英

人类文明的总体，逐步地被分割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法制文明、“人种”文明和精神文明等等研究领域。这些领域研究的相对独立化和不断的完善化，标志着人类文明发展的多样性、丰富性和复杂性，也展现着世界文明与人类生活愈益紧密的内在联系。其中，精神文明所涉及的范围相当广阔，内容相当丰富。本文所要探讨的，是精神文明的内部结构与特征，以及精神文明和其他文明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

人类社会精神文明内部结构

一、人类社会的精神文明首先是个系统结构，具有系统性、整体性。

人类社会愈是进步与发展，其精神文明的现象愈是五花八门，五光十色，其精神文明系统结构的内部则愈被人们所认识。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把人类社会的精神文明现象，大体归结为文化、思想和审美等三大现象，也即人类社会精神文明这个系统所具有的三大子系统结构。

所谓文化子系统结构，是由教育、科技、卫生和体育等主要元素的有序排列所组成的结构。其中，教育是科技、卫生和体育得以存在与发展的基础。人类社会没有教育的产生、发展和完善，就不会有相应的科技、卫生和体育的产生、发展和完善。一个社会的教育发展水平和发展状况，决定着该社会的科技、卫生和体育的发展水平和发展状况。文化子系统的排列并不是随意的，而是有其内在的规律和秩序。打乱了这个有序规律，便会出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最终不能解决文化发展问题的现象。

文化子系统是人类社会精神文明进化历程的基石。思想的子系统和审美的子系统一旦离开了它，便什么也不存在。思想系统和审美系统是借助于文化系统构筑而成的两座大厦。正因为如此，我们把文化子系统放在了人类社会精神文明结构的首位。

所谓思想子系统结构，则是由理想、道德、情操和纪律等主要元素的有序排列所组成的结构。在这一子系统结构中，理想处于核心的地位。在阶级社会，它作为社会主体的政治立场和世界观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表现，作为社会主体及其所构成的社会整体对于美好未来的执着追求与向往，有着十分明显的阶级属性。因而制约着社会主体的道德、情操和纪律。生活在一定阶级社会的人们，其理想可以千差万别，但社会整体的理想却是一致的。人类社会最美好的理想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由理想决定的道德、情操和纪律，实际上是理想的延伸和具体化，但各有其相对独立的内容和要求，是理想本身所不能代替的。因此，我们必须研究思想这个子系统结构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共性与特征。

在人类社会精神文明的系统结构中，文化是基石，思想是核心。思想的核心地位不仅决定文化发展的方向，也决定审美发展的方向。抛开思想的核心地位来讲文化建设与审美建设，是我们所坚决反对的。但是，只强调思想建设的核心地位而忽视文化与审美建设的极其重要性，思想建设就有可能落空。因此，在今天，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并贯穿于整个发展过程，各个发展阶段和各个具体环节之中，同时要避免只讲思想建设，轻视文化建设和审美建设的倾向，以便形成思想建设所需要的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氛围，才能充分显示思想建设的生命与活力。

至于审美子系统结构，主要包括审美对象、审美意识和审美欣赏等方面。审美作为人类社会精神文明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比文化、思想等组成部分更远离社会物质经济基础。正因为此，以往广大肌肠碌碌的劳苦大众，仅仅幻想能有一点文化以谋生，就已经不容易，哪里还谈得上在审美这种“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①里驰骋呢？只有彻底推翻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

全体成员的审美观念、审美能力和审美享受，才能从根本压抑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并以思想、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为前提，丰富其审美观念，改善其审美能力，开展其审美享受。因此，审美作为单独一个部分，存在于人类社会精神文明的系统结构之中，是理所当然的事。

在审美子系统中，从广义上说，审美对象是进入人的审美视野并引起人们审美感受的自然、社会生活中美的事物。审美意识是人们在审美活动中对于美的主观反映。而审美欣赏则是审美主体对于客观美的认识。人们的审美观念，是哲学世界观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人们关于审美对象系统化了的审美意识。受审美观念支配，同时借助于文化水平和文化修养，并相互作用于人的一种认识能力，就是审美能力。同一时代的不同个人，审美能力是存在着差别的。这种差别即使阶级社会完结之后，还会继续存在，因此，决定了我们今天的精神生产和精神产品，在正确路线、方针指引下的多样化和多层次性，以适应人们审美享受的不同需要。

人类社会精神文明系统结构的文化、思想和审美，都存在着群体与个体的类别。就是说，群体文化、群体思想、群体审美和个体文化、个体思想、个体审美，是阶级社会长期形成的产物，以致于我们在研究人类社会精神文明结构时，必须作为重要问题而加以重视。所谓群体，是指由某种共同纽带联系起来的人们的集合体。所谓个体，则是指社会生活中认识和实践着的个人。人类社会精神文明结构中所讲的群体与个体，主要是指文化、思想和审美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人们的一定联系和个人的状况。群体文化、思想和审美制约着个体文化、思想和审美，个体只有在集体中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②同时，历史是由相互冲突的每个个人的意志的总的合力创造的，“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③可见，马克思主义者不仅高度重视社会群体问题，也同样对个体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以高度的肯定。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左”的干扰和影响，不敢讲个体发展的社会功能，实际上也就损害了群体发展的个体依托，许多发展群体的正确口号、任务和行为，只能停在半空中，落不到实处。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我们提出要培养“四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人，这是我国社会群体发展求助于个体发展的呼声。因此，个体文化、个体思想和个体审美的综合训练与提高，是发展群体文化、群体思想和群体审美的落脚点。

人类社会精神文明的结构系统是一个整体。要从整体上把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全局，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不断地调节文化、思想和审美建设之间的关系，找到三者综合建设的“度”，以避免片面性。如果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以及由此而展开的理想、道德、情操、纪律等等的主流方面优于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那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文化、审美方面的许多环节则相对地显得薄弱。因此，我们要发扬思想方面的优势，克服文化、审美方面的薄弱环节，才能从整体上改善全体公民的思想素质、文化素质和审美素质，提高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整体水准。

二、人类社会精神文明结构的系统性和整体性，都同开放性分不开。

文明时代愈益发展，其精神文明结构所具的开放性就愈益明显。继承关系的存在，交流关系的存在，利益需要的存在，都使各个阶级社会不仅在物质文明方面带有开放性因素或开放性特征，而且在其他方面，尤其是精神文明方面，也同样如此。所以开放性因素或开放性特征，不是哪一个阶级社会精神文明的“专利”，而是人类社会精神文明共通的一种属性。当然，开放性因素与开放性特征，两者所具有的开放性程度有很大差别，表现形式也不尽相同。同时，我们这里所说的开放性，不仅仅是指对外开放，而且还包含对内的开放。对内的开放包括一定社会条件下，精神文明和其他文明之间的交流碰撞，相互作用和精神文明内部各组成系统的融通转化、相互促进；对外的开放则是指与同类社会制度或异类社会制度之间的文化、思想和审美等方面的相互交往、相互吸收。在中国历史上，同是奴隶制社会的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学术思想和学术交流何其活跃，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交往何其频繁；到了封建社会，仅就儒学出口与宗教进口的事实，便是最好的说明。而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

成了公共的财产。”^④可见，资本主义社会对内对外的开放性程度，是以往阶级社会不可比拟的。说到社会主义国家，一开始便是由产生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的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指导，而且在思想、文化和审美的各个方面，批判继承和有所选择地对待国内外及古今的东西为我所用，其对内对外的开放性特征应当是相当突出的，而且要比任何阶级社会更为自觉，更为积极，更为必要。因此，人类社会精神文明的三个组成部分，都具有对内对外的开放性。

人类社会精神文明和其他文明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

在研究精神文明内部结构的同时，还必须研究精神文明同本文开头所述的其他文明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这是因为，人类社会的精神文明虽然是相对独立的系统，但它不可能离开其他文明而单独存在。我们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逐一考察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辩证关系、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的相互作用、精神文明与法制文明的内在机制、精神文明与“人种”文明的生态效应。从人类社会文明的总体上看，精神文明同其他文明的地位作用是有所区别的。

一、精神文明赖以产生、发展的基础是物质文明。

恩格斯指出：“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⑤这就告诉我们，一定社会的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因此，我们在寻找精神文明的物质属性时，“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象过去那样做得相反。”^⑥固然，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关系是“互为条件、互为目的”的，但这是指它们之间互相制约、互相转化的关系，而不是从精神文明的物质属性，从其产生、发展的物质文明的基础上来解释。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凡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社会，其精神文明就一定是高度完善的。因为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社会，其精神文明是否高度完善，还受许多因素的制约，是不能一概而论的。

二、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发生联系的中介及

主导是政治文明。

政治文明这一概念，是马克思在1844年11月提出来的，^⑦到今天已开始被广泛地使用，主要指的是人类社会中的政治生活、政治关系、政治形式的进步与发展状态，即人们改造社会政治的积极成果。普列汉诺夫认为：一定程度的生产力的发展；由这个程度所决定的人们的社会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这些人的关系所表现的一种社会形式；与这种社会形式相适应的一定的精神状况和道德状况；与这种状况所产生的那些能力、趣味和倾向相一致的宗教、哲学、文学、艺术，便是一定社会内部排列顺序的五个层次。^⑧前两个层次讲的是社会经济基础，后两个层次讲的是社会意识形态，中间层次则是指社会政治形式。也就是说，由一定社会经济基础所决定的物质文明与一定社会意识形态所形成的精神文明，是通过一定社会的政治形式即政治文明而发生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政治文明这种中介作用，在一定社会内部排列顺序的五个层次中，是十分明显的。一定社会的政治文明自身发展的状态，当然取决于该社会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等等的发展状态，但它业经形成，便会主导其他文明发展的方向，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调整得合乎自己的需要，即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需要。物质文明或精神文明一旦在某些方面甚至于全局上不按其愿望行事，而违反了它的旨意，政治文明更要站出来加以干预。因此，一定阶级社会的政治文明既是这个阶级社会的必然产物，也是调节该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使之相互适应的制动器。制动器本身如不完善，其调节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力量便会削弱，甚至失控，并可能引起物质文明建设或精神文明建设在关系上混乱，在内容上片面，在方向上偏离，在社会效果上南辕北辙。所以，把握政治文明的自我完善，加强政治民主的进程，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既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充分发挥，也关系到为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和创造更好的调节与主导的条件。

三、精神文明能够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在于法制文明。

法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以社会为基础，受社会发展，文明总体发展的一般规律所制约。法制文明则是指人类文明大系统中，较之精神文明更晚一些产生，并以精神文明作为最直接的基础，反

映国家法制进化程度和进步状态的标志。也就是说,精神文明是法制文明产生的最直接的条件。没有精神文明的条件,就不会有法制文明的成果。在人尚未从动物界中分离出来之前,在人脑尚未具有思维和认识功能之前,法的观念是子虚乌有的,法制文明也无从谈起。从人类发展史上看,法制文明的起源要后于精神文明,而且是精神文明的产物,这是毫无疑义的。当然,这是仅从精神文明同法制文明两者之间的关系来说的,并非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考察法制文明的起源,这又是必须区别清楚的。若从最终根源上看,不管是精神文明还是法制文明,都是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①所形成的经济发展状况为根基。同时,法制文明对精神文明的促进作用,也非常明显。从这一角度上说,它是保证精神文明能够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在阶级社会中,许多国家的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人治”的局面,即君王个人独裁专制,导致排除异己,唯我独尊,敌视和扼杀科学文化,压制人民的创造精神,泯灭人们的美好追求,甚至给人类社会带来沉重的灾难。因此,它对于“法治”是一个反动。以法治理国家,重视法律的作用,古已有之,但直到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与发展才算达到了较为完全的法治时代,它对资本主义精神文明的长足进步,起了不可磨灭的重大作用。然而,保护资本主义制度,为资本家利益服务的资产阶级的法治文明,将由社会主义的法治文明所代替,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社会主义的法治文明尽管还处于初创阶段,有待长期的健全与完善,但它与资本主义的法治文明有根本性质的区别,将保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能够在社会主义法治的轨道上正常地健康地运转,并形成相互完善、相互适应、共同发展的良性循环。

四、精神文明产生、发展的主体依托是“人种文明”。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社会的生产,主要包括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关于人自身的生产,即人种繁衍方面的生产,及这种生产所引起的人自身的进化水平,在文明社会,便构成人种文明的内涵。人种文明尽管是各种文明的一种综合效应,但它集中地体现在人的文明上面。过去我们较多地研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等方面,却较少研究人种文明的问题,因此,提及人种文明这一概念,有些人便会觉得生疏,甚至

会怀疑这个概念是否科学。这是可以讨论的。其实,任何概念都不是绝对的东西,人种文明这一概念也一样。我们之所以提出这个新的概念,旨在探讨人种繁衍、人自身文明进化的有关规律,特别是与精神文明的紧密关系。一方面,人种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化身。一部人类自身进化发展的历史,也是人类精神文明进化、发展的历史;另一方面,精神文明的许多内容,都要落实在人种文明之中,体现在人自身这一主体之上。也就是说,人种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是相互存在,相互反映,相互沟通,相互转化的。从精神文明的主体依托上说,精神文明必须求助于人种文明的进步,离开了人,离开了人自身的进化,精神文明便会失去依托,失去主体,甚至会回复到人类的蒙昧时代或野蛮时代;从人种文明的发展条件上说,它必须有精神文明的进步,离开了文化、思想和审美等等相应的基础和发展的后劲,人自身素质的提高就会寸步难行。因此,研究人种文明一系列的问题,寻求精神文明与人种文明的生态平衡,是世界性的重大课题,也是人类面临21世纪的重大课题。世界人口大爆炸的危机,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如何提高人口素质所遇到的挑战,都是必须严肃正视的。当然,我们讲人种文明,不是希特勒们那种消灭“劣种民族”的大国种族主义,而是在尊重各民族、各种族的尊严与利益的前提下,达到人自身素质的全面改善与提高。这在社会主义社会,是逐步地具备着条件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4页

② 参见①,第321页

③ 参见①,第479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1、255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4页

⑥ 同⑤,第574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38页

⑧ 参见普列汉诺夫《唯物主义史论丛》

⑨ 同⑤,第574页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科联
责任编辑:周华

谈人口素质要素及其相互关系

梁明福

国家的国力与人口的素质有着密切的关系。国力既体现在经济、军事、科技水平方面，也反映在政治制度和思想道德的进步方面。就是说，国力是综合性的，决定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大方面。而人口是国家最基本的主体的部分。因此国家要有综合强大的国力，必然要求人口具备高度的素质，两者互为因果。因而，全面地提高人口的素质，对一个国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优越的，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无限的发展前景。但现代世界面临越来越激烈的经济竞争，这就要求我们在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大力提高人口各方面的素质，以不断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方能取得竞争的胜利。

“人口素质”是个综合性的概念，它包括文化科学、思想道德、身体素质这样三个重要的因素。身体素质构成人口质量的生物性物质基础，文化科学素质构成人口质量的社会性物质基础，思想道德素质构成人口质量的社会性精神基础。三者又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相互制约。

文化科学素质，是人口素质中极其重要的因素，是人口质量的重要指标。今天，科学技术已成为社会生产力的核心部分，资料统计表明，当代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经济的发展，有60%—80%要靠科学技术的发展，而科学技术是由人来掌握的。科学技术水平和生产力的水平均取决于人的科技文化教育程度，因此，文化科学素质在人口素质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这就要求我们一定要大力发展和搞好教育事业，加速提高人民的文化科学素质。

思想道德素质是人口素质的有机构成部分，同样在人口素质中占有重要地位。人的思想道德

素质问题，实质是塑造什么人的问题。人的精神、意识并不是被动的存在物，它对社会具有极大的反作用。观念的东西虽不能改变世界，但它可以改变人，而人是可以改变世界的。从微观角度说，一个人的思想道德素质不同，其对社会所起的作用也相异。因为人的实践活动，往往受其思想和价值观念的支配。一个有理想、有道德，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德育素质高的人，当能遵守社会主义的道德准则，勇于进取，积极参与社会工作，并能充分发挥所长，对四化作出贡献；反之，思想素质低，就会工作消极，不负责任，斤斤计较个人得失，严重的甚至思想颓丧，沉迷私欲，唯利是图，不顾公德。这样对社会将起负而作用。从宏观角度说，一个国家国民勤奋、刚毅，遵守纪律，把国家、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具有积极献身精神，说明国家充满活力，将向繁荣兴盛发展；国民迷信野蛮，自私懒散，不顾公德，不守法纪，互斗内耗，社会便潜伏动乱因素。这就是文化精神力量的转化作用。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除要建成高度繁荣的经济外，还必须使全体人民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离开了人的良好的德育素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大厦是无法建成的。为此，必须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建设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不断提高我国人口的思想道德水平。

人的身体素质，是从事一切活动的基础。没有健壮的身体素质，是无法适应繁重而紧张的工作的，这充分说明身体素质在人口质量中有不可忽视的地位。这个道理是人人皆知，无须赘述。

说到文化科学素质与思想道德素质的关系，首先要了解文化科学对思想道德的影响和作用。

文化科学具有一种强大的冲击力，因而它对思想道德和观念形态能产生强烈的影响。过去，曾有人提出科学技术与思想道德是对立的，或认为科技进步是以道德的堕落实为代价的。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卢梭曾写道：“随着科学和艺术的完善，我们的灵魂腐化了。……随着科学和艺术之光的增强，美德消失了。”有个别学者还提到，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造成了社会伦理基础的不可挽回的破坏。上述观点显然是片面的，不正确的。它并没有真正反映文化科技与思想道德之间的关系，同时也不符合科学自身的性质。诚然，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确实给人类和社会带来了某些消极的后果。如高度自动化，人在孤独的条件下从事工作，容易造成心理紧张化和人的活动的非个性化，等等。但是，科学更本质的东西则是尊重事实，实事求是。它作为人类对客观世界的主观认识的一种成果，是人类知识的结晶。它不仅为人类带来了高度的物质文明，也促进了人类的思想解放和人们思想道德和心理的理性化和健康化。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历史：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打碎了以上帝为基石的基督教道德观，把人们从愚昧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赫胥黎及他的《进化论与伦理学》，是科学向愚昧道德的又一次进攻。恩格斯说过，上帝在信仰他的自然科学家那里所得到的待遇比在任何地方所得到的都坏。可见，科学的新思想新观念和新技术，是对传统思想、观念和物质文化积淀在内容和形式上的超越和改变，它熔铸了人的理性的逻辑思维方式，形成了求实、创新的社会心理。可以预料，我国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随着文化科学的不断发展和人口文化科学素质的提高，将有力推动人们精神生活的提高，把精神境界提到更高的层次，并培育出一代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人。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得出如下结论：文化科学对思想道德是一种强大的推动力量，人口文化科学素质的提高，可以对人口的思想道德素质的发展与提高起到一种促进作用。同样，从近年社会犯罪案例中我们也可以发现，犯罪者大多文化素质较低，愚昧、愚昧以及非理性心理是犯罪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便从反面证明文化科学对人的素质的重要作用。

人口的文化科学素质与身体素质，关系也很密切。从总体上看，科学技术的进步给人类的健

康带来了福音，对提高人的身体素质提供了优越的条件。例如体育运动可以增强人的身体素质，而体育本身就是一门科学。应用体育医学的研究与推广，无疑将能更好地增强人们的体质；当代医学的发展，使很多曾被认为是不治之症得以制服；营养学的发展，使人们的健康有更大的保障；科学文化可以改善人的心理卫生习惯，以增强体质。文化素质对于优生优育，有着直接关系。一般地说，父母文化程度越高，生育胎数越少；而子女的智力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父母家庭的文化氛围。

说到思想道德素质与文化科学素质的关系，前者可以制约、促进后者。当思想处于愚昧、僵化、保守、封闭的情况下，文化科学的进步必将受到阻碍，人口的文化素质也会受到影响；当思想得到解放，思想觉悟提高的条件下，人的文化科学素质又能够得到提高与发展。拿欧洲的情况说，在中世纪，封建的等级制度和宗教愚昧思想等传统观念的强大力量，使伟大的科学家伽俐略、布鲁诺、哥白尼遭到残酷的迫害，严重阻碍了欧洲人口文化科学素质的提高。到17、18世纪，欧洲思想启蒙运动后，近代科学在欧洲得以传播和发展，欧洲人口的文化科学素质便有了新的提高。过去，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广大人民受到儒教经学的熏陶与影响，思想封闭、保守，缺乏科学证实思维，而读书学习的目的则是为了当官，“学而优则仕”，不重视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因而妨碍了科学技术的进步。19世纪前，中国实际上并没有形成独立的、系统的自然科学理论体系，而技术则停滞在农业和手工业的经验工艺水平上。特别是明代后期和清代，实行闭关锁国政策，顽固坚持“守其所已知，拒其所未闻”的国粹立场，更使科技陷于一片凋零，中国人口的文化科学素质一直很低。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由于旧的传统思想受到批判，人民的思想得到了新的解放，政治觉悟和道德水平不断提高，教育有了很大发展，因而促进了我国人口文化科学素质的不断提高，并在科学技术领域取得了某些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巨大成就。

就个人而言，思想道德素质对于文化科学素质的促进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一个具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而献身，有高度事业心、责任感的人，在当今也必定会自觉地奋发求知，力求用

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武装自己，以真正成为有真才实学的人，对人民作出更大贡献。

从另一方面说，思想道德原则又要求文化科学的力量用于高尚的目的。科学技术工作者如果没有必要的伦理道德素质，仅仅只是纯粹的知识追求和功利要求，完全无视社会的后果和对人类、对未来的责任，不顾人类对自然界无限索取所引起的报复，那么，从理性出发的科学将会失去理性，科学文化的畸形发展将会给人类带来灾难。因此每一个科技工作者都需要遵守社会道德，使自己的工作坚持造福于人类的方向，这就是科学技术发展与人类道德之间的本质关系，也是对科学技术发展的道德制约。

而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对人的身体素质也起作用。从积极方面说，人的生活的目的越明确，胸怀越宽广，对生活充满自信与乐观，情绪与心理更加健康和稳定，这无疑是有利于身体健康的。

综上所述，人口的文化科学、思想道德、身体条件乃是人口中不可分割的三个要素。它们是同时产生作用并互相反馈互相促进互相制约的。当三个因素都有明显提高时，这说明人口素质的全面提高，也必将带来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国力的增强。

作者单位：韶关市社科联

责任编辑：范英



“赤县”试释

张 剑

我国古籍中，中国有许多别称，“赤县”即其一。中国称为“赤县”，由来已久。《谷梁传·桓公五年》：“九州之内名曰赤县。”战国时的《邹子》一书说：“中国名赤县，赤县内自有九州。”但是，中国何以称为“赤县”，似乎缺乏更具体的解释。我认为，“赤县”是指天子帝王所居之“王畿”，即京都，因此用以指称整个中国。试解释如下：

“县”，繁体作“縣”，右旁为“系”，左旁为“首”字的倒形。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言：“縣，繫也。从系持首。”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言：“繫，当作系，引申之则为所系之称。会意。”可见，“县（縣）”字的本义是指“首（首领、首脑）之所系”或“首之所在”，所以古代就把帝王天子所在之京都称为“县”。如《礼记·王畿》说：“（王畿）天子之县内。”“王畿”，就是京都。天子居于京都而统治天下，因此也就把天子称为“县官”。如《史记·绛侯世家》：“庸知其盗买县官器。”司马贞索引解释说：“县官谓天子也。所以谓国家为县官

者，王畿、县内，即国都也。王者官天下，故曰县官也。”这就证明，中国称为“赤县”的“县”，同天子称为“县官”的“县”一样，都是指京都，而不是后来行政区划意义上的县。京都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统治中心，因此用来指称整个国家。所以《广雅·释詁》说：“县，国也”，即取此义。

那么，为何又在“县”字前加个修饰词“赤”呢？我们知道，“赤”就是红色，有光辉明亮的意思，这是我国传统作为吉利祥瑞的色彩。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言：“赤色至明，引申之凡洞然昭著皆曰赤。”万事万物中，最为至明、最洞然昭著的是什么呢？《周易》说：“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而古代常以日月喻指天子帝后，所以天子帝后所居之京都“县”，当然就是吉利祥瑞、圣明昭著的，因而就用象征吉祥至明的“赤”字来修饰，称为“赤县”。

评陈白沙哲学思想本体论“范畴体系”

——与章沛同志商榷

刘焜炆

章沛同志在《关于陈白沙哲学思想的讨论》一文中，是从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来论述陈白沙的本体论“范畴体系”的。第一个方面，是物和心的关系。他说：“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而心是派生的，第二性的，便是唯物主义；相反，则是唯心主义。”^①章沛同志所表述的这个划分“唯物”与“唯心”的公认的标准，当然是对的。当具体地谈到陈白沙的哲学思想时，章沛同志为陈白沙哲学思想的本体论“范畴体系”立了这样一个公式：“道——人——心”，并由此得出结论说：“这里反映了白沙本体论的三个层次，道中有人，人中有心。道是本体的，心是派生的。这就非常明确地说明了，白沙的本体论思想是唯物的，而不是唯心的。”^②第二个方面，是人能否认识道的问题。章沛同志说陈白沙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即人可以认识道。章沛同志最后的结论是：“从白沙对哲学基本问题两个方面的答案，明确地证明了，白沙的哲学本体论思想是属于朴素唯物主义这个类型的。”^③

章沛同志给陈白沙哲学思想概括的这个本体论“范畴体系”，符合陈白沙哲学思想的实际吗？我认为是不符合的。

章沛同志提出的这个本体论“范畴体系”，并不能从整体上、全貌上反映陈白沙的哲学思想。因为它只列出了陈白沙哲学思想中的道与人及心的关系这条线，而没有列出陈白沙哲学思想中的道与天、地、万物的关系的多条线。同时，在道与人的关系这条线中，也只讲到人在道中，心在人中这两个环节，而舍弃了包含在陈白沙“道通于物”的思想中的“道通于心”，也就是“道心合一”的这个极为重要的环节。如果单从道与人及心的关系这条线来看，我们认为还应当有一个环节：

“心——道”。即除“人在道中，心在人中”之外，还有一个“道在心中”。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陈白沙说“道通于物”，即道在天地人万物之中，当然也就包括道在人的心中的思想在内。

也许有人会说：你错了。陈白沙说的是“道通于物”，而不是“道通于心”，你是把“物”和“心”混为一谈了。请不要急于提出这种指责，我讲的多少有些根据。孟子说：“心之官则思。”^④中国古代学者所说的“心”，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人的脑，它是思想的器官。中国古代思想家，有时是在物质形器这个意义上，使用“心”这个概念的。陈白沙说：“心乎，其此一元之所舍乎！”“诚在人何所？具于一心耳。”便是在视心为物质形器的意义上，使用“心”这个概念。陈白沙说：“状之以天则遗地，状之以地则遗人，物不足状也。”这里，也是把“人”作为“物”的一种来看待的。而当讲到“人”时，陈白沙又说：“除了此心此理，便无可贵。”人虽有“七尺之躯”，那不过是“一包脓血”，是受“心”的主宰的。在陈白沙那里，“人”和“人心”本是同义语。因此，可以说“道通于物”包含着“道通于人”，亦即“道通于心”的内涵。这是符合陈白沙的原意的。

“道通于物”，展示了陈白沙的“道”的两重性，即既有客观性，又有主观性。就无心的物，即天地万物而言，道自然不在心中，因为那里没有心。从这个角度看，陈白沙的“道”具有客观性。就有心的物，即人而言，道便在人的心中。从这个角度看，陈白沙的“道”具有主观性。这里，需要特别加以说明的是，我们在章沛同志的本体论“范畴体系”中加上“心——道”，即“道在心中”这个环节，是从陈白沙的“道通于物”直接得出的结论，而不是章沛同志所说的，原先是道心分

立，经过涵养的功夫，道才进入人的心中。

为了对这个问题作更深入的探讨，我们就章沛同志作为论据的下面几条陈白沙语录，逐一进行具体分析。这些语录，都是章沛同志多次引用过的，恕不一一注明出处。

先看陈白沙的这条语录：“天得之为天，地得之为地，人得之为人。”孤立地、单从字面上去看这几句话，似乎陈白沙的意思是说道在天外，道在地外，道在人外，天地人都要从外面取得道，才成其为天，才成其为地，才成其为人。但是，如果我们把这几句话与陈白沙的“道通于物”的思想联系起来看，对它的正确理解，就不应当是道在天外，道在地外，道在人外，而是天有道故成其为天，地有道故成其为地，人有道故成其为人。余此类推，甲有道故成其为甲，乙有道故成其为乙，万物有道故成其为万物。陈白沙说：“一枝自有一乾坤。”^⑥陈白沙常将天地人万物并举，按照这句话的逻辑推理，也可以说“一人自有一乾坤”，而“心”是人的主宰，当然也就是“一心自有一乾坤”了。如果把“天得之为天，……”这条语录与陈白沙的“道通于物”联系起来看，就不难理解，陈白沙在这里所讲的“得之”，是已经有了的意思，并非尚待从外面得到的意思。也就是说，道本来就在天中，道本来就在地中，道本来就在人中，余此类推，道本来就在万物之中。

对于陈白沙的“道通于物”，章沛同志曾经有过很好的解释：道“即物而在”，^⑦并且非常赞赏湛甘泉的道“不离形器”的说法。^⑧但是，他为了肯定陈白沙哲学思想以道心分立为前提，在提出本体论“范畴体系”时，竟将陈白沙的“道通于物”、“不离形器”这一重要思想舍弃了。看来，孤立地从“得之”两个字上去下功夫，并把它理解为只有“得之”才成为什么什么，由此而得出道与物分立（用在人身上，就是道心分离）的结论，并不符合陈白沙的原意。

章沛同志在论到“道通于物”的“通”字时，认为吕振羽把这个“通”字解释为“支配”，是没有根据的。他提出了两点自己的解释：一是“贯通”，即所谓“穿纽”；二是“相通”，“往来不穷谓之通”，“推而行之谓之通”。他又说：“推不是推动支配，而是往来不绝，迭相代替”，如“日月相推而明生焉”，“没有支配的意义”。^⑨章沛同志对“通”字作了许多考证，但是与此同时，他却对湛甘泉的“不离于形器”的说法推崇备至，誉之为

“很精辟”的解释。请问：这“不离于形器”，不就是说道在物中吗？它何尝有从外面得到的意思呢？又请问：这道和物既然是不可分离的，那么，它们又如何“往来不穷”、“迭相代替”，如“日月相推”的呢？章沛同志的考证，和陈白沙的“道通于物”，显然对不上号，是经不起推敲的，离题的，是和他肯定过的湛甘泉的解释相矛盾的。

再看陈白沙的另一条语录：“道至大，天地亦至大，天地与道若可相侔矣。然以天地而视道，则道为天地之本，以道视天地，则天地者太仓之一粟，沧海之一勺耳，曾足与道侔哉。”这段话，很明显是就道和天地所辖范围的大小而言的，而不是就道的所在而言的。说道大于天地，并不等于说道在天地之外。陈白沙说：“物囿于形，道通于物。”前一句说的是物有局限，而不像道那么无限，即道大于物；后一句说的是道虽然大于物，但它却包含在天地人万物之中。天地万物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无心的物，一类是有心的物。就人以外的天地万物来说，道当然不在心中，因为除人以外，天地万物都是无心的（心即脑，动物有脑，但那个脑不会思考，与会思考的人脑是不一样的）；但是，就人来说，道通于物，当然就是在人的心中，因为人的心是会思考的。我们认为，只有将“道至大”与“道通于物”两句话联系起来理解，才算是完整地、如实地理解了陈白沙哲学思想的全貌。

再看陈白沙的第三条语录：“天自信天，地自信地，吾自信吾，自动自静，自阖自辟，自舒自卷，甲不向乙供，乙不待甲赐，牛自为牛，马自为马。”章沛同志在解释这条语录时说：它表明陈白沙认为宇宙万物，是“自然而然的”关系。^⑩我们认为，问题讲到这里为止是不够的，还需要进一步问，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自然而然的的关系？首先，这段话说的是，世界上的万物，都是独立而存在的。道虽然是共有的，但都不是从外面取得的，“甲不向乙供，乙不待甲赐”，是本身固然的。其次，陈白沙在这段话里，把有心的人和无心的自然分开，说“吾自信吾”。这“吾”，就是有心的人。这个有心的人同样是独立存在的，他自然而然地有自己心中的道，而不需要从外面取得。由此我们便可以再次看到，陈白沙的“道通于物”明显地包含着“道通于人”的思想。“吾自信吾”，道就在“吾”（即“人”）的心中，它不需

要自身以外的任何事物的“供”或“赐”。

再看陈白沙的第四条语录：“天道至无心，比其著于两间者，千怪万状，不复有可及，至巧矣，皆一元之所为。圣道至无意，比其形于功业者，神妙莫测，不复有可加，亦至巧矣，然皆一心之所致。心乎，其此一元之所舍乎。”章沛同志说，陈白沙单举天时，指的是宇宙，而非指天地的天。这其实是对陈白沙这段话的误解。试问：如果这里的“天道”说的是宇宙之道，那么，照“人与乾坤本是三”的思想逻辑，这个宇宙之道就已经包括了圣道（即“人道”）在内，陈白沙又何必在说过“天道”之后又说“圣道”呢？这里说的“圣道”，就是圣人之道；这里说的“天道”，就是“天地”那个“天”之道。你看，他不是说天道“著于两间”吗？“两间”者，天地之间之谓也。当他说到“圣道”时，又说是“形于功业”；“形于功业”者，成于人世之间之谓也。陈白沙将“天道”与“圣道”并举，一是讲天地自然的事，一是讲人间社会的事。前一个“道”，是“一元之所为”，也就是“天得之为天”那个“道”（“著于两间”囊括着“地得之为地”的那个“道”）；后一个“道”，是“一心之所致”，也就是“人得之为人”的那个“道”。陈白沙把“至无心”的“一元之所为”的天道与“至无意”的“一心之所致”的圣道结合起来，得出“心乎，其此一元之所舍乎”，即道就在圣人心中结论。这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陈白沙的道的客观性和主观性，而且可以看到陈白沙的“道”的客观性和主观性的统一。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天得之那个“道”或圣人得之那个“道”，都是宇宙之道。陈白沙说“天道至无心”，“圣道至无意”，表明这个宇宙之道无论在天那里或在圣人那里，都是自然而然合一的，并不是说只有在天那里才是自然合一的，而在圣人那里，却需要特别涵养的功夫，才能合一。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陈白沙的“道通于物”的思想，包含着“道通于人”、“道通于心”的思想。章沛同志在论到陈白沙的“心乎，其此一元之所舍乎”时，将这句话所表明的“道心合一”思想，划到他的涵养论“范畴体系”的第三阶段，即经过涵养才能达到的“道心合一”阶段去。但是我们从陈白沙的这段话里，实在看不到圣道的出现，曾经经历过涵养的过程。陈白沙说“圣道至无意”，章沛同志也说：“圣道至无意，即没有目的和意志，是自然而然的。”^⑩既然如此，那又何须

横插一个“涵养得道”这样一个中间环节呢？

章沛同志在“圣人得道”这个问题上，有些前后不一、相当混乱而又十分奇怪的讲法，很值得提出来一谈。

其一，章沛同志一面说圣道是“自然而然”的，一面有时又用“涵养得道后的圣人”^⑪这样的提法。既然圣人也需要经过涵养才能得道，那圣道就不是自然而然的了。这是章沛同志的自相矛盾之处。

其二，章沛同志说：“‘圣人’是什么呢？就是‘得道的人’。这个‘人’的范畴和‘天地人’的‘人’的范畴是不同的。天地人的‘人’这个范畴是概括整个人类的，而圣人的‘人’这个范畴则指的是‘得道的个人’。”并且特别强调：“这个区别是非常重要的。”^⑫这就奇了！“天地人”的“人”和得道的“个人”，有什么不同呢？难道得道的“个人”不是“人”么？照章沛同志的说法，那么，陈白沙说的“天得之为天，地得之为地，人得之为人”的那个“人”，也只能是人类的“人”，而不是“个人”，这就不禁使人要问：离开了“个人”得道，人类的“人”如何得道？而陈白沙讲了那么多“会此”、“得之”，究竟是就人类而言呢，抑或是就“个人”而言？恐怕章沛同志自己也说不清楚。

其三，章沛同志新近的文章在引证了陈白沙的“君子所得者有如此，则天地之始，吾之始也，……”和“此理干涉至大，……会此则天地我立，……”这两段话以后说：“请注意，白沙在这里，都说是‘君子’、‘吾’、‘我’，即‘个人’，而不是直接说的‘心’。”据此，他又说：“总之，圣人是得道的个人，不是‘心’。”^⑬这就越发令人不可理解了。请问：“君子”、“吾”、“我”等个人的得道，不是他们的“心”得道，难道还是他们的其他生理器官得道么？如果这个见解能够成立，那么，对陈白沙的“心乎，其此一元之所舍乎”，章沛同志将作何解释？章沛同志制造“人得道而不是‘心’得道”这样奇怪的逻辑，其实对于他的整个理论体系也是很不利的。既然得道不是“心”得道，那么，他费了许多力气反复证明的陈白沙哲学的心反映道的反映论见解，便从根本上失去了依据；而所谓的陈白沙“开心学的先河”，便纯属于虚乌有。

但是，话又说回来，章沛同志虽然毫无惋惜地说他“多用了‘心’这个词”，^⑭然而他也并不完全否认个人得道就是个人的心得道的观点。请看他为陈白沙概括的涵养论“范畴体系”三段式的第三

阶段，原先的提法是“道心合一”，现在的提法是“道我(心)合一”。^⑩虽然他把“心”字换成了“我”字，但是仍然没有完全丢掉“心”字，而把它附在“我”字的后面。可见，他仍然认为得道是人的“心”，而不止于“人”。

在圣人得道的问题上，章沛同志如此前后不一，左右失据，叫人说什么好呢！

末了，我们还有必要看看陈白沙的第五条语录：“或曰，道可状乎？曰，不可。……曰，道不可以状，亦可物乎？曰，不可。物囿于形，道通于物，……状之以天则遗地，状之以地则遗人，物不足状也。”接着这个“道不可状”，陈白沙又说：“曰，道终不可状欤？曰，有其方则可。举一隅以括其三隅，状道之方也；据一隅而反其三隅，按状之术也。”应当指出的是，陈白沙的这些话，说的是认识道的方法问题，而不是道可不可以认识的问题。章沛同志把这些话列入他的本体论“范畴体系”的第二个方面予以论述，并不切合这些话的原意。陈白沙认为道是可以认识的，对这一点，我们没有怀疑。其实，章沛同志也没有必要花大的力气来证明陈白沙的这一点，因为陈白沙既然讲了许多关于道的话，说它如何如何，那当然表明他对道有认识，同时也就证明道是可以认识的。为什么说陈白沙在这段话里讲的只是认识道的方法问题，而不是道可不可以认识的问题呢？因为陈白沙明明说“有其方则可”，即方法对头，便可以认识；方法不对头，便不能认识。

现在，就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段话。

陈白沙先是说“道不可以状”。状者，形状之谓也。就是说道不可以用形状来表示。接着他又说“道不可物”，即道不可以用具体事物来比拟，因为“物囿于形”。“状之以天则遗地，状之以地则遗人”，这句话的意思，当然不止于说天地人不足以状道，而是说万物都不足以状道。然而，道又是通于物的，天地万物有了它才成其为天地万物，即天有了它才成其为天，地有了它才成其为地，人有了它才成其为人，万物有了它才成其为万物；因此，它又是万物的主宰。（在这个问题上，吕振羽的解释是完全正确的。）既然“道不可物”，而“物”又必须有了它才成其为“物”，难道我们能够说这个不能由天地万物的物质实体得到证明，而又主宰着天地万物的道，会据有物质性吗？不是道依赖于物质实体而存在，而是物质实体依赖于道而存在，说这个道不可能具有物质性，

而只能是物质实体的冥冥中的主宰，不是更切合陈白沙的原意吗！

陈白沙在直接讲到道的本身时，说“道超形气元无一”，说“浑沦本无物”，说的就是这个“不可以物”的道。这个“不可以物”的道，表现在自然界，就是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那个道家之“道”；表现在人身上，就是心中无物，即无欲，就是陈白沙说的“后之学孔氏者，则曰一为要。一者，无欲也”那个儒家之“道”。

现在，我们就陈白沙讲到“道”本身的这两句话，再作进一步的考察。

章沛同志新近发表的文章，重申了他在专著中所表述过的见解，即陈白沙在前一句话里说的“无一”就是“无极”，这个“无极”就是第二句话中所说的“浑沦”，“浑沦”就是陈白沙的“道”。根据古书上的解释，所谓“浑沦”，就是“气形质具而未分离”。^⑪据此，章沛同志得出陈白沙的“道”具有物质性的结论。

现在，我们要问，这个“气形质具而未分离”的浑沦，到底是“物”呢，还是“非物”？如果是“物”，那么，陈白沙说“物不足以状道”，他是不可能用浑沦这个“物”来说明“道”的。如果是“非物”，那么，所谓陈白沙的“道”具有物质性，又从何而来呢？中国古代哲学家，一般都公认浑沦是一种最原始的物质状态。看来，章沛同志也是想从这个意义上去证明陈白沙的道的物质性。然而，陈白沙说“道不可物”。章沛同志想借浑沦之为“物”而证明陈白沙的道具有物质性，岂不是和陈白沙的“道不可物”的思想直接相冲突吗？章沛同志花了很大的气力，在概念上绕了很多弯子，力图证明陈白沙的“道”具有物质性，从而肯定陈白沙是“唯物主义者”。所有这些努力，在陈白沙的“道不可物”四个字面前，显得多么的徒劳无功！

章沛同志坚持要将“无一”解为“无极”，然后往“浑沦”身上挂钩，这对于他的理论结论，毫无裨益，已如上述。那么，到底应该怎样理解陈白沙的这两句哲学语言呢？我们认为，“道超形气元无一”，是说道在开始的时候，什么东西都没有，即“无”。“浑沦本无物”，是说浑沦本原于没有任何东西，也是“无”。两句话说的是同一个意思。陈白沙又说：“道为天地之本”。将这里的“本”字和“浑沦本无物”的“本”字对照来看，不难理解，它并非本体之“本”，而是本原之“本”，即这个不依赖于物质实体而存在的原始的道，具有世

界本原的性质。

然而，无论是客观性的老子的“无物”之道，还是主观性的儒家的“无欲”之道，陈白沙认为都是可以认识的。认识的方法，就是举一隅而反其三隅。怎样才能做到举一反三呢？既然物不足以状道，那么，人只能从内心去认识道。用陈白沙的话来说，就是“心得而存之”。那么，怎样才能心有所得呢？按陈白沙的意思，就是心中“无欲”，“去耳目支离之用，全虚圆不测之神”，“求诸身”，“求诸心”。先从“无欲”的心中得道，然后由此举一反三，就可以认识宇宙之道了。

陈白沙在谈到认识道的方法时，虽然也说过“不离日用”，但那不过是应付别人批评他“近于禅”而作的补救措施。按“物不足状道”的基本原则，陈白沙是不会主张从心外得道的。所谓实践反映论，实在是与陈白沙的思想逻辑背道而驰。陈白沙还说过道可以“随处体认”之类的话，但那也不会是从客观事物中去“体认”，而是说要随时注意内省的功夫。否则，陈白沙就不会立志做隐者了。他还说“举目如见之，何必穷扶摇”，那也只是说好像见到罢了。“道不可物”，陈白沙认为从“物”中是不能见道的，因此他只能在想像中见道，这就是“如见之”的真意。什么直观唯物主义，在这里也无从谈起。

章沛同志时将陈白沙与古希腊哲学家泰利士相比，认为陈白沙与泰利士有相类似之处。他说，“泰利士认为，客观宇宙是由‘水’构成的，‘水’便是泰利士哲学的本体”，因此，人们认为泰利士是唯物主义者。而陈白沙则以“道”为世界的本体，这个“道”又具有物质性，因此，陈白沙也是唯物主义者。^①

不比则已，这一比，倒使我们更加看清楚陈白沙非但不是唯物主义者，而且恰恰相反，是与泰利士相反的唯心主义者。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泰利士那里，是以“水”这个物质实体，为世界本体的。这样的“本体”，可以从具体物质实体

“水”上得到证明，说它具有物质性，当然是对的。因此，人们认为泰利士是唯物主义者。然而，陈白沙的“道”，以什么物质实体作依据呢？没有。他说任何物质实体，都不足以言道，都不足以状道，这岂不是和泰利士的哲学刚刚相反么！章沛同志说陈白沙的“道”具有物质性，然而世界上真的会有不依赖于物质实体而存在的物质性吗？这样的“物质性”，实在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最后要说的是，经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看出陈白沙哲学思想本体论的唯心主义性质。如果一定要和西洋哲学相比附的话，那么，也许可以这样说：陈白沙的“道”，就客观世界来说，相当于西洋哲学的“绝对精神”，具有客观唯心主义性质；就人的主观世界来说，相当于西洋哲学的“内在论”（“唯我论”的一个流派），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表述：前者，叫做“上帝创造万物”；后者，叫做“上帝在人的心中”。

对章沛同志关于陈白沙的涵养论“范畴体系”的公式，我们将在适当时候加以评议，这里不另。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 见章沛：《关于陈白沙哲学思想的讨论》，载《广东社会科学》1988年第4期。

④ 见《孟子·告子上》。

⑤ 《白沙子全集·诗》。

⑥ 见章沛：《陈白沙哲学思想研究》，第48页。

⑦ 同上，第47页。

⑧ 同上，第46页。

作者单位：广东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范英



论欧阳山的典型观

——为欧阳山文学生涯六十五年而作

易准 陈衡

《欧阳山文集》（10卷本）出版了。作者在《文集·自序》中说，他毕生追求两个目标：“一个是典型性格的问题，一个是民族化、大众化的问题”。本文着重整理他的典型观。

一、欧阳山典型观的发展脉络

尽管欧阳山没有写过典型论的专著，但从散见在他的论著中有关典型问题的论述，联系他的创作实践，可以看出欧阳山典型观的发展脉络及其发展的阶段性。

（一）欧阳山典型观的孕育期（1924—1930）

欧阳山是在“五四”运动的浪峰刚过，大革命春潮初起时开始文学创作的。从1924年发表第一篇小说《那一夜》到1930年，可以看作是欧阳山典型观的孕育时期。

这个时期，欧阳山“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眼睛观察世界”（文集8页），在创作思想上接受了各种文学思潮的影响，既有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创作思潮，也有“为人生而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主张。有着童年和少年时的苦难生活、坎坷的经历的欧阳山，面

对着多灾多难的时代和人民，在思想上找不到出路，但又不甘屈从命运，于是便如当时许多作家一样举起个性解放的旗帜，向黑暗势力冲决。初涉文坛的欧阳山，不善于提炼和概括，就追求与自然状态的生活“相似”的真实，同时下决心在创作实践中，揭开名家作品的描写与现实生活“有些相似，又有些不同”的奥秘，开始孕育着不知其名的“典型化”的思想。因此，欧阳山在这时期的文学作品，虽然接受了现代主义的一些影响，但基本的创作方法仍是现实主义的，或者用恩格斯的话说是“不充分的现实主义”。

在作者的笔下，无论是描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生活的《那一夜》、《玫瑰残了》、《桃君的情人》、《你去吧》、《爱之奔流》，还是描写社会底层劳苦群众的《再会吧，黑猫》、《两个没有灵魂的人》、《最可怜的女人》、《我怎么是你女儿呢》、《中秋节》，……多是通过人物悲苦命运的描写，控诉和鞭挞社会的黑暗。有些作品在“自我表现”的描写中，也透露了作者鲜明的爱憎感情，赞美了心灵的高尚和善良，但人物

同作者本人一样，始终没有找到“美好的去处”，结局往往都是悲剧性的。在摸索过程中，欧阳山联系自己所处的多灾多难的但又充满反抗精神的时代，觉得“从前在一道生活的人物，竟像隔了一重烟雾”。于是，他心里萌起要用一种更真实更感奋人的方法，“描写我底经验，给那些人物以较显著的光彩。”（文集3997—3998页）这就是欧阳山后来才能明确表述出来的典型化的方法。

（二）欧阳山典型观的确立时期（1931—1941）

这个时期，欧阳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自觉追随鲁迅，参加左联。在鲁迅的旗帜下，欧阳山“决心抛弃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观点，企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观察世界、人生，从事文学创作”。（文集9页）因此，人物描写已明显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逐渐转向工农和其他劳动群众；从塑造底层人物悲苦的形象转向塑造觉醒者、抗争者、革命者，乃至英雄形象；着力刻划人物的倔强性格、美好心灵和反抗精神，从生活的真实出发追求艺术真实，把歌颂与暴露结合起来，寓于形象塑造中。

在这个时期先后发表的小说，如描写工人生活的《竹尺与铁锤》，描写下层人民的觉醒和抗争的《七年忌》，描写灾民惨象的《崩决》，侧面描写广州起义的《鬼巢》，描写抗战斗争的中篇《流血纪念章》、长篇《成果》，等等，虽然还存在这样那样的甚至比较明显的缺点，但已冲破真人真事的局限，选材既注意提炼，形象塑造也尝试着典型概括。因此，这些小说的问世，不仅标志着欧阳山文学创作新阶段的开始，

也标志着欧阳山典型观的确立。

1937年，欧阳山在《鲁迅精神底永远的敌人——哀念鲁迅之二》这篇散文式的评论文章中谈到“关于采用南边一个鼻子，北边一对眼睛来创造小说里的人物，鲁迅先生在第一本书里给过我的一点启示，而关于怎样创造阿Q底复杂的头脑他却不讲”。（文集4132页）于此可见欧阳山的典型观的确立，是与鲁迅先生的启示和教导分不开的。

（三）欧阳山典型观的飞跃时期（1942—1949）

1941年，欧阳山从重庆来到延安，第二年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和延安文艺座谈会。他说：“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我的创作道路上是一个转折点。”（见《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实事求是》）从这个转折点到解放前夕，是欧阳山典型观从确立到飞跃的时期。

欧阳山说：“在座谈会之前，我虽然写了一些作品，但不能正确反映工农兵，也不能为工农兵所接受。文艺座谈会后，我逐步意识到要去接触工农兵，努力反映工农兵，后来写的一些作品，也就比较容易为工农兵所接受”（同上）。这段话道出了欧阳山典型观飞跃发展的基本原因，也揭示了飞跃的突破口就是“接触工农兵，努力反映工农兵”。

在文艺座谈会上，他在20、30年代中“没有解决或者说是没有彻底解决的”问题都得到了较好的解决。从此，欧阳山热情响应毛泽东的号召，一方面加紧学习马列主义，另一方面深入农村基层生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

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见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终于，在较短时间里创作出解放区第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高干大》和其他一批作品，出现了如同毛泽东所称赞的“新写作作风”。特别是塑造了高生亮这样一个“比普通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毛泽东语）的英雄典型，他既不是欧阳山20年代中后期写的不能自助的悲苦者，也不是80年代所写的英雄的悲剧和悲剧的英雄。他以埋葬旧世界的挖坟人、新世界的创造者和建设者的英姿步入中国文坛，引起国内外的注目。作家运用唯物史观，以对立、对比、对照的手法，辩证地描写高生亮这一人物典型性格的发展以及促使他的性格变化发展的真实可信的典型环境。欧阳山通过创作这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实现了自己的典型观的飞跃。

（四）欧阳山典型观的全面发展时期（1950——现在）

新中国成立，已走向成熟的欧阳山调回广州，一边从事文艺部门的组织领导工作，一边坚持深入生活，继续进行创作。尽管建国以来，我们的政治生活有过许多风浪，文艺创作也经历了一条迂回曲折的道路，但欧阳山作为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和信念执着的老作家，始终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坚持社会主义的文艺方向。长篇巨著《一代风流》的创作和出版，不仅是欧阳山创作道路上的一座文学丰碑，而且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部史诗性的作品。它是欧阳山的生活积累、艺术经验、人生智慧的集大成，也是欧阳山文艺观、典型观的形象体现。我们从他

的创作成果和他总结的文学经验以及各种文学艺术的评论中，可以看到欧阳山的典型观已发展成一个比较独特、完整的理论。

二、欧阳山的典型观

第一、对生活源泉的把握

典型存在于生活之中。对于一个作家是否已经深入了生活这个问题，欧阳山在学习《讲话》前后有着不同境界的理解。他说：“我曾经以为自己对工农兵多少有点熟，有点懂，也写过一些工农兵，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如果真是熟了，懂了，为什么‘不善于描写他们’，为什么‘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什么写不出他们干净的地方，也写不出他们可敬、可爱、可歌、可学的地方？那么对资产阶级、地主、军阀是不是熟悉了呢？如果真是熟了，懂了，为什么写不出他们肮脏的地方，也写不出他们可鄙、可憎、可恨、可鉴的地方？说来说去，想来想去，还是毛泽东说的对：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文集3884页）

如何彻底解决这个“不熟，不懂”的问题呢？办法就是按照毛泽东的教导深入到生活这唯一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但是，欧阳山认为：“生活叫做唯一源泉，并不是生活里只有一条源泉，这点要搞清楚。唯一源泉，是从总的来说，从艺术跟生活的关系来说，真正的群众生活，是千千万万的源泉，源泉多得很。实际情况也是如此，黄河、长江、珠江的源泉也多得很，慢慢汇合起来，成为黄河、长江、珠江。”（文集3961页）这唯一源泉

与多源泉的观点，关涉到生活无边与生活有边的辩证关系。他认为，对作家来说，生活确实是无边的，就算你有很大本领，也不可能到每个生活源泉中去探索。每位作家，一辈子经历，最多能真正熟悉一个或几个源泉，接触一个或几个地区，不可能到每个生活源泉中去了解，去熟悉。作家的精力、寿命有限，而时间是那么无穷无尽，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是无边的，作家艺术家，只能汲取有限的一部分。（见文集3961页）

既然每个作家能接触的生活范围是有限的，投放到生活的时间也有限，作家就应下决心，从有限的时间、源泉里，汲取丰富养料，尽量使自己的艺术更丰富，更有概括性，更能表现出时代精神。欧阳山认为，“没有经过概括的许多生活现象只是个别的，部分的‘现实’，经过概括的‘现实’才是生活底‘真实’”。“小说以现实底概括的方法达到现实创造的目的。”（文集4052—4053页）而为了概括现实生活，塑造典型形象，“作家就需要到最尖锐最激烈的矛盾斗争中去，因为那地方最有时代精神，最有代表性，最能看出生活意义，时代意义。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典型环境’。”（文集3962页）在这样的环境里，要注意“掌握在斗争中的中心人物，掌握在斗争中最激烈的冲突和矛盾”（文集3877页），把矛盾和斗争典型化。而典型化的过程，就是概括和个性化统一的过程。

第二、典型的塑造

欧阳山明确地反对“一个阶级只有一个典型性格的思想”，认为“一个阶级人物的共性相同，个性不同，固然可以形成许

多不同的典型性格；就是共性相同，个性也相同，或者大体近似，也因为本质特征相同的共性之中，还存在着许多各不相同的特质特征（典型特征），所以也存在着千差万别的典型性格。总之，不但不是一个阶级只有一个典型性格，反而是一个阶级存在着无数的典型性格。”（文集26页）欧阳山按照这样的理解，在塑造典型人物的时候，总是遵循以个别反映一般的艺术规律，并且特别注意同一阶级、阶层的各不相同的某种特质特征，融合于独特鲜明的个性之中，所以在他丰富的人物画廊中有各种各样的典型性格，既具有独特的个性，又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这一个”。

具体来说，塑造典型性格就是“把研究、分析所得的某些性格特征集中、综合、概括成一个性格。”（文集4073—4074页）如何完成这个任务呢？1961年，欧阳山在答一些文学青年问时，曾提出“懂事·知人·善于假设”的观点。他说，在写作之前，必须解决“懂事”和“知人”这两个问题，就是要把你所碰到的事情和人弄清楚，弄懂。而在写作过程中，塑造性格、安排情节，“这两者都是一种假设的工作，并且这两者的假设是同时完成的”，而“巧妙的地方就在善于假设”（文集4079页）。“假设”决不是没有根据的“空想”，而是把握人物思想感情的规律，按照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而进行的某种“想象”，是合乎艺术规律的科学的预见。作家在现实生活中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物，一切阶级，一切生动的原始材料，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达到“知人”、“懂事”和“善于假设”，从而概括出人物的典型性格。

要塑造出“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

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典型性格，还必须创造出—个促使典型性格变化、发展，促使典型人物按照其性格逻辑去行动的典型环境。因为典型性格只能产生于典型环境之中，依赖于典型环境而存在和发展，并反过来给予环境以积极的影响；如果离开了典型环境，典型性格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失去了其存在和发展的客观依据。因此，典型化过程的全部奥秘，就在于创造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第三、典型塑造中人性与阶级性的统一

欧阳山自从找到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以后，就认识到“人类要分化成各种各样的阶级”（文集10页），明确提出：“典型是现实底概括，也即是阶级特质，阶级本质，和个别色调底特征底统一。”（文集4052页）所谓“个别色调底特征”，就和具体的带有阶级性的人性分不开，区别只是在于是哪个阶级的人性罢了。他在《一代风流》中的人物设置，以代表工人阶级的周家，代表买办资产阶级的陈家，代表官僚地主阶级的何家，组成当时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缩影。他在塑造人物性格时，决回避表现人物所固有的人性，即使在“左”的教条主义盛行，某些表现人性的作品不分青红皂白自动受到批判的时候，他也是准确地掌握阶级分析的方法，而且淋漓尽致地表现人物的人性，使人物的感情世界丰满、深厚独特，个性鲜明、生动，人物之间的关系合乎情理，作品极富人情味，显得真实可信。其原因，就在于他能以鲜明的阶级观点去描写不同阶级、阶层

的人性，善于把人性与阶级性、真实性与倾向性统一起来，从而创造了一系列各具不同阶级倾向和思想倾向的典型形象，再现了不同历史阶段的现实关系和各种阶级力量、政治势力在斗争中的消长过程和发展规律。这是欧阳山的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在创作中的正确运用和形象的体现。

第四、从正面人物的角度观察世界，处理好歌颂与暴露的关系

歌颂和暴露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如何认识现实生活中的矛盾问题。欧阳山在谈到“写真实”的问题时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光明面是不真实的，它的黑暗面才是真实的。这是对真实的歪曲，应该反对。但是，如果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只有光明面是真实的，黑暗面是不真实的，这也是一种对真实的歪曲。”（文集8945页）重要的是，我们描写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接触到黑暗面的时候，必须认真研究实际情况，必须采取严肃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欧阳山认为，生活现象是纷纭复杂的，要透过现象看到本质，“特别有一条规律不能忘记：在我们的社会，坏的消极的东西，必然要被克服，必然要走向消灭走向死亡。这条规律如不掌握不认识的话，在揭露那些消极的、黑暗的东西时，就往往要犯错误。”（文集3966页）能否在典型塑造中正确地进行歌颂和暴露，“关键在于我们能否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站稳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立场。”（文集3948页）无论是歌颂光明还是揭露黑暗，他都主张：“要通过正面人物的眼光、感受和意见来看事情、看世界”，因为“正面人物是我们的战友，他与我们的斗

争目标是一致的，所以必须通过他的角度来观察世界。”（文集4068页）

与此相应，他特别强调塑造好正面典型，并总结出三条写好正面人物的经验：一是写人物的政治品质，不能用空洞的词句来介绍，“一定要描写人物在生活里面的各种行动。尤其应该从主人公的历史发展来表现。”（文集4062页）如果作品描写了重大的社会矛盾，那就更要在揭示和解决矛盾斗争的过程中来表现人物的政治品质。二是从正面人物的角度来写，认为“这就是写好正面人物的关键”，（文集4063页）“通过他与别人的关系的描写来介绍人物，就能写得更具体、更明确、更深刻、更丰满。”（文集4064页）三是按照“心灵的辩证法”，揭示人物思想感情活动的规律。欧阳山说：“人的思想感情是有一定规律的。一个人所做的许多事情中，很难做出一件‘特别’的，和自己思想感情规律相反的事。”（文集4066页）因此，准确地描写人物“做什么”、“怎么做”和为什么要这样做，富有逻辑地揭示人物行动的思想根据，就可以塑造出真实、可信、可爱、可敬的正面典型。

第五、如何塑造真实的典型人物

欧阳山的一个美学追求，就是反对虚假，追求真实。早在1940年，他就说：“一篇小说是一件艺术品，同时是一部分生活底真实”。（文集4045页）又说：“内容代表着生活底真实的小说才是真正的艺术品，反之便是伪造的艺术品，或不是艺术品”。（文集4051页）怎样才是真实的人物呢？

欧阳山认为，小说里面的人物是否真实，不是看他是否“真有其人”（写实有其人和真有其事的是历史、新闻，和新兴的

文学样式“报告”）；也不是全看肖像描写是否“逼真”，是否写士兵像个士兵，写商人像个商人。“因为熟练的小说家总能把他底人物描写得非常逼真，一个普通的欧洲作家也不会把士兵写成神父。相反，倒是常常有歪曲现实的作家把他底歪曲的人物描写得非常逼真，来欺骗读者的。”（文集4040页）“文学上的真实，不是真正发生过的事情，而是符合发展规律。”（文集3966—3967页）欧阳山举例说明，象《社会档案里》、《女贼》、《骗子》被认为不真实或不够真实，不是说我们的社会绝对不可能发生那种事情，而是说那种事情和别的许多现象联系着，它本身所处的社会地位和发展趋向等没有表现出来，所以不真实。欧阳山在批评“暴露就是真实”的观点时指出，“阴暗跟丑恶都应该看到，也不要回避”，但“这阴暗和丑恶的事物是向哪里发展，作品必须回答”。如果“把丑恶和阴暗看成是无法排除的，一天天生长的，那就把生活发展的规律搞颠倒了。”（文集3967页）

我们要真实地描写人物，就必须在生活发展的潮流中把握人物，审视和考察人物在经济关系中的阶级地位、社会关系中的政治态度、思想意识和道德伦理中的阶级倾向，还要真正弄清楚人物的心理和行为的细致方面，看看“这个人外表是这样，内心是否也这样；这个人这时是这样，经常是否也这样；这个人在人多的时候是这样，在人少，在老公或老婆面前，甚至在个人独处的时候又是怎样的；诸如此类等等，都要知道。”（文集4073页）总之“生活发展有一定规律”。只有懂得和掌握生活发展规律，才能塑造出真实的典型人物。

第六、关于革命现实主义和“两结合”的创作方法

欧阳山在回顾革命现实主义发展的历史时指出，现实主义有各种各样：在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主义的名目很多，有老现实主义，有新现实主义，有批判现实主义；苏联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但这些提法“都没有毛泽东所提出的革命现实主义那样明确和具有科学性和概括性”。他认为我国的革命文学，是以现实主义为基调的。在历史过程中，也有一些别的创作倾向，但没有得到发展。“革命现实主义是主流。本来革命现实主义是包括着革命浪漫主义的成分的。毛泽东提出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就更明确和完整了。”（文集3924页）

对于革命现实主义、革命浪漫主义和“两结合”的创作方法的内在联系和区别，欧阳山用发展的观点、辩证的观点，联系新时期文学创作的实际作了精辟的阐释。他说，塑造艺术典型，必须同高尔基所说

的：生根于现实之中，站得比现实更高。正因为生根于生活，才有革命的现实主义；正因为站得比现实更高，才有革命的浪漫主义；既生根于现实之中，又站得比现实更高，才有革命的现实主义跟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见文集3969页）

欧阳山明确指出：“现实主义首先就是要求我们真实地反映；否则，就无所谓现实主义。我们反映现实，不是为反映而反映，而是为了进一步地改造现实、推动现实的前进。”（文集3924页）而“革命浪漫主义的要求，是从今天的现实表现明天的现实。”（文集3927页）因此，坚持“两结合”的创作方法，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达到描写现实与展示理想的辩证的统一，歌颂与暴露的辩证的统一，典型性格与典型环境的辩证的统一。

作者单位：广东省文联

中山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陶原珂



文艺的时代性与持久性如何统一

——以《高干大》为例的局部探究

黄伟宗

由“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要求而产生出来的“写中心”、“题材决定论”等文艺观点，对于数十年的中国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文学及文学史研究，都影响甚大，危害匪浅。它不仅使得许多作品随着所写的“中心”转移或题材的重大性消退而失去或消退艺术生命力，而且使得受此文艺观点影响而写出的理论批评文章和文学史著作对某些作品的评价失之公允，不是很快过时，便是留下欠科学的瑕疵。新时期以来，随着对这些“左”倾文艺观点拨乱反正的逐步深入，作家们都在努力进行着使创作既紧扣时代的脉搏又能具有持久艺术生命力的艺术探求。文艺理论批评家和文学史家也对自己的学术领域进行全面的反思，诸如“文学批评观”、“文学批评方法”、“重写文学史”等等问题的提出和讨论，就是这种思绪走向的反映。尽管这些提法有种种偏颇与不足，仍应肯定其纯属正常的学术探讨范围，更应肯定这是从“破旧”而力求“立新”过程中的必然现象，是大有助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批评与文学史学的早日建立的；其探求所旨，看来也是努力使自己对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的认识具有新的时代水平和持久的科学价值。

显然，无论在文艺创作上，或者是在文艺批评与文学史研究上，如何达到时代性与持久性的统一，是普遍关心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但现在笔者尚无力对此进行全面的探讨，仅以重评《高干大》对这一问题作一局部的探究。

为什么选择欧阳山这部长篇小说重评而探究呢？因为这部40多年前延安解放区的作品，从出版时到出版后都有争议，从40年代末到80年代末都引人注目，无不承认它具有独特价值和意义，

但历来的评价又各有不同。这种状况，说明了它是一部既有时代性又有持久艺术生命力的作品，而历来对它的争议和评价不同，也相当典型地反映了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上长期存在的时代性与持久性分离的问题。所以，作此典型解剖，对于文艺创作与文艺批评（包括文学研究）的时代性与持久性如何统一问题的探究，兴许有启发意义。

从历来对《高干大》的评论看文艺批评的时代性与持久性分裂现象

对《高干大》最早的评论，是在这本书尚未出版的1947年冬。当时欧阳山参加了晋察鲁豫边区土改工作团，在今河北省威县农村搞土改工作，他从延安带出来的《高干大》清样正在河北的印刷厂付印。而这时的土改运动正推行“贫雇农路线”，执行“打击富农、消灭地主”的偏“左”政策。在土改工作团整队时，边区文艺部门领导审查了《高干大》清样，认为小说写的高生亮在办合作社时请雇工，按政策应是富农，是“打击”对象，小说里却是歌颂的人物，有“宣传富农路线”之嫌，决定停止印刷出版。隔了一段时间，党中央纠正了这种“左”倾偏向。政策变了，《高干大》才准予出版，1948年8月才正式问世。这是《高干大》受政治干扰的第一件事实。

《高干大》得以出版，与著名作家赵树理的支持是分不开的。1948年夏他在华北解放区积极主张出版这部小说，并且在同年10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介绍一本好小说——〈高干大〉》一文，对这小说作了高度评价。他说：这是“一本反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小说，……反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是本书的中心主题。此外还附带提

出了两个问题，一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了解问题，一是反封建迷信的重视问题”。虽然文章也肯定了作者写现实的本领和人物形象的成功，还提到了这小说结构完整、描摹细致、行文优美等优点，但他的评价主要是从当时政治任务的要求去理解和肯定这小说的政治性的，对这小说的持久艺术生命力之所在是忽视的。

1949年12月15日出版的《华北文艺》（欧阳山主编），发表了胡椒的《读了〈高干大〉的两三点意见》一文，赞成赵树理对此书主题的看法，又根据此书的主题是“揭露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而认为小说“描写巫神太过分强调了，未免有些小题大作”，对任常有和郝四儿这两个否定人物，都是“一死了之”不好，应“相信党的力量，群众的力量是能挽救他们的，改造他们的”。这些异议，更表现了当时对这小说的批评主要着重于政治性。

后来竹可羽在《评欧阳山的〈高干大〉》一文中，对赵树理、胡椒的文章又提出了异议，并对这小说作了总评价。他认为“反经验主义和官僚主义不能说是本书的中心主题”，中心主题是写高干大。小说是从三个方面（反官僚主义和经验主义，合作社业务发展、反巫神斗争）来写这个人物，拿任一方面“单独地说，都不能全面地说明本书的中心主题”。这种观点在当时是很有见地的，但他在指出这小说不足之处的时候，则又重于政治性和政策性了，如他认为在写合作社业务的发展上，显得材料庞杂，缺乏思想内容，认为写巫神的破坏，高栓儿与任桂花、郝四儿三人的恋爱故事，“非常不自然”，这是由于作者掌握合作社实际及思想原则不够，通过政策和思想原则掌握生活实际不够造成的。这些看法，表明了当时已开始重视艺术形象为中心的评价，但仍摆不开政治性、政策性的批评习惯。

1950年春，以上海《小说》月刊为中心开展了对《高干大》的评论。该刊除发表一批著名作家、评论家座谈这部小说纪要之外，还在第8卷4期发表了著名文学评论家冯雪峰的论文《欧阳山的〈高干大〉》。冯雪峰在文章中说：“这部小说，是分明负起了政策的任务而得到了成功的作品，这就是一个证明，关照政策——党性的具体反映之一——并不妨碍作品的生机。”他还认为高干大形象的成功，“就在于他是和任何对于群众的损害势力势不两立的。这个和任何对群众的损害势

不两立，是支配着高于大的全部行动和精神的基本思想和感情。这是一切共产党人的思想和品质，就是说，共产党人的‘魂灵’。……所谓写人，我想是应该这样的。”这些评价，固然符合这小说实际，但着重从政治性、政策性出发并以此作为全书之成功所在（甚至连分析高于大形象塑造也以政治性、党性为全部内容，并将“写人”的概念用党性解释），不是显得过于片面、单面了么？为何这样著名的评论家会如此忽视真正的艺术批评呢？

甚至在1980年出版的大学文科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唐弢、严家炎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中，对《高干大》的评价也是从政治性出发、着重于政治性的，该书认为这部“作品的思想性就不仅是写出了边区合作社经济发展的道路，反映了边区农村新的生活面貌，而且表现了两种不同工作路线、工作作风、工作方法的矛盾和斗争。作品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进行的揭露和批判，对党的实事求是精神、群众路线的肯定和歌颂，不但在当时对一些地区尚在开展整风运动有着现实的教育意义，对以后的革命和建设工作也有深刻的认识意义。《高干大》的成就还在于它成功地塑造了高生亮这样一个农村干部形象。较之同时的其他作品的正面人物，高生亮塑造得更加深刻丰满些，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诚然，这些看法是符合作品实际的，作为一部文学史，既肯定一部作品的思想性又肯定艺术性，既指出作品问世时的社会影响又指出其持久意义，是有见地的。但是这种思想与艺术分割的评价方法，尤其是着重于对小说的时代政治内容的陈述，而忽视对小说以艺术把握现实和形象创造特点的分析，不是显得仍受着“为政治服务”的束缚吗？

我国的文艺批评和文学研究，常常出现许多怪事：有某种新东西出来，就着力于从过去找根据，非弄出个“古已有之”的结论不可；另一种情况则是现时政治或政策有变，往往又去找过去的依据，弄出些“早是如此”的文章，以为现时服务。对《高干大》的评价，也有类似现象。前些时，有人根据经济改革开放的形势重评《高干大》，认为今天的经济政策，在这小说中已写出，早在延安解放区就开始了，因而这小说也有重评的意义。应该说，这看法也符合事实。更可见这小说的真实和意义。但是仅为今时需要去重评某部作品，又只着重于此进行评价，如此“为时所用”，

显得太过了吧？文艺批评和文学研究虽然应当“为时而著”，但如果仅仅是为一时所需去评价对象，尽管符合实际，文章也有时代性作用，但这种仅以时论著的评价，毕竟只是研究对象的部分内涵而不是全部，文章所发挥的作用也只是一时性的。这是离开或否认文学的特性和规律的，也是在科学上违背根据对象实际和进行完整把握的分析原则的，所以这种为时所需而作的研究成果，也是不科学的，会随时代的变化而失去价值。

从《高干大》对现实生活的把握上 看它既有时代性又有持久性之所在

《高干大》在40年代确是为当时而作，但它与其他写解放区生活的作品有很大不同，这就是在对现实生活的把握上，注重辩证地把握现实与歌颂及批评的关系。这是欧阳山到解放区后新写作作风特点之一的继续和深化。这首先表现为小说并不是将解放区的生活写成处处光明，一帆风顺，也不是像某些作品那样写成处处冷漠，漆黑一团，而是写总体光明中的黑暗，和光明如何战胜黑暗，带来更大光明。小说开头引用了一首民歌：“任家沟，任家沟，树大草肥喂牲口，年轻姑娘人人爱，就是讨厌任常有！”小说就是从群众对以任常有和程浩明为代表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思想作风的斗争开始，展开一系列的矛盾冲突的。这些矛盾冲突，包括流氓、恶棍、巫神等黑暗势力的蓄意破坏，包括一些傲慢而浅薄的知识分子和墨守成规的人的阻挠，包括比任常有更上一级程浩明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还包括以主人公高生亮为代表的进步群众本身的自私保守思想和封建迷信观念。但小说很注重对现实生活的光明与黑暗、歌颂与批评的辩证把握，在主体、主流和发展都具有光明实质的基础上去写黑暗和批评黑暗，即使这部小说写了许多（甚至占主要篇幅的）黑暗面和对黑暗面的批评或批判，其效果也不至于歪曲现实，甚至反而会达到更强烈地表现与歌颂光明的效果。这正是这部小说与其他写解放区生活的小说不同的一个特点，也是至今仍值得注意的创作经验。

《高干大》在对现实生活的把握上的另一个特点，是敢于主要表现革命和人民内部正确与错误的矛盾冲突，并且将错误的代表放在主要领导的位置上，充分揭示作为群众利益的正确代表对其展开艰苦的斗争，直至最后胜利。小说中所展

开的矛盾，主要是以高生亮为代表的群众力量，与合作社正主任任常有、区长程浩明之间，在如何办合作社的问题上的冲突。程浩明、任常有不仅在主要领导地位，而且，他们所坚持的一套办法，是根据上级指示的，是有章可循的。但是这套办法，在实际上行不通，群众不拥护，合作社越办越糟，不仅任家沟合作社如此，全边区的合作社也面临类似的处境。这反映了上级指示和群众要求的尖锐而普遍的矛盾，在农村合作社干部面前摆着究竟是机械按上级指示办事，还是实事求是地按群众要求办事的两种选择，由此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而作为正确一方代表的高生亮，不仅长期是个小小的合作社副主任，并且做出了许多成绩，受到群众拥护，将合作社救活，还越办越兴旺，却长期得不到承认和肯定。这种正确受到压抑状况的描写，是十分突出而尖锐的，尤其是对上下矛盾的充分揭露并以此作为小说矛盾的主线，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和胆识的。至今我们所见当时写解放区生活的作品，大都是以战争或土地革命中的敌我矛盾为主线，有的其中也写到革命或人民内部的正确与错误的矛盾冲突，但都不是作为主要线索，也未涉及上下矛盾，更未能如此充分揭露。相形之下，《高干大》在对生活的把握上就更显其特色了。值得注意的是，这小说虽然那样充分而尖锐地揭露矛盾，但也未造成将新社会和领导写成漆黑一团的后果。其原因，除了上述的把握光明与黑暗、歌颂与批判的辩证关系之外，根本还在于作者的态度，不是将这些矛盾的对立面（错误的代表）看作是敌对性质的，而是人民内部性质的。更深一层来说，作者敢于和能够这样去揭示矛盾，还在于对现实生活的认识和反映，严格遵循忠实于现实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这种文艺的认识和反映现实的立场、态度和原则，无论在过去或现在，都是值得赞许和发扬的。

《高干大》在对现实生活的把握上，再一个显著特色是：不去赶现实急需的“热门”，而是写当时不受注意的经济生活题材，尤其是在题材的处理和主题的开掘上，不是按当时的政治运动或方针政策的需要和要求去展开和处理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而是从生活的实际出发，着力开掘和表现在一定社会阶段和经济领域中，带有根本意义的矛盾和思想，从而使本来是写某个特定阶段生活的题材，具有持久的意义。虽然从前那种合作

社，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了，但这本小说1980年再版，1979年又6次印刷，仍拥有广大读者，受人注目，这是为什么呢？根本原因在于小说扎扎实实地写生活现实和生活中真实的人物，而不是图解运动或图解政策。任何运动或政策，总是会过时的；某段客观生活与人物，尽管也会消逝，但经作家化为艺术形象之后，某段客观生活与人物的实际存在的精神，则会化为一种艺术生命力，成为一种永恒的存在。欧阳山在《高干大》再版序言中说：“虽然他（高干大）所做过的事情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但是他所具有的一种精神上的特质是永远不会过时的，是万古犹新的。甚至在此刻我还能看见他精神奕奕地站在我的面前，象一株苍劲的松树一样”。欧阳山这些话，揭示了艺术的生命力在于表现出人物的精神特质，并将这种特质化为生动的艺术形象的道理。

另一方面，对客观生活的认识和反映，同样也是要把握某段客观生活的精神特质，并将其化为艺术形象（在小说或戏剧创作来说，主要是化为人物形象），才具有持久的艺术生命力。《高干大》写抗日战争时期的边区生活，主要是写办合作社的经济工作，写了许多办合作社的具体做法和办社过程中的分歧与斗争，虽然这些事都已历史陈迹了，但是，因为小说不是着意于表现人们做什么，而是着意刻划他们怎么做，为什么这样做而不那样做，剖现他们在这些行动中的丰富思想感情，由此化为的艺术形象是永久长青的。同时，也正因为小说表现那些具体措施或做法，是着重于描写人们怎么做的精神和心理状态，并且将这些精神和心理状态，以及赞成和反对者的斗争纠葛，化为生动的艺术形象描写，而这些精神和心理状态和矛盾纠葛，正是一定时代的社会意识和精神特质的体现。这些在艺术形象中体现出的社会意识与精神特质，虽然有着明显的时代印痕和历史局限性，但本质上又是与人类社会的道德精神和发展精神相通或一致的。因此，当小说表现的生活成为历史之后，人们也仍会在这些相通或一致之处，产生共鸣，取得教益或力量。文艺作品中这种相通或一致之处越多，越是本质性的，它的思想和艺术力量就越普遍、越持久。《高干大》表现的为群众服务、实事求是地促使事业发展，就是这样一种道德精神和发展精神。

然而，《高干大》出版后，虽然被列为解放区文艺创作优秀成果之一，但在人们的评价中（包

括至今所见好几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评价中），对其思想艺术价值的评价，远不及对同期出现的其他写土改运动或战争题材的作品的价值。自然，这些作品的价值和意义不应低估，但对《高干大》的评价偏低，却是欠公允的。这种偏颇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受题材决定论的影响，体现了以政治“热门”为重的思想，是长期以来忽视或不重视经济和经济工作的反映。其实，虽然经济与经济工作的政策和措施也会变，但写这领域的实际和精神的作品，却是对每个时代都有价值和意义的。一些写中心的作品之所以会过时，除了不是以写人、写精神为本的原因之外，还在于往往按某时的政治要求去解决矛盾和作为作品的主题，作为对形象褒贬的标准。这样，某时的中心或政治要求过时，以此为主导的作品也必随之失去生命。我国好些写农村合作化、公社化题材的作品，就大都遭此厄运。《高干大》写革命战争年代中的经济和经济工作，所处理的矛盾和主题思想，固然符合当时的政治要求，但不是图解政策，而是抓住当时边区新社会的经济和经济工作的实质所在，体现出新社会的新的实质所在。所以，《高干大》在40年代解放区的文艺创作中，以其所写题材受人忽视而实有意义，以其反映生活的独辟蹊径和主题思想的持久性而具有独特价值。

从高干大的形象塑造上看这部小说 的时代性与持久性统一的奥秘

《高干大》的杰出成就，主要是成功地塑造了高生亮这样一个典型人物。正如小说的概括描写那样，他“是一个很奇特的人。他原来是一个十足的农民，后来逐渐变成一个共产党员，但是还没有变完。现在他大半个是共产党员了，小半个仍然是农民。……”他在办农村合作社的进程中，始终坚持为人民群众谋福利、为革命办好事、实事求是按实际情况办事的原则，这是他的主导思想和基本动力。他时时工作和生活于群众之中，被群众亲昵地称他为“干大”（这是陕北方言中对信赖而尊敬的人之称谓，“干大”即干爹），但他又不是以“人民的救星”出现，而是群众的利益和智慧的代表，他是不能脱离群众的“安泰”（希腊神话中的英雄）。正因为如此，他能够识别以区长程浩明、社主任任常有为代表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错误，并能够顶住这种错误作风的强大压力，同时又能够坚决地与巫神郝四儿为

代表的封建迷信势力作斗争，并且与自己身上的事务主义、迷信思想、脾气暴躁等思想性格缺点作斗争，在使合作社事业取得节节发展的同时，也使得自己的思想性格取得长足的进展。他是与群众鱼水相连的英雄人物，是实事求是、坚持原则、敢于斗争、力求发展的革命精神的化身，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自己的典范。正是由于他具有这些典型意义，而这些可贵精神又是世代崇尚的，所以这个典型形象也就是永久常青的。

高干大形象的成功和生命力，还在于他的真实性和生动性。这个形象的思想性格，是由多种矛盾因素组成的，这些矛盾因素又是有主导性的。高干大有高大的身躯，而野心很小；面貌丑陋，却心地和善；知识渊博，而识字不多；脾气暴躁，却办事细心；说话粗鲁，却心地很软；是先进的共产党员，又是道地的农民；思想激进，却又有些迷信。这些矛盾因素构成的思想性格，其主导性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实事求是地做人办事。这主导性的思想性格，既是这些矛盾因素的联结轴心，又是辩证统一之所在。如高干大的脾气暴躁，有急于为群众办好事的原因；因此而使这缺点与他办事认真的优点紧密关联，也因此而逐步克制了他的暴躁。所以，这个形象的思想性格是辩证统一的，是有矛盾性而又有其主导性的。

其次是这个人物既有局限性又有发展性。小说很有分寸地交代高干大是共产党员，但还没有变完，小半个仍然是农民，指出他“不信没有看见过的东西，但是对于鬼神却不能彻底否定。”这种农民的狭隘性、保守性和迷信思想，是高干大这个共产党员的缺陷和局限性。在这基础上，小说通过一系列情节，描写了高干大因为这些缺陷而产生的种种遭遇（如：在任常有、程浩明诘责下的苦恼与抗争、在巫婆郝四儿进攻时的失态），

又通过这些遭遇之后的抗争，彻底弄清了农民狭隘保守性与封建迷信的危害，这就深刻地展现了人物的发展性。写他的局限是为了表现他的发展，他的发展体现于克服局限；无论其局限性或发展性都表现了人物形象的真实。

在纵观这个人物形象的时候，我们还应该注意到《高干大》这部小说历来受人忽视的一个特点，这就是：作者以创造高干大这个人物形象为主旨，而不是象当年解放区好些创作那样，主要通过反映某场运动或斗争而写出若干人物。以创造典型形象为主旨，还是以反映某段或某种生活为创作出发点，是两种不同的艺术透视点。虽然因事写人，也可写出人物形象，但由于以事为主，为事写人，人处于被动地位，写人是为把事写活，往往会因事之变异或过时，而使所写的人物褪色。因人写事，以人为主，写事旨在体现人物的思想性格，活现精神风貌，事过而风采犹存。《高干大》是因人写事、以人为主的，小说虽然也写出了边区合作社工作的进程，但是，小说并不将这进程作为一场伟大的运动去反映和描绘，而是以表现高干大这个人物思想性格为主去写这进程，小说的主要情节实际上并不是农村合作社工作的开展步骤。例如，高干大与巫神郝四儿的斗争，他的儿子高栓儿与任桂花爱情故事，这些占了全书较大篇幅的情节，都不属合作社工作的范围，而是旨在表现高干大思想性格的多面性和发展性。所以，边区生活已成过去，当年合作社的做法已过时，在这种生活环境和以这些事情塑造出的高干大形象仍能活在世上。这就是小说以人写事的艺术道理。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陶原珂

四十年来古文字学的新发现与新学问

曾宪通

1925年夏天，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在题为《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的学术讲演中，提出了两个著名的论断：一是新的学问来源于新的发现；二是中国纸上的学问有赖于地下材料的证明。四十年来中国古文字学的新发现和新学问，证明这个论断确是至理名言。

20世纪后半叶是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随着新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地下文物成批涌现，不但考古年代学上的缺环和地域的空白得到了填补，而且有许多新发现甚至完全改变了人们原来的看法，促使人们去重新考虑问题，形成新的认识，带来了新的学问。下面就古文字学讲几个有代表性的问题。

一、史前陶符的发现与汉字起源问题的探索





新中国建立以来，在东起山东，西至青海，南及广东，北达河北的广阔范围内，发现了大量从仰韶文化到商代文化的遗址30多处，出土陶符860多个，这些陶符已构成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系列，是研究汉字起源问题最直接和最可靠的新资料。

本世纪初，海内外学术界曾流行过“汉字西来”的说法。由于当时还找不到甲骨文这种相当成熟的文字体系的前身阶段，因而有人断定中国文字是从近东两河流域已经成熟了的文明传播过来的。现在，我们已经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商代的陶符系列中找到商周文字的前身，足以证明“西来说”之谬。

在众多的早期陶符资料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黄河流域的刻划记号和象形符号。

刻划记号主要发现于黄河流域上游，大抵以西安半坡和临潼姜寨为中心，远及青海乐都的柳

湾和甘肃的马厂，都是距今六七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存。在200多件标本中，计有各种记号242个，从中可以归纳出不重复的刻符五六十个。对于这些刻符的性质，有人认为它们只是陶工随意的刻划，当时并未赋予任何含意，根本不是文字；有人则以为这些刻划已经是文字，有些刻符还可以在后来的甲骨文和金文中找到，大体上可以释读。我们认为这些刻符既非随意的刻划，也不同于后世的文字，但它们同文字的关系非常密切，是一种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可视作原始文字的祖先。

象形符号主要发现于黄河流域的下游，以山东大汶口文化为代表，距今约4500年左右。在属于大汶口文化晚期的莒县陵阳河遗址的陶器上，发现了四种符号：第一例作，象钺形，是古“戍”字。第二例作，象斧形，是古“斤”字。第三例作，是上日下火的“炅”字。第四例作，有的学者释作“炅山”二字。这个复合符号在大汶口文化的不同遗址中也有出现。第三例还见于大汶口文化的大玉琮和良渚文化的大玉璧上，可见其传播范围之广。这些象形符号与古汉字中的象形字形体非常接近，无疑是古汉字的前身，应属原始汉字。

上述刻划记号和象形符号的资料表明，汉字大体上来源于刻划和图画两大系统。刻划系统经过结绳、契刻的演进，某些纯指事字的初文可能与此有关；图画系统则由原始绘画向语言符号方面发展。大汶口的象形符号中，有的字竟由两三个符号组成，甚至有记录简单语词的迹象，已具备原始汉字的性质。甲骨文和金文所保留的大量图画性的族氏文字，可能就是在这个系统的子遗。与绘画和刻划一脉相承的象形符号和刻划记号，

则是象形字和指事字的先驱。由象形字和指事字构成了独体汉字的初文，成千上万的汉字，就是由这些独体初文组合、演化而成的。

史前刻划记号和象形符号的发现，促使汉字起源问题的讨论突破以往只从历史文献进行探索的局限，而结合考古学、民俗学、语言学等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探究，因而关于汉字起源问题的新认识更能令人信服。

二、周原甲骨文的发现与原始“易卦”的解读

1899年安阳殷墟发现甲骨文后，学术界曾长期怀疑：除了商末的都城有甲骨文之外，当时的方国或别的朝代是否也有甲骨文呢？现在，由于周原甲骨文的发现，对这个问题已经可以作出肯定的回答。

1976和1979年，在今陕西岐山、扶风一带的周原宫殿（宗庙）遗址发现了两处窖藏，出土西周甲骨1.7万多片，其中有字者292片，字数903个，合文12个。这批甲骨文的内容非常丰富，对研究西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对研究商周的关系和探索周文化的渊源，都提供了现存史书和金文所没有的珍贵资料。

这批甲骨文的年代约当周文王至周穆王之间，根据它们的内容和书体，大体可分为武王克商以前和克商以后两个阶段。克商以前的甲骨文记载了周文王祭祀殷帝太甲、文武帝乙和殷王的田猎，特别记载了周文王受殷帝封为“周方伯”，在师中举行“禹（游）”的大典，以及殷王命他伐蜀、伐密须的事迹。克商以后的甲骨文记载了周武王在克商30天后的癸子（巳）日去到文武帝乙宗庙进行彝祭的情况。刻辞中提到以“二女”妣己和嬖妾向成唐（汤）致祭，也与文献的记载完全吻合。

周代甲骨文与商代甲骨文相较，二者大同小异。其差异主要表现在：

（1）周人在钻凿形态和卜法上与殷人风格不同。甲骨在用来占卜以前需要经过修治和钻凿。殷人卜骨、甲均多作圆孔，周人则卜骨多圆孔，卜甲多方孔，方孔的槽在左边，圆孔的槽在孔底。

（2）殷墟甲骨文虽有早期字大、晚期字小的趋势，但周原甲骨文形体小如芝麻，笔画细如毫发，要在显微镜下才能看清，与殷墟甲骨文大异。如上面提到的“彝祭”一片面积只有2.7平方

厘米，却有刻辞30多字。不少象形字只寥寥数笔便维妙维肖，足见当时匠工的功力。

（3）在文例上，周原卜辞比殷墟卜辞简略得多。完整的殷墟卜辞一般由叙辞、命辞、占辞、验辞四个部分所组成。而大多数的周原卜辞却只有贞辞和占辞，二者兼备者甚少，前辞更少。所以，周原卜辞的辞例都比较简单，少则一、二字，最多也只有三十余字，一般仅数字而已。

（4）周原卜辞多用周式记日法，与殷人主要用于干支记时者不同。殷人习惯用“六十甲子”记日，几乎每条卜辞都可以见到用干支记日的例子。周原卜辞直接用干支记日的例子非常少见，多数根据月相变化记日，如既吉、既望、既死霸等，相当于西周铜器铭文的初吉、既望、既生霸和既死霸等。

近四十年来，周原和各地陆续发现的西周甲骨文总计已有300多片，上有刻辞1000多字，时代上自周文王（相当于商王帝乙帝辛时期），中经周武王，下迄成康昭穆之际。从内容看，周族早在周文王“受命”以前就已经在甲骨上契刻文字了。由于周原甲骨的出土，“甲骨文”已不再为商朝专有，更不是殷墟一处所藏，从目前的情况分析，而且，今后很有可能在殷墟以外更多的地方发现甲骨文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了。

在周原甲骨文中，常杂有一些由数目字组成的所谓“古文奇字”，如六、伞、罍、夬、夬等，它们曾使古文字学家感到疑惑，唐兰先生就曾怀疑它们是一种已经遗亡了的古代文字。

这些符号不仅见于甲骨文，还见于铜器铭文和陶文。就目前所知，这类符号已超过100例。所用数字只有一五六七八九几个，组成形式多数以三个一组或六个一组，或二组成对。时代自商、西周，直到战国。战国中期的楚简还保存有这类符号，但已简化为一和六两个数字了。后来的卦符一和一，当是数目字的一和八（六）演化成的。通过释读周原甲骨文，可以揭示这些成串数目字的奥秘。原来，这些数目字是古代“筮”的原始形式，是“易卦”的雏型。古人占卜通常是先占后卜，即先用蓍草、豆子、算筹等筮得数字，再把数字记在占问同一事项的器物上，凡奇数表示阳爻，偶数表示阴爻，由所筮得的数字即可转化为卦爻。在《周易》中可找到相应的卦象以判明吉凶。

原始易卦的这些资料，在“易学”研究上有著

重要的意义。首先，它证明最原始的易卦是用数字来表示的，后代代表阴阳的卦爻，也是由数字六和一演化而成的；其次，由于殷代已存在六个数字的重卦，过去关于周文王演重卦的说法便不足为据了；再次，汉人说易有所谓“互体”的说法，在小屯南地甲骨文中已有所表现，可见其渊源甚早，不能简单地加以否定。

三、商周重器及青铜器群的发现

丰富了铭文研究的内涵

据不完全统计，四十年来新出土的有铭商周铜器已在1100件以上，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商周重器和青铜器群的发现，成为金文研究中最具特色的内容之一。举其要者，有如下几个方面：

(1) 安阳殷墟五号墓出土了大量铸有“妇好”名号的铜器。据甲骨文，妇好是商王武丁的配偶，她不但为商王主持过不少重要祭典，还经常为商王带兵出征，率领过1.3万人的队伍讨伐羌方（这是甲骨文所载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妇好墓的出土第一次把墓葬铭文同甲骨文及历史文献联系起来，互相印证，为商代文字的综合研究开辟了一条新途径。

(2) 宗周所在地陕西省先后出土大批窖藏铜器，为西周金文的研究增添了新内容。如1972年岐山董家村发现窖藏铜器37件，内有裘卫所作的铜器4件（1簠、1盃、2鼎），铭文607字。这些铭文提到裘卫用价值80朋的“瑾璋”换取矩伯的“十田”，记载了西周中叶工商奴隶主用实物向其他奴隶主换取田地和林地的经过。这对于研究西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无疑是极珍贵的资料。1976年扶风庄白村发现一个窖藏，出土铜器103件，其中一件史墙盘有铭文多达280字。盘铭的前半部分追述文武成康昭穆六位周王的事迹；后半部分记载微氏家族史墙祖辈五代世系的历史。加上一起出土的夔钟铭文，涵概了微氏家族的七代世系。这个窖藏保存的一个家族七代世系的100多件铜器，为青铜器及其铭文的分期断代提供了一系列可靠的标尺，从而可以把郭沫若同志五十多年前所发明的“标准器断代法”扩展到“标准器群断代法”。许多以前无法判明时代的铜器，即可据此一一厘定。

(3) 宗周以外的诸侯国铜器也有不少重要发现。如宝鸡出土的秦公钟和秦公镈，江苏丹徒的宜侯矢簠，北京、辽宁等地的郟（燕）侯铜器，

以及安徽寿县和淮南发现的蔡昭侯墓和蔡声侯墓，都是了解宗周以外有关诸侯国的重要资料。

(4) 列国铜器群的发现特别引人注目。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了大量精美文物，其中由65枚组成的成套编钟，上有铭文2800多字，详细记载曾国和列国的乐律，是中国乐律史上的空前发现。据研究，这套编钟是以五音为主体的12半音体系，音域广达五个八度，可以随意旋宫转调，演奏任何乐章。它充分说明，我国在战国初期的乐律学已达到极高的水平。河北平山县中山王墓出土的鼎、壶（圆壶、方壶各一）及兆域图4器，共有铭文1573字。这些铭文不但大大补充了中山国的历史，而且保存着过去字书所无的字形149个，在新版《金文编》新增单字字头中占了四分之一强，其重要性可见一斑。过去发现的战国铜器，铭文多是“物勒工名”的格式，一般只记载作器的时间、监造者、工师和匠人的名字，内容非常单调。曾侯乙编钟与中山王器的长铭同这些单调的格式形成鲜明的对照。近十年来战国文字研究之所以突然热起来，同这一大批新材料的发现是分不开的。

四、战国秦汉简帛的发现开拓了

古文字研究的新领域

竹简和帛书是真正的书史材料。

解放后发现的竹简几乎都是战国、秦、汉时期的，而其中的战国竹简全都是楚简，主要集中于湖南、湖北和河南三省。目前已发现的14批，总计约4万余字，内容多半是关于随葬器物 and 送葬车马的记载，还有卜筮祭祷的记录和司法文书，以及少量的古书等。

秦简可说是七八十年代最重要的发现之一，主要有湖北云梦睡虎地和甘肃天水放马滩两处。

睡虎地秦墓是秦始皇30年的墓葬，出土竹简1167枚，部分竹简正反两面书写，总计有3.8万多字。经过整理拼复，计出书十种。其中带有墓主年谱性质的《编年纪》，是继魏国《竹书纪年》之后的又一部战国编年史。二者时间正好互相衔接，可以用来校正《史记·六国年表》的讹误。《语书》是南郡守腾发给郡内各县、道啬夫的文书。书中反映了秦统治者与当地楚人势力的矛盾斗争，是一篇珍贵的史料。文书还定出“良吏”、“恶吏”的标准。它和专门讲如何做官从政的《为吏之道》一样，都是墓主生前攻习和珍藏的重要文献。《效律》、《秦律十八种》、《秦律杂抄》、《法律问答》

和《封诊式》五种，都属于秦代的法律文书，它们同墓主喜的司法官员身份是完全一致的。《日书》甲乙种，则是规定人们行事宜忌的古代数术之书。

放马滩秦墓共出土竹简460枚，内有《墓主记》和《日书》各一种。《墓主记》记载墓主丹的生平事迹，时代略早于睡虎地“喜”的墓葬。两地《日书》也大体相同，但各具南北特色。

以上12种文献都是用隶书抄写的。秦简使我们有可能会看到真正的“秦隶”，而且由于它记有确切的年代，可以纠正史书上关于程邈创造隶书的误传。秦隶的特点是在用笔上改篆体的圆转为方折，但在结构上仍保留着较浓厚的篆意。这种书体并非来自小篆，而是直接从晚周大篆的草率写法演变而来的，可能形成于战国晚期。除以上二处记有确切年代的秦简实例以外，还有两通木牍为证。一是四川青川的田律木牍，年代为秦武王二年（309）；二是睡虎地第四号秦墓黑夫的家书，其内容与《史记》所载秦楚战争有关。这两通木牍均属战国晚期，而其字体风格和结构体势均与以上秦隶十分接近，尤其是从水的波、津、盗、淮等字，水旁皆作“三”，已是典型的隶书写法。由此可见，秦隶这一书体早在程邈以前就已经形成并通行。

从现有的材料看，自战国晚期至西汉前期（汉武帝以前）的简牍帛书。都是用这种带有篆意的篆隶书写的。从汉字的历史考察，篆隶应是古文字发展为今文字的过渡阶段，也就是古今文字的分水岭，由于篆隶带有古文字的某些特点，必须用研究古文字的方法对它进行整理和研究，所以越来越多的古文字学者主张把汉武帝以前的秦汉简帛文字也列入古文字学的范畴。从发展趋势看，秦汉简帛文字的研究很快就会成为古文字学一个新的分支。

四十年来，属于西汉前期的简牍共出上了十多批，主要有湖南马王堆一号墓的“遗策”，湖北凤凰山汉墓的“告地册”，安徽阜阳汝阴侯墓的《诗经》和《苍颉篇》，甘肃武威磨咀子汉墓的《仪礼》，武威旱滩坡的医药简牍，江苏海州汉墓的“衣物券”，广西贵县汉墓的“从器志”，以及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的《孙子兵法》、《孙臧兵法》和《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等。

这里应该特别提到的是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帛书。这批帛书分别写在通高24和48厘米的帛幅上，帛文部分用朱丝栏墨书，字体有篆、隶二

种。篆书本约写于汉高祖时期或早至战国晚期；隶书本则写于汉文帝时期。原藏于漆盒内，出土时边缘磨损，有的粘连比较严重，经拼复，可确定为28种书，约12万字。连同上面提到的简本，新发现的古写本和古佚书可大别为七类：

（1）六艺类有帛书本《周易》、《丧服图》和简本《诗经》、《仪礼》；

（2）诸子类有帛书本《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老子》甲乙本及《黄帝书》、《九主图》等；

（3）兵书类有帛书本《刑德》三种及简本《孙子兵法》、《孙臧兵法》；

（4）小学类有简本《苍颉篇》；

（5）数术类有帛书本《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篆书阴阳五行》、《隶书阴阳五行》、《相马经》、《木人占》、《符策》、《神图》、《筑城图》、《圆寝图》及简本《元光元年历谱》等。

（6）方术类有帛书本《五十二病方》、《胎产图》、《养生图》、《杂疗图》、《导引图》及简本《武威医简》等；

（7）地图类有帛书本《长沙国南部图》和《行军图》二种。

以上七类，大部分失传了一二千年，现在重新发现，最足珍贵，有的可以解决学术上长期争论的悬案。如现存13篇的《孙子》究竟是吴孙子还是齐孙子的问题，由于简本《孙子兵法》与《孙臧兵法》同时被发现，这个历史的疑团便获得彻底的解决。出土的古籍有的虽非佚书，但与传世今本有一定的出入，可供研究参考之用。如帛书本《周易》虽64卦具全，但卦名多假借字，卦序也与今本不同，有人推测可能近于中古文本。帛书《老子》有甲乙两个写本，编次都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不分章，与今本差异较大，可能属于不同的流派。阜阳《诗经》简本包括今本国风，小雅中的80多篇，与三家（鲁、韩、齐）及毛传皆有所不同。简本《仪礼》与今传郑玄所注的《仪礼》有别，与大小戴《礼》也不一样，当是失传了的庆氏本或后氏本。简本《苍颉篇》是汉初闾里书师合《苍颉》、《爰历》、《博学》三篇为55章的修订本，现存仅541字，还不及原书字数的六分之一，但它却是此书亡佚近千年之后最大的发现。它证明前辈对《苍颉篇》体例的推测是可信的。这些古本的竹书、帛书使我们看到了二千年前的古籍的原貌，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可靠的、有关古人用字的

生动资料，对于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的研究关系至大。以内容而言，这些西汉前期的古籍更涉及战国至西汉初年的政治、思想、军事、文化和科学的各个方面，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从史料的角度看，有的古籍甚至连西汉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班固和刘向父子都没有见过，更有特殊的意义。

总之，四十年来所发现的新资料是极其丰富的，它直接影响到古文字学的学科对象和范围，使之不断得到充实和扩展。古文字学除了目前分

为甲骨文、金文和战国文字三个分支之外，很可能要向前追溯到比甲骨文更早的原始文字，向后延续到秦汉间保留着某些古文字特点的简帛文字，从而使古文字学发展成为更加完备的五大分支。

• 本文是作者1989年5月25日在广东语言学会学术报告会上的讲稿整理而成的。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陶原珂



“贄”、“币”辨

李中生

杨宽先生曾作《“贄见礼”新探》一文。^①此文虽不乏新见，但也颇多疏失。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对贄、币的模糊。这一疏失在一定程度上给后来的古礼研究带来了混乱，有必要对它作一补正。

币，是礼物的通称。贄属币的一种，它使用于一种特殊的典礼。当人们初次相见，或有要事相见，来宾都要按照自己的身份和特殊的环境，手执一定的见面礼物，举行规定的见面仪式，这就是所谓的“贄见礼”。在这种“贄见礼”中，用作贄的物品根据等级的不同，有着较严格的规定。《礼记·曲礼》说，“凡贄，天子鬯，诸侯圭，卿羔，大夫雁，士雉，庶人之贄匹，童子委贄而退。野外军中无贄，以纁拾矢可也。妇人之贄，枳、榛、脯、脩、枣、栗。”大体反映了先秦用贄的情况。

然而，《新探》不细辨礼经以及先秦其他述礼之文，把一系列非贄之币也划入了贄的范围。首先，它认为《仪礼·聘礼》、《觐礼》中所献的璧与琮，“私面”、“私觐”所献的束锦、乘马，“劳”“宾”之礼所献的束帛、束锦等等，这些币也同样具有贄的性质。这一说法是否成立是有问题的。

据《仪礼·聘礼》、《觐礼》记载，使者

受君命出国聘问或朝覲君主，既有“贄礼”，也有“享礼”（献其他礼物之礼）。而贄礼先行于享礼（参见凌廷堪《仪礼释例》卷六“凡宾主受贄毕礼盛则行享礼”）。贄礼所用的贄，是见国君用圭，见夫人用璋，享礼所用的币则是享国君用束帛加璧，享夫人用束帛加琮，同时还在庭中设有皮或马以及各种贡物（此在《仪礼》称为“庭实”）。正如刘沅《仪礼桓解》卷八所说，“圭所以为信。束帛加璧则至彼国而君享之用以将敬者。”在聘、覲礼中，最能体现圭璋与璧琮、束帛之区别的，即是否还其物。对于璧琮束帛，接受的主人一方在回赠时改用他物，而对于圭璋束帛，主人只是暂时接受，等到宾去时必须退还。《礼记·聘义》：“已聘而还圭璋，此轻财重礼之义也。”孔颖达疏：“圭璋，玉质，惟玉而已。璧琮则重其华美，加于束帛。聘使既了，还以圭璋之玉，重其礼，故还之。留其璧琮之财，是轻其财，故留之。重者难可报复，故用本物还之，轻者易可酬偿，故更以他物赠之，此是轻财重礼之义也。”

聘礼中，除了使者受君命行聘问之礼，还有“私面”、“私觐”，但“私面”、“私觐”只有享礼，而无贄礼。对此，前人也曾有过明确的解释。贾公彦《仪礼注疏》于《聘礼》：“宾奉束锦以请觐”下解释说，

“为君聘而行私见，故用束锦。非将来，若特来则用羔也。”（私见，即私觐于君，私面于卿大夫。羔，卿所执之贄。）敖继公《仪礼集说》也说，“私觐乃公事毕欲伸私敬也。奉君命而使，则其觐礼宜与他时见国君者不同，故不用其贄而用币与庭实也。”由二说可知“私面”、“私觐”之束锦、乘马，也非贄。

至于将行聘、觐礼，使者初到近郊时，要行郊劳之礼，由国君派卿用束帛来慰劳，即“劳”，使者用束锦来回谢，即“宾”，此束帛、束锦也不是贄。朱熹《仪礼经传通解》所附“郊劳”的客套语，乃“辞，曰：‘非礼也，敢。’对，曰：‘非礼也，敢。’”这一客套语很能发人深省。因为贄是见面礼的化身。《礼记·表記》：“无礼不相见也。”郑玄注：“礼谓贄也。”《仪礼·士相见礼》所记受贄的客套语是，“某不足以习礼，敢固辞。”“某也夫子之践私，不足以践礼，敢固辞”等等。如果“劳”、“宾”所用之束锦、束帛是“贄”，那么，宾主人接受此物时，怎能说“非礼也”的话呢？

其次，《新探》把古婚礼“纳征”之“币”也看作是贄，这同样值得商榷。

古婚礼有六礼，一是纳采，二是问名，三是纳吉，四是纳征，五是请期，六是亲迎。六礼中，五礼执雁为贄，唯纳征用玄纁、束帛、俚皮（兼有庭实），而不用雁。其所以不同，郑玄说是“征，成也。使使者纳币以成昏礼。”《仪礼·士昏礼》的记文曰：“贄不用死，皮帛必可制。”所谓生死，当指雁而言。则“贄”在此乃雁的同义语而不含皮帛。合二说观之，先秦婚礼，既有“贄礼”，也有“享礼”。《通典·五十八》记南朝婚仪时说，“媒人斋礼到女

氏门，使人执雁。主人出，相对揖毕，以雁付主人侍者。媒人进，主人侍者执雁，立于堂下，从者奉案入。……事毕还坐。从者进奉主人前，主人侍者以雁退，礼物以次进中庭。”在此，“行贄”（雁）与“享币”（其他礼物）是泾渭分明的。其礼虽与古六礼繁简不一，但其主要礼节当承古礼而来。

对贄、币模糊不清，自然便导致在研究有关的其他问题时出现偏颇。《新探》把“贄”看成是一种贡纳财物，认为它具有贡纳作用，便是其一。

贄礼的贄究竟具有怎样的一种作用呢？《白虎通·人质》说，“贄者，质也。质己之诚，致己之悃悞也。”《国语·鲁语》：“质之以牺牲。”（质，义与贄同）韦昭注：“质，信也。”作为人们交往时表达诚信的标志，这就是贄所具有的作用。“贄”作为一种诚信的标志，曾广泛地使用于先秦的社会生活之中。《礼记·郊特牲》说，“大夫执圭而使，所以申信也。”这是国与国交往，以圭为贄，表达诚信。《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索隐》引服虔注：“古者始仕，必先书其名于策，委死之质于君，然后为臣。示必死之节于君也。”这是臣下委死禽为贄，表明诚信。《论语·述而》：“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这里孔子的意思是说，有以束脩为贄，表明诚信的，我都可以收他为学生。这是学生拜见老师，以束脩为贄，表明诚信。其他诸如士相见以雉，下大夫相见以雁，上大夫相见以羔，婚礼中婿见公婆用雁，妇见舅姑用枣栗等等，也都是以各物为贄，表明诚信。

贄是一种表达诚信的标志，一般的币才真正具有贡纳财物的性质。《周礼·大宰》：“四曰币贄。”郑注：“币，贡玉马皮帛也。”此处的币指的是一般的币，而不包括贄。用作贄的东西，表面看来好像也是一种财物，但它们作为财物的概念已经淡化。上引“轻财重礼”之义正可说明，贄已被看作是一种“礼”的象征。把贄看作是一种贡纳财物，除了在还贄之礼中，显得完全架空，不攻自破，其次在不还贄的礼节中，它也同样大成问题。在“贄见礼”中，小辈见长辈，臣下见君主，尊长可以受贄而不还，只是表示愿意接受其为小辈或臣下，并不意味着接受贡纳。臣下见君主之贄，用的是死禽。君主如果想接受贡纳，而臣下也一心要贡纳财物，用生禽岂不更妙？而且区区一禽，对于富有之君主又算得了什么？孔子说，“有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不诲焉。”其接受学生的“束脩”，也并非看重它的经济价值。“干肉虽可吃，但孔子对饮食的要求很高，买来的干肉就不吃（《论语·乡党》：“市脯不食。”）送来的也未必吃。孔子没有干肉癖，也不曾开烧腊店，要许多干肉作何处置？”^②对此，张瑞璠先生说得好，“致送‘束脩’的意义主要是表示尊师，而不在经济上的价值。”^③而对于孔子来说，也只是表示接受致束脩者的诚意，收其为学生而已。如果把束脩看作是贡纳财物（即学费），那么，孔子这样一位主张“有教无类”的大教育家，竟然会直言不讳地说出交学费才施教的话，无论如何也难以让人相信。

三

研究“贄见礼”，还有必要弄清这样一

个问题，为什么不用别的东西，而很特别的要用玉、羔、雁、雉、枣栗、束脩等作为贄呢？

古人是这样认为的：君以圭为贄，取其洁净而喻自正其身。《考工记·匠人》“九夫为井”郑玄注：“圭之言珪洁也。”卿以羔为贄，“取其群而不党。卿职在尽忠，率而不党也。”（《白虎通·德论》卷九）大夫以雁为贄，取其飞则行列也，大夫职在奉命适四方，动则以正道事君也。”（同上）士以雉为贄，“取其守介而死，不失其节也。”（《宗伯》）庶人以鹜为贄，取其笃守耕稼。郑注《宗伯》云：“鹜不飞腾，如庶人但守耕稼而已。”女子以束脩，枣栗为贄，取其束己修身，早起战栗。《礼记·曲礼》说“妇人有法始至，修身早起，肃敬也。故后夫人以下皆枣栗，取其早起战栗自正也。”

对于这些解释，《新探》斥之为“显然出于儒家的附会。”认为先秦之礼，“很多是由父系家长制时期的‘礼’转变而来的。‘贄见礼’也是如此，应该起源于氏族社会末期的交际礼节，其所以会很特殊的手执玉、帛、野兽、野禽为‘贄’，就是起源于原始人手执石利器的习惯和互相赠送禽兽的风俗。”“至于妇女用干果和干肉为贄，看来也和氏族末期男女分工有关，氏族制末期男子担任狩猎，女子则担任采集野生果实，并料理家务。后来贵族男子以禽兽为‘贄’，而女子以干肉为‘贄’，也该沿袭原始的风俗而来。”

我们认为，古人的解释尽管有勉强之处，但并不是毫无根据的瞎编。“贄见礼”虽然与原始人手执石利器和互相赠送猎物的风俗不无瓜葛，但同时也与古人以物表

意的习俗相关。《新探》扬此抑彼，这是不分贄、币而造成的又一偏颇。

社会生活中的以物表意，源远流长。在文字产生以前，物件记事曾经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记事方法。在使用物件记事的过程中，先民可以借助于某物，取其形状，颜色、含意或声音来表达自己的意见或较复杂的感情。如送短斧以示宣战；送盐以示友谊；送竹箭以示有紧迫之事^④等等。这种物件表意的原始做法，在文字产生以后，仍会以它“物简意赅”的独特效用而继续为人们乐于使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出现战况的时候，人们用篝火来报警，诉讼的时候，人们通过交纳“束矢”来表示己方理直，坚决要打官司，^⑤所用便完全是古老的物件表意法。先秦“贄见礼”中，各种贄含有不同的象征意义，也同样滥觞于原始的物件表意法。

一般的币未必有以物表意的功能，但贄却必具有这种表意的功能，这与它作为一种诚信的标志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贄的施行只在于它所表达的“诚”“信”的内容，而不在于它的经济价值，所以人际交往的思想交流便落到它所含有的“意”。《新探》将“贄”与币混为一谈，把贄也看成是一种贡纳财物，它之否定贄的以物表意功能，也就不足为怪了。

先秦之“贄见礼”，不仅贄的接受仪式及地点有着较严格的规定，而且执“贄”的高低，身体的姿势、神色、脚步，都要郑重其事，战战兢兢。为什么执贄要如此讲究，而且看得如此关系重大呢？这是当时社会礼的“分”（上下之分、等级之分），与礼的“仁”、“和”相统一的反映。^⑥一方面，“贄见礼”的施行在于巩固和加强社会关系，另一方面，为达到这一目的，还必须有“敬”、“让”等内容作为它的基础。只有敬让，才能保证礼的广泛和长久施行，从而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安然有序。而贄所含有的表明诚信的象征意义，正是这种礼的“仁”、“和”的体现。离开对贄的象征意义的分析，对“贄见礼”中，礼之“分”与礼之“仁”、“和”关系的认识，也就有如雾里看花。

① 载《中华文史论丛》第五辑。

② 罗志田：《“束脩”我见》（《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

③ 张瑞璠：《孔子教育史事杂考》（《文汇报》1962年9月13日）。

④⑤ 参见汪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

⑥ 参见刘泽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88—90页。三联书店出版。1987年10月。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刘斯翰

《封神演义》的阐教和截教考

胡文辉

明代小说《封神演义》，是承袭元代《全相武王伐纣王平话》而扩大改编的。①其增加的部分，实不过假商周之争，自写幻想，②神佛错出，所写阐教和截教二派的斗争，反映了明代道教教派之间的矛盾。

《封神演义》中的阐教和截教都是道教，这是有据可考的。书中讲鸿钧道人一道传三友，这三个弟子中，老子和元始天尊掌阐教，通天教主掌截教；截教门徒叫老子和元始天尊做师伯，而阐教门徒叫通天教主做师叔；三十八回截教王魔对阐教姜子牙说得更明确：“你我俱是道门”（332页），③对阐教文殊广法天尊也说：“我和你一样道门”（337页）；四十七回截教赵公明对阐教燃灯道人也承认：“你师，我师，总是一师秘授，了道成仙，共为教主”（422页），所以阐教和截教同门异派，都是道教。问题是，阐教和截教名不见经传，到底暗指道教中的哪两个教派？

鲁迅先生曾说：“助周者为阐教即道释，助殷者为截教。截教不知所谓……”。④他因没有将截教视为道教，故无从考索。何满子先生认为：“截教的门徒都自称是‘炼气士’，这恐怕和明代道士中得势的丹鼎派排斥吐纳派的教派斗争不无联系。”⑤丹鼎派和吐纳派的说法不知何据。而所谓“炼气”是道教基本的修炼方法，似不能代表某一教派，事实上，书中的阐教门人（如第五回云中子、三十二回黄天化）也有称为“炼气士”的，何满子的说法有失偏颇。

陈辽先生的《道教和〈封神演义〉》一文指出了阐教和截教分别是明代道教的正一道和全真道，⑥但他观察不细，误以为：“在《封神演义》中，老子又被称为‘玄都大法师’、‘玄都大老爷’。”其实书中的“玄都大法师”是老子的下手。作者又

说：“（道教）以全真教（丹鼎派、北宗）及天师道（符箓派、南宗）为两大教派”，“……上层统治阶级信奉北宗、全真教、丹鼎派道教的多，而民间百姓祈求消灾避祸，则信奉南宗、天师正一道、符箓派道教的多。”“《封神演义》中的阐教，乃是符箓派、南宗、天师道道教，截教即道教中的丹鼎派、北宗、全真教道教。”其实，南宗和北宗都是重内丹的教派，王重阳所创的全真道为北宗，内丹南宗后来并入全真道，所以南宗、北宗可以说只是全真道内部的区分，如明代胡应麟所说：“所谓分宗者，实仅一宗之分南北耳，与天师正一道无涉。”⑦另外，明代王室信奉的是正一道而非全真道。⑧作者认为阐教即正一道、截教即全真道的唯一论据是说阐教门人如姜子牙、李靖、土行孙、洪锦等皆娶妻室，所以是正一道的火居道士。⑨这个论据亦极不坚实，因为姜子牙、李靖、土行孙都是还俗以后才结婚的。十二回讲李靖“因仙道难成，故遣下山辅助纣王，官居总兵，享受人间之富贵”（107页），又说“李靖原是道门，怎敢忘本”（108页），可见他已经还俗；姜子牙则是因为“生来命薄，仙道难成”，（十五回，135页）才下山还俗娶妻的；土行孙也是“不能了道成仙，只好修个人间富贵”（五十三回，472页）。所以，阐教门徒还俗结婚，不但不能证明阐教门人是正一道火居道士，相反却正好证明阐教门人是全真道的出家道士（详下）。而洪锦则明明是截教门徒，作者失察了。八十三回洪锦就自称“我也是截教”（776页）。所以，他和龙吉公主结婚恰好说明截教门人也有结婚的，而非非什么出家道士。可见陈辽的论据完全不能成立。

有人猜测：“《封》十分可能暗指当时道教的两个宗派或主流派与非主流派之间的矛盾”，“《封》

的作者可能是被迫害宗派的成员，他的攻击对象是主流派。”^⑩这的确是合理的推想。中国道教入明以后，形成了全真、正一两大派别对峙的格局，其中正一道由于明朝王室的支持，基本占了上风；我认为，〈封〉中的阐教和截教，就是分别指涉明代道教的全真道和正一道的，它站在阐教（全真道）的立场上，攻击占了上风的截教（正一道）。下面作具体的论证。

全真道是宋元之际在北方崛起的所谓“新道教”，元代与同源异流的内丹南宗合流，蔚为大观。清代陈铭珪的〈长春道教源流〉卷一中说：“全真道有取于老佛家之间”，其教义和组织等方面都受佛教很大影响，而〈封〉中的阐教仙人多是缘佛入道的，如李靖、金吒、木吒、哪吒、文殊广法天尊、普贤真人、燃灯道人、惧留孙、慈航道人、韦护等等，其原型都是佛教人物。不仅阐教仙人多以佛教的标志——莲花为护身法术，而且阐教与截教争斗，还受到代表着佛教的所谓“西方教”的大力帮助，如六十一回准提道人收马元，六十五回西方教教主接引道人借青莲宝色旗给广成子，七十回准提道人收孔宣，七十八回接引道人和准提道人助老子和元始天尊破诛仙阵，八十二回、八十三回共破万仙阵，等等。对阐教的这些描写，与全真道深受佛教影响的事实是完全相符的。

全真道受佛教禅宗的影响尤深，全真道北七真之一的马丹阳〈神光璨〉中就有“禅为宗，道为祖”之说；而〈封神演义〉十五回阐教姜子牙作诗有“静坐溪头学老禅”（139页）之句，“老禅”并称，与全真道的宗旨若合符节。明心见性是全真道修炼的首要之法，可以归结为“清静”二字，即〈丹阳真人语录〉所谓“千经万论，可一言以蔽之曰：清静”；全真道主要经典中就有〈清静经〉；而阐教仙人云中子正被称为“清静之客”（第五回，41页）。

全真道还实行禅宗的打坐（静坐）等修行方法，而〈封〉中亦多有阐教仙人打坐的描写，如二十一回“云中子在玉柱洞中碧游床运元神，守离龙，纳坎虎”（188页），三十一回清虚道德真君“在碧游床运元神”（277页），三十四回太乙真人“闲坐碧游床，正运元神”（296页），四十八回“燃灯与众门人静坐，各运元神”（435页），七十五回“惧留孙正坐蒲团默养元神”（695页），等等。

全真道在禅宗影响下，丹禅合一。佛教言性不言命，传统道教言命不言性，全真道则融合佛老，倡性命之说，所以性命双修实为全真道的特色和根本宗旨。而〈封神演义〉中的阐教正是主张性命双修的。第五回云中子所吟之赋有“参玄论道兮究性命之根因”（40页）之语（此句〈尊道赋〉无，为作者所加，详下），八十二回黄龙真人指责截教“不知性命双修，枉了一生作用”（762页），这是阐教即全真道的直接证明。

全真道模仿佛教建立了出家住庵制度，而阐教中人多言出家，如第五回云中子自称“我出家人慈悲为本”（37页），十五回姜子牙还俗前也说“弟子乃真心出家”（135页）。^⑪全真道还有所谓“老君五戒”：戒杀生，戒荤酒，戒口是心非，戒偷盗，戒邪淫，这是佛教五戒的模仿。^⑫十五回姜子牙说：“既出家，岂有饮酒吃荤之理？”（136页），四十一回黄天化“下山吃荤”被他的师父道德真君狠狠斥责（363页），四十八回“赤精子对东昆仑打稽首曰：‘弟子开了杀戒’”（434页）……阐教戒荤、戒酒、戒杀亦表现出全真道的特征。

陕西终南山是全真道祖师王重阳的发迹之地，是全真道的圣山（〈长春道教源流〉卷一）。又据传，全真道所尊的五祖王玄甫、钟离权、吕岩、刘操、王重阳都曾在终南山修道，^⑬而〈封〉中阐教云中子也在终南山修道（第五回，37页）。在汉晋仙话中，广成子住在崆峒山，而〈封〉中的广成子亦自称“曾在终南遇圣人”（四十六回，415页）；这与全真道尊崇终南山大有关系。还有一个反证，据元代佚名〈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三载：赵公明“钟〔终〕南山人也”，但〈封〉却将这截教门人赵公明的出处改作“峨嵋山罗浮洞”（四十六回，417页），这当是有意为之，因为终南山既是阐教（全真道）的圣山宝地，又岂能与势不两立的截教门徒拉扯上？！

还有，第五回云中子向纣王吟了“但观三教，唯道至尊……”一篇赋，这篇赋是据元代道人彭致中所编的全真道诗词集〈鸣鹤余音〉中的〈尊道赋〉（题宋仁宗撰）改编的，^⑭阐教仙人引用全真道诗词，正表明了二者的一致性。

〈曲海总目提要〉卷三十九〈顺天时〉条载：“〈封神〉传系元时道士陆长庚作，未知的否”。孙楷第、张政烺、柳存仁等因之考证以为“元”是“明”之讹，长庚为明代道士陆西星之字。^⑮此说

虽然尚无版本上的直接证据，今就《封》的内容而言，全真道道士陆西星也应当比许仲琳更有可能写出这部从阐教即全真道立场大谈阐、截二教斗争的书。所以，阐教即全真道，与全真道道士陆西星作《封神演义》这一说法可以相互发明。

又据民俗学调查，甘肃永登县的薛家湾人自称是全真道北七真中孙不二的门徒。他们流传着一个“三大教爷斗法”的传说，显然是源自《封神演义》阐、截二教的老子、元始天尊、通天教主三个教主斗法的情节，其中将三教爷通天教主贬为“贼娃子”^⑩，这与《封》站在阐教的立场贬低截教的态度是一致的。而自称全真道门徒的薛家湾人也攻击截教，由此亦可旁证书中的阐教就是全真道。而《封》中与阐教抗衡的截教，推论言之，也只能是明代道教中能与全真道相颉颃的正一道，正如《封》所云：“不归阐教归截教”（八十三回，779页）。

《封神演义》站在阐教立场叙述，所以往往在大加攻击截教之处，表明截教就是正一道。如三十八回阐教文殊广法天尊对截教王魔说：“你截教中逍遥自在，无拘无束”（337页）；四十五回文殊广法天尊又对截教秦完说：“你截教无拘无束，原自快乐”（404页）；四十七回燃灯道人对赵公明说：“道兄无束无拘”（422页）；同一回截教云霄娘娘也说“我截教实是逍遥”（427页）。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全真道较重戒律，而正一道则十分松弛。”^⑪全真道要出家修行，而正一道则可以在家。说截教门人无拘无束、逍遥自在恰是正一道的写照。

截教中很多三只眼睛的人物，如闻仲（二十七回，239页）、吕岳（五十七回，521页）、温良、马善（六十三回，576页）、罗宣（六十四回，587页）都长了三目。据研究，三眼神最初是我国西南“巴蜀氏羌鬼族”的信仰，张道陵在四川改造了“巴蜀氏羌鬼道”，将其纳入道教，^⑫所以早期正一道（称“五斗米道”，后又称“天师道”）有大量的三眼神。^⑬截教门徒多三眼神（人）与这显然有密切关系。

与阐教仙人多居山岳相对，截教仙人多居海岛，如西海九龙岛、东海金鳌岛、三仙岛、蓬莱岛，等等。据陈寅恪先生研究，正一道的前身天师道亦多于滨海地区传播。^⑭《封》中截教仙人多居海岛，可能正是天师道历史的反映。

阐教、截教之称，不见经传。张政烺先生说，

“阐教大约就是阐明正教之意”，这大致正确，但他又说，截教的通天教主是借古人“通天神狐”的说法得名：“通天神狐醉露其尾”，而截教的截字就是割尾巴。^⑮这是猜笨谜。明代《汉天师世家》云，太上授张天师以“通天玉简”，我以为，截教通天教主得名可能与此有关。因为截教即正一道，那么通天教主理应是正一道的教主张天师。截教的“截”则是“正一”一词的快读合音，是《封神演义》的作者杜撰出来的名目。至于阐教得名，书中是有迹可寻的：五十四回有“阐道法扬真教主，元始天尊离玉池”（454页）的诗句，第九回有“昆仑山玉虚宫掌阐道法宣扬正教圣人元始天尊”（82页）的称号，作者似乎是有意无意地透露阐教之“阐”的来源就是第五回云中子所吟《尊道赋》中语：“阐道法，扬太上之正教。”

《封神演义》是一部“谤书”。^⑯阐教攻击截教，实质上就是全真道攻击正一道。然究其攻击的原因，一般全真道侧重丹鼎，讲究保精养神，修性养命，较为高雅，较合士大夫的口味，而正一道（截教）侧重符箓，讲究斋醮符咒，道术较为鄙俗，属于形而下一类，所以被全真道（阐教）攻击为“左道之术”、“幻术”。《长春道教源流》卷一说：“道家者流，以清静为宗，折衷斋醮其末也。”柳存仁考证，《西游记》中的全真道攻击外道旁门正如此说，^⑰《水浒传》九十六回公孙胜对乔道清的攻击，也是基于外道与正法不能相容，可见这一观念在当时是很普遍的。但实际上，符箓斋醮是道教的基本法术仪式，全真道道士也一样精通，^⑱所以在《封》中阐教门人也一样使用那些“左道之术”。如姜子牙也会压星收妖（十六回，143页），也会五雷法（三十八回，334页），也会“布罡斗，行玄术，念灵章，发符水”（三十九回，346页），被称为“昆仑左术之士”（六十八回，628页）。四十八回陆压以“钉头七箭书”射杀赵公明，更是最低级的小人法术。书中又说到“二教门下，俱会五行之术”（五十回，450页）。因形、行音同易混（如“太行山”在《列子·汤问》中就写作“太形山”）“五行之术”在《封》中也写作“五行道术”（六十八回，628页；七十四回，677页），“五形道术”（第五回，40页），“五形遁”（五十八回，530页）。既然全真道和正一道一样都乐于使用“五行道术”，那么正一道（截教）使用“五行道术”就不是全真道（阐教）攻击它的真正原因了。其攻击的根本原

因，在八十二回“三教大会万仙阵”中有一段对话表现得很清楚：

……燃灯点头对众道人叹曰：“今日方知截教有这许多人品，我教不过屈指可数之人。”……内中有黄龙真人曰：“众位道友，自元始以来，惟道独尊，但不知截教门中一意

滥传，遍及匪类，真是可惜工夫，苦劳心力，徒费精神；不知性命双修，枉了一生作用，不能免生死轮回之苦，良可悲也。”

七十七回元始天尊也指责通天教主“不择是何根行，一意收留。”（713页）可见是因为截教人多兴旺，才被谤为“一意滥传，遍及匪类”的。

- ① 赵景深《〈武王伐纣王平话〉与〈封神演义〉》，载《中国小说丛考》，齐鲁书社，1980年版。
- ②④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170页—171页。
- ③ 文中注明的页数皆引自《封神演义》，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 ⑤ 何满子《漫谈〈封神演义〉》，《文史知识》1987年4期，25页。
- ⑥⑨ 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7年5期。
- ⑦ 转引傅勤家《中国道教史》，上海书店1984年影印，207页，211页。
- ⑧ 庄宏谊《明代道教正一派》，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版，3页，22页，137页，181—182页。
〔日〕洼德忠《道教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249页。
- ⑩⑫ 封著《〈封神演义〉谈》，《读书》1984年7期。
- ⑪ 四十六回散人乔坤对截教孙天君说，“尔等虽是截教，总是出家人”（416页），可见截教也有出家的。这与正一道并不矛盾，正一道道士也有在家、出家两种。可参考《明代道教正一派》103—104页。
- ⑬ 参见《宗教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167页。
- ⑭ 转引自傅勤家《中国道教史》，208页，212页，213页。
- ⑮⑯ 可参考〔澳〕柳存仁《全真教和小说〈西游记〉》，载“《台湾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特辑”《中国古典小说论谈》，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84页，87—88页。
- ⑰ 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171页。
张政烺《〈封神演义〉的作者》，《独立评论》203期，1930年七月。
柳存仁《〈封神演义〉作者陆西星》，《宇宙风》24期，1940年5月。
- ⑱ 柯扬、赵宝玺《薛家湾人的职业及其信仰习俗》，《民间文学论坛》1988年5、6期合刊。
- ⑲ 华颐《道教的戒律与清规》，《文史知识》1987年5期，41页。
- ⑳ 蒙文通《道教史琐谈》，载《蒙文通文集》第一卷《古学甄微》，巴蜀书社，1987年版。
王家佑、李远国《酆都“鬼域”考》，《四川史研究通讯》1983年1期。
- ㉑ 见李远国《试论〈山海经〉中的鬼族——兼及蜀族的起源》，载《山海经新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202页。
- ㉒ 《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载《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 ㉓ 《〈封神演义〉漫谈》，《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4期。
- ㉔ 葛兆光《道教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283页。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陶原珂

魏晋南北朝隋唐经学论略

章权才

从公元220年曹丕称帝，至公元907年后梁朱晃建国，近七百年，历史上称为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诸方面，都很具特点。在当代社会科学家中，研究这段历史的专家并不乏人，著作也很可观。遗憾的是，有关经学史的研究，却大体上仍然是个空白。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需要努力解决的课题。

(一)

经学是西汉初年，随着地主阶级统治地位的巩固而登上政治舞台的。在当时是作为统治思想而出现的。儒家的典籍被钦定为“经”，有了“经”，也就有了“经学”。最高统治者对经学怀着特殊的感情，武帝如此，西汉和东汉各朝各代的统治者也莫不如此。

进入魏晋南北朝隋唐，经学所处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有没有发生变化呢？过去有些学者认为，这个时期是经学的衰落时期，是经学的崇高位置受到挑战，并先后被玄学和佛学置代的时期。我们不作如是观。我们认为，经学既是两汉的统治思想，同时也是魏晋南北朝以至隋唐的统治思想，从两汉至隋唐，经学的内容和表现形式是有变化的。地主阶级历史地位的变动，统治思想的生产和再生产，决定了经学及其教义决不可能是一成不变。但变化不等于衰败。诚然，玄学和佛学，先后成了魏晋南北朝和隋唐的显学，但它们始终无法取代经和经学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崇奉莫替的位置。

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各朝各代统治者褒奖经学和崇儒重教的指导思想是一清二楚的。这可从各朝正史和有关记载中得到充分印证。《晋书》记载司马懿“博学洽闻，伏膺儒教”，《儒林传》记

载司马炎上台后更加重视经学，建学校，幸辟雍，选人才，把众多宿德耆儒推上显赫的位置。《梁书》载武帝天监四年诏云：“二汉登贤，莫非经术。服膺雅道，各立行成。”七年复诏云：“建国君民，立教为首；砥身砺行，由乎经术。”《北史·儒林传》云：“魏道武初定中原，始建都邑，便以经术为先，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隋书·儒林传》云：“高祖膺期纂历，平一寰宇，倾天纲以掩之，賁旌帛以礼之，设好爵以廉之，于是四海九州强学待问之士靡不毕集焉。……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新旧《唐书》中的《儒学传》，都详细记载了唐高祖、唐太宗崇儒重教的史实。值得指出的是，各朝各代的有关诏书，许多都把崇儒重教放在“为首”、“为先”的位置，这说明，西汉以来经和经学受到尊崇的情况并没有明显改变。

魏晋时期风靡一时的玄学跟经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玄学有其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过程。玄学家内部也决不是铁板一块。但有一点肯定无疑：玄学的出现决不意味着对经学的否定。魏晋时期的主要玄学家如王弼、何晏，他们以孔子为“圣人”，位置摆在老子之上。魏晋流行的“三玄”，其中之一是儒家经典《周易》。主要玄学家既有玄学方面的著作，又有经学方面的著作。玄学的理论构成，其中许多观点的形成，也跟经和经学息息相关。事实表明，从某种角度上说，玄学是经学的理论升华，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对各家学说的综合。把玄学与经学割裂开来以至对立起来的观点，是经不起推敲的。

佛教是外来宗教。它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至魏晋南北朝隋唐迅速流播开来。佛教的传播对

汉唐上层建筑发生过重大影响。汉唐时期的统治者多数是佛教的虔诚信徒，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在信佛的同时，决没有忘记崇儒。例如，北魏孝文帝是信佛的，在他倡导下，当时的徐州成了名僧聚居之地，僧渊、僧嵩、道登、慧纪、昙度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所传《涅槃》、《成实》、《毗昙》之学，广布于燕齐赵魏等地。但正是这个孝文帝，在崇奉佛教的同时，又大力褒扬经学。《北史·儒林传》称：“孝文稽古，笃好坟籍，刘芳、李彪诸人以经求进，崔光、邢峦之徒以文史达，于是斯文郁然，比隆周汉。”又如肖梁，梁武帝推崇佛教，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甚至多次舍身入佛。但也是这个梁武帝，在推崇佛教的同时，又极力推崇经学。天监三年，他皈依佛教；天监四年，他却下诏褒扬儒术。天监五年，他征引扶南僧人僧迦婆罗于寿光殿翻译佛经；天监七年，他又诏令皇太子宗亲王侯就学，接受有关经学方面的教育。梁武帝对佛经，颇有撰述，如《制旨大涅槃经讲疏》百一卷，《小品注解》五十卷，《三慧经讲疏》若干卷等。但，他对经学也颇有研究，所著《孝经义》、《尚书大义》、《周易大义》、《礼记大义》、《中庸讲疏》、《毛诗答问》、《春秋答问》等，也是当时左右经学界的最高学问。由此可见，魏晋南北朝隋唐，佛教虽然影响甚大，但它终究无法取代儒家思想的正统且受到崇奉的位置。

魏晋南北朝隋唐，有关经学的著作汗牛充栋。据朱彝尊《经义考》统计，主要经学著作，《诗》学不下70部，《尚书》学不下60部，《三礼》学不下200部，《易》学不下200部，《春秋》学不下170部。还有许多有关《论语》、《孝经》、《尔雅》方面的著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连篇累牍的经学著作中，许多是御用儒家所撰，有些则是历代最高统治者所撰，所谓帝王经学占了相当的篇幅。经学著作数量之多，从另一角度说明，这个时期的经和经学，仍然是受到当时最高统治者所重视、所鼓励、所支持的统治思想。

(二)

纵观近七百年经学的流布与变迁，有如下几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这是经学由分而合的历史过程。皮锡瑞《经学历史》把魏晋南北朝说成是“经学分立时代”，而把隋唐说成是“经学统一时代”。他认为这

七百年经学历史的发展，存在着由分而合的总趋势，这个观点是可取的。众所周知，两汉经学是当时地主阶级的统治思想；既然是统治思想，也就内涵着相对统一的最高要求。统治阶级对经学从来没有放任自流；相反，它总是通过立学、立师和经学讨论会，甚至通过御注和讨论会中的“称制临决”，对经学理论形态的生产和再生产，进行强而有力的干预和导向。西汉中期召开的石渠讨论会和《石渠奏议》的成书，以及东汉初期召开的白虎观讨论会和《白虎通》的撰作，都是最高统治者对经学理论形态的生产和再生产，进行直接干预的最好例子。这是问题的一面。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经学的统一又是相对的。地主阶级历史地位的变化、统治阶级内部的派别斗争、中央集权的强弱明晦、经学家的政治和思想倾向、经和经学的抄本或版本在流传中的是非曲直，诸如此类的因素，都不同角度和不同程度地影响着经学的变态。事实是，两汉经学确实存在着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和综合经学的分野；而不同派系内部，又往往派生出诸如师法、家法和一家之言的问题。东汉后期王权的旁落，意味着最高统治者对意识形态生产再生产干预力量的削弱，其直接后果是促使原已出现的“家法林立”局面的强化。两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政治的分裂，又使经学进一步朝着南辕北辙的方向流去。“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这是《北史·儒林传序》中所说的一句话。这表明，南北朝时期，南北经学在经义阐发和治学风格上确实存在很大的不同。但是到了隋唐，随着政治统一局面的形成，经学的发展也随之出现新转机。隋代，经学是由分立而综合；唐代，经学是由综合而统一。隋代刘焯、刘炫和陆德明的经学，体现了南北经学的综合。唐初《五经正义》的钦定和后来《九经正义》的出现，则体现了经学在综合基础上的进一步统一。这些通过最高统治者钦定颁行的经学，也就成了日后明经取士的主要根据。

第二，这是经学从章句训诂之学向义理之学逐步发展的历史过程。自西汉儒家独尊局面形成以后，经学成了两汉的官学。但在治学风格上，却一直存在着章句训诂之学和义理之学两种方法的对立。章句训诂之学的特点是寻章摘句，烦言碎语，结果是窒息了经学的生机。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如此针砭：“古之学者，耕且养，二年而通一艺，存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

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未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祸也。”于是物极必反。到魏晋以后，曾经在西汉热闹过一时的经学中的义理之学，又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发展起来。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学中探究天人之际，阐发本体论的哲理迅猛发展，其标志是玄学的出现；隋唐时期，经学中的政治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其标志是《五经正义》中有关“义”的钦定。经学受到重视的程度，取决于经学中的经义满足现实政治需要的程度。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经学中义理之学的发展，也就使经学的社会和政治价值得到提高，使它在统治阶级心目中的地位得到加强。

第三，这是三礼之学实现了新发展的历史过程。魏晋南北朝隋唐的经学，有两个显学：一个是《易》学；一个是三礼之学。《易》学从天人之际、从哲理方面进行纲维；三礼之学则从情性、从伦理道德方面实现纲维。礼的核心在于“分”，分尊卑，分贵贱，分上下。阐发这种礼义的礼学，从荀子开始已经理论化，而在两汉以后则实践化了。这样的礼义，一向受到历代统治阶级的普遍重视。但历史事实表明，不同时期，礼学所发挥的社会功能是不尽相同的。如果说，两汉时期，礼学的社会功能重在维护君权；那么，魏晋南北朝以后，礼学除巩固君权外，主要是围绕巩固族权而展开。这跟世家豪族势力的迅猛发展息息相关。这个时期的三礼之学，主要是迎合世家豪族各方面的需要：一方面是迎合他们炫耀门户的需要；一方面是迎合他们在宗族内部实施约束的需要。这个时期，礼学家人才辈出，有关著述十分宏富。值得指出的是，这个时期有关“丧礼”的著作尤多，可统计的不下五十部。主要经学家如王肃、杜预、贺循、裴松之、雷次宗、周续之、刘瓛、何佟之、皇侃、沈文阿等等，都曾围绕丧礼大做文章。他们推崇丧礼，目的是炫耀死人，并以死人约束活人。由此可以看出，魏晋以降三礼之学的发展，是世家豪族的理论要求，也是经学趋向保守化的一方面表征。

第四，这是经学为北方更多的少数民族统治者所接受所传扬的历史过程。可以这样说，经和经学，在其发端的时候，是北方农业民族主要是

汉族的意识形态。其中所包含的种种礼仪，最初显然是这个农业民族原始风俗习惯的凝聚。它那逐渐丰富起来的统治方术，多数也是这个民族的统治者在阶级分化后，在维护统治秩序实践中的理论选择。两汉时期，经学的地缘界线，主要也是局限在中原一带。但是，历史进入魏晋南北朝以后，情势不同了，北方少数民族的社会生产力发展到新阶段，经和经学开始进入北方少数民族的政治和文化生活。史载，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大都通晓经学，不同程度但却毫无例外地都重视经学教育。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八有一个条目，叫“僭伪诸君有文学”，陈登原《国史旧闻》第一分册也有一个条目，叫“五胡诸豪有才学”，谈的就是这方面情况。与五胡诸豪相较，北朝统治者崇儒重教的情况更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在《北史·儒林传》中有着详细的记载。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接受经学，是因为中原汉族文化较他们先进。史实表明，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进主中原后，由于社会发展的阶段差异以及中原一带经学的固有特点，他们接受经学，首先是接受经学中的以郑学为代表的章句训诂之学，而后才是接受经学中的带有玄学色泽的义理之学。他们接受经学的目的，一是在于使自己进入正统；一是在于加速自身的汉化；一是在于争夺知识分子，以便同南朝作更加有效的斗争。客观上则起了强化中国的政治文化统一和促进民族融合的作用。

第五，这是经学在同以佛教为代表的外来文化相互交流中进一步充实自身理论体系的历史过程。近七百年中，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一件大事是佛教的东渐和随之而来的中外文化第一次大交流。外来的佛教所以能在中国本土传扬开来，首要原因在于中国历代统治者的利用。佛经的翻译，寺庙的兴建，僧侣种种特权的赋予，西向取经官员的派遣等等，都体现了这一点。这时，统治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已握有两手：一手是传统的经学，一手是外来的佛教。儒家思想既是入世的，也是出世的，但主要还是入世的；佛教教义既是出世的，也是入世的，但主要还是出世的。在维护统治秩序方面，两者从不尽相同的角度发挥各自的功能。统治阶级以神道设教的宗旨，又使两者得以并行不悖。但是，既然把两种文化绞在一起，它们之间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碰撞，因为碰撞，也就出现吸收、扬弃和孕育新的文化形

态的问题。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化发展的史实表明，两种文化碰撞，结果是外来佛教有所变态，而传统儒学也有所改观。在统治阶级的意向和佛教教义作用下，经学家队伍出现分化，有的成了亦儒亦佛，有的成了弃儒入佛，有的则表现为以佛反佛。经学理论也朝着两方面发展：一方面是经学中原有的唯心主义发展了；另一方面是经学中原有的唯物主义也发展了。佛教的变态则表现为在吸收中国固有文化过程中，逐步形成中国自己的佛教派系及各具特色的理论体系。

(三)

如何从总体上评判魏晋南北朝隋唐的经学价值呢？这牵涉到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问题。

过去有些学者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最大特点是“黑暗”，政治上的黑暗必然导致思想文化上的黑暗。因此，他们对这段时期的经学、玄学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其他方面，多取否定的态度。他们用极多篇幅描述当时的知识分子群体如何清谈放逸，如何消极遁世。这些著作在人们面前展现的图景是灰色的、死气沉沉的，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呢？

不可否认，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动荡、大分裂时期。这个时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十分尖锐。农民战争、民族战争连续不断，社会生活动荡不安。面对着这样的局面，知识分子包括经学家中的一部分人或者感到前途渺茫而消沉下去，或者感到痛苦而寻求精神解脱。世家豪族的享乐主义也因此而抬头。这样的社会现实必然影响到经学理论形态的生产和再生产。于是，经学中的天命论、谶纬论、贵无论、复古论、出世论以及礼学中一整套迎合世家豪族需要的理论，便一时甚嚣尘上。有些经学家和玄学家崇尚清谈，甚至发展到放浪形骸、蔑视礼法、背离经学传统教义的地步。在经学史、思想史研究中，看不到实际存在的黑暗和腐朽的方面，显然是不对的。

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变乱的社会现实也容易引起知识分子的理论思考。变乱远远没有使所有经学家和知识分子消沉下去。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从不满足现实发展到企图改变现实。他们从经学理论中寻求出路。于是，促进了当时经学中从经义到治学方法的变革，这种变革思潮，肇始于东汉之季，到魏晋南北朝形成高潮。东汉桓灵时期郑玄、何休等人的经学，内涵着变革时政的要求；三国时期刘表支持的荆州学派表现出反传统经学的倾向；魏晋之际的正始玄学，跟正始改革有着内在联系；王弼的“排击汉儒，自标新学”；范宁的《谷梁集解》对当时漫延的玄谈多有诟病；范缜的经学有着浓烈的反宗教迷信的色彩。这些，都从不同程度和不同角度地体现了当时的变革思潮。他们提出的变革论、一统论、崇有论、有为论、反佛论和一整套反腐败的理论，在变乱的魏晋南北朝，都不失是具有进步意义的理论，是这一时期经学中的闪光点。

隋唐经学的综合统一，是政治统一趋势的必然结果。它回过头来又对政治统一起了很大的反作用。唐代的明经取士，一准于《五经正义》，它是汉代所倡导的“经明行修”政策的继承，是经学在更大范围内的贯彻。《五经正义》陶冶造就了一批统治人才。但经义一旦钦定，便转化为教条，结果是束缚了人们的理论思维，也孕育着人才培养的宗派化。到唐中叶后，随着庶族地主的迅速成长和武则天上台，唐初钦定的《五经正义》已难以适应他们的要求，于是又出现了变革传统经学的呼声。王元感、啖助、赵匡、陆淳、刘知几等等，就是经学新派的代表人物。他们在经学史上的地位是不仅打破了当时经学研究中的沉网局面，吹入了一股新鲜气息，而且开了日后宋学的先河，直接影响宋代以后的经学表现形态。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科联

责任编辑：凌峰

洋务运动的批判者——郭嵩焘

吴义雄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把郭嵩焘看作“洋务运动的理论家”，“洋务派内部的批评者。”通过对郭氏关于洋务运动以及中国近代化等问题的看法的分析，便会发现这一观点是对郭嵩焘思想的误解。

19世纪中后期，“富强”成为进步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僚的共同追求。洋务运动为富强的实现提供了一条途径。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当民族资本主义还处于幼芽状态的时候，洋务企业不管有多少应该批评之处，无可争辩的是中国近代化运动的象征。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洋务派领袖，不断实践并完善由他们开创的这种发展方式，赋予洋务运动以独特的政治意义。

但是，由封建官僚来具体领导近代化运动，以国家力量来组织这种改变历史面貌的经济活动，毕竟是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特殊现象。这种追求富强的方式，除了同时代的日本外别无他例。而在当时的中国，洋务运动作为发展军事和经济势力的主要形式，也没有获得全面的赞同。郭嵩焘就长期在各种场合对洋务运动发出激烈的指责。

郭氏从60年代开始，就认为追求富强是拯救、振兴中国的不二法门。在70年代后期出使英国后，更认识到实现富强的重要意义，“虽使尧舜生于今日，必急取泰西之法推而行之，不能一日缓也。”^①但他几乎从洋务运动诞生的时候开始，就对它抱着批判的态度。同治十三年（1874）底，总理衙门奕訢等人提出关于当时国家事务的6条意见，包括发展洋务运动和整顿内政等，清廷令全国高级官吏讨论。时任福建按察使的郭嵩焘即呈上《条议海防事宜》，系统阐述了自己对自强与洋务运动的看法。他认为，“自强”固然是中国的当务之急，但“行之必有其本，施之必有其

方。本者何？正朝廷以正百官，大小之吏择人而任之，则本立矣。方者何？求富与强之所在而导民以从之，因民之利而为之制，斯利国之方也。”西方的强盛，正在于其“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这就是说，国家政权在求得“自强”过程中的任务，只是整顿吏治以立自强之“本”，同时引导百姓去从事具体的求富求强的活动。在他看来，西洋“国家大政，商贾无不与闻者”，各国政府“皆有保护商贾之心”，所以能“资商贾之力以养兵。”而中国则相反，“上下之情太隔，彼此不相顾恤”，“商人与官积不相信。”封建国家既不保护商贾，商贾也就对国家利益漠不关心。中国与西洋“贫富强弱之势即于此分。”所以，他主张国家应改善与商贾的关系。朝廷应做好4件事：“急通官商之情”，“通筹公私之利”，“兼顾水陆之防”，“先明本末之序。”如能这样“人民日就义安，边疆自臻绥谧”，经济得到发展，自强也就实现了。至于具体的经济活动，国家不必参与，主要应由“商贾”承担。西洋都是“广开口岸，资商贾运转”，中国应该鼓励商人振兴实业，“令沿海商人广开机器局”，造船制器。总之，“以中国之大，土田之广，因地之利，皆可使富也，用民之力，皆可使强也。”关键在于朝廷要确立根本，摆正本末关系。

从以上观点出发，郭嵩焘对当时众所瞩目的洋务运动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反对意见。针对洋务派正忙于造船制械以求“自强”，他认为“竭中国之力，造一铁甲船及各兵船，布置海口，遂可操中国之胜算，而杜海外之覬覦”是很不现实的。因为“自古国家大利之所在，皆成于渐而起于微，断无一蹴而即臻富强之理。”洋务派“怀欲速之心以急责海上，将谓造船、制器用其一旦之功，遂

可转弱为强，其余皆可不问，恐无此理。”洋务运动中的种种做法，既不能立其本，又无法治其末，所谓“自强”，只能是无稽之谈。只有依靠广大商贾的力量，使整个民族经济发展起来，才谈得上真正的富强。为了办洋务，而“科敛以应一时之需，竭蹶经营而求自强，家国生民必有承其害者，其势亦万难持久。”^②

不久以后，郭嵩焘出使英法，对两国社会进行了两年多的考察，对西方资本主义有关富强的种种问题，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与此同时，洋务运动以更大的气势开展起来，范围上从军事工业扩展到民用企业，目的上从抵御西方的军事入侵扩展到牟取经济利益。郭嵩焘归国以后，痛苦地发现中国富强事业的进程与他所设想的理想途径相去越来越远，他所了解的西方得以富强昌盛的秘诀，被中国那些以求富求强为职志的政治家所漠视。他觉得洋务派把中国引向了一条毫无希望的道路。因此，他更积极地鼓吹他那种依靠“百姓”、“商贾”发展经济的主张，更激烈地抨击洋务运动。

在洋务派看来，“富强”就是指封建国家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对内对外都建立起令人敬畏的权威。这种“富强”与人民大众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郭嵩焘针对这种观念，指出洋务派官僚虽然口口声声仿行西法，却不知“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③“泰西富强之业，资之民商，……其人民趋事兴工，日增富实。”^④整个社会的财富增长了，国家自然强大起来。西方各国虽然不是由官方来组织、从事经济活动，却能日益强盛，原因就在于“其国家与其人民交相维系，以利为程。所以为富强者，民商厚积其势以拱卫国家，国大者数千里，小者一二百里，莫不皆然。”在军事上，一有“大兵大役，皆百姓任之。”^⑤所以，通过人民的富实现国家的强的道路，应是中国的富强之路。

但是，国家并不是历史发展过程中被动的受益者，它虽然不必、不能从事具体的经济活动，但它毕竟从宏观上控制着整个社会，能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政治上的保证，运用它的权威，在实现富强这个目标之下，建立起一种新的政治秩序、社会秩序。这就是“立富强之本”。同时，国家对于“民商”，还应该“用其全力护持之，”维护他们的利益，象西方那样“立国之势与民共之，百姓有所为利害，国家皆与赞其成而防其患。”^⑥

这样，国家才能与人民相得益彰。

郭嵩焘由此对当时如火如荼的洋务运动几乎全盘否定。他指斥洋务派的企业活动是与民争利。他认为自然财富并非专属国家所有，“即以湖南矿产言之，所在皆民业，无官山。”^⑦各种“天地自然之利”，如煤、铁等，“果为利之所在，百姓尽能经营，无待官与开采。”^⑧洋务派一定要将产权收为官有，那就是“强夺民业”，“百姓岂能顺从？”^⑨更为荒谬的是，洋务派为了进行垄断，“禁百姓不得有兴造。”^⑩这样，“言富强者，视以为国家本计，与百姓无涉，百姓又各怀挟私意，觊其利而侵冒之”，^⑪完全没有西方那种上下合一的和谐关系。在给李鸿章的信中，他质问：“今言富强者动曰急行西法，抑知西人所以富强果安在乎？”^⑫洋务派的一切举措，在他看来只是“徒滋纷扰，终无裨益。”^⑬80年代后期，评论张之洞在两湖办“新政”时还较温和：“鄂中新政，……其为富强之计，则固未尝就中外情势参稽互证，以辨其轻重缓急之宜也。”^⑭而在给李鸿章的另一封信里，则尖锐抨击：“香帅大言炎炎，读者心折。嵩焘视其事，无一语可为据依。”“乌在其为富强哉？自取穷困而已。”^⑮对洋务派官僚大造铁路的计划，他不以为然，认为主办者“尽国家之利，囊括以举之，委输以糜之，相与以兴铁路”，不过“为名而已。”当时中国的国力还不足以大力兴造铁路，“嵩焘所虑者，独谓国家物力未足以堪之。将谋为富强之计，所费过巨，收效尤难，非经过之义也。”洋务派操纵政府倾囊倒篋以建造铁路，显然与西方各国的富强之路大相径庭。总之，在他眼里，洋务运动的一切活动，都不过是“务为奢侈”，“耗国病民。”他在晚年，政治上颇不得志，但他还是积极通过各种途径影响舆论，向决策者游说他的主张，对洋务运动的竭力反对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以上这些无疑可以证明，郭嵩焘决不是什么“洋务运动的理论家”。也不是“洋务派内部的批评者。”他站在与洋务派完全不同的立场上，全盘反对洋务运动，从理论上否认洋务运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是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激烈反对者。

二

同是开明高级官吏，郭嵩焘却有如此独特的思想认识，自有其具体的原因。第一，与洋务派官僚不同，他有一段独特的经历，那就是他早年就同西方事物有过频繁的接触，与西方人士有过甚为

密切的交往。还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就开始对西方社会进行研究。到出使英法以后,亲身生活在西方社会中,受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巨大影响。他看到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一般都由私人从事,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使社会经济呈现出活跃的状态,整个民族经济的发展为国家的“富强”奠定了基础。国家政府机构一般都不从事具体的企业活动,而主要是为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提供制度上的保证。郭嵩焘认为这是走向富强最为合理的途径。但是他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精神实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谈不上有真正的理解,只是感到它们与西方的繁荣有密切的联系;他又按照中国传统的政治概念,将之比附为统治阶级常说的“纪纲法度”、“人心风俗”,于是就强调清政府应以整顿吏治、教化人心为职志,把发展经济的具体任务交给“百姓”、“商贾”去承担。

第二,郭嵩焘虽然已经隐约觉察到历史巨变的大势,但他还是不能把未来的社会与他所处的封建社会完全区别开来。他把“富强”的实现与历代封建盛世混为一谈,认为“富强者,秦汉以来治平之盛轨也,常数百年一见,其源由政教修明,百姓家给人足,乐于趋公,以成国家磐固之基,而后富强可言也。”^⑩而由官方投资或控制来兴办各种企业以求富强,则是历代封建盛世从未有过的做法,这就成了郭嵩焘反对洋务运动的又一个理由。

第三,洋务企业在举办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病也是郭嵩焘反对官办、主张民办的一个原因。洋务企业中大小官僚贪污营私,黑幕重重,管理混乱,经营腐败,洋务派通过企业活动求富求强的企图根本无法实现。郭嵩焘目睹这种种情形,毫不客气地对洋务运动大加指责,否定它的现实意义。

第四,更为深刻的原因是在国家观念上,尤其是对国家职能的理解上郭嵩焘与洋务派存有差别。洋务派从他们举办企业活动的时候起,就把经济活动也看作封建政治的一个重要内容。他们形成了一种新的观点,不仅把国家政权理解为政治实体,而且开始将之理解为经济实体。国家不仅具有统治的功能,不仅可以造成政治上、文化上的秩序,而且可以在新的形势下领导新的社会经济生活,在数千年未有的绝大“变局”中,将经济与政治、文化等一体化,把社会活动的若干主要方面都统一到各级政权中去,以达到封建国家

权威的重建与扩大,形成新的意义上的大一统。这实际上是封建主义的一种自救形式。对国家职能从而对国家概念的这种理解实际上成了洋务运动最基本的理论基础。而郭嵩焘所否认的,恰恰就是这种基础。他指出国家在求富求强的活动中要端正“本末”关系,将整顿吏治、人心风俗作为国家政权所应发挥的职能,也就是认为国家只应有政治、文化的功能。他呼吁国家通过努力,造成政治上和思想文化上的新秩序,以保证富强事业顺利进行。他虽然不反对与封建国家的安危密切相关的重大设施,如电报、铁路,政府可以投资兴办,但反对封建国家把参与经济活动作为它的基本职能之一。

与此相联系,郭嵩焘与洋务派的富强观也不相同。洋务派把“富强”主要理解为作为统治机构的“国家”的富强,并认为它与人民的生活、与整个社会的进步没有直接关系。郭嵩焘则同时把“富强”理解为人民的广泛富裕和整个社会的发展,而“国家”的富强只有在此基础上才可能实现。他认为没有“百姓困穷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⑪这种认识使他进一步提出一个重要的论点,那就是人民的精神状态、道德水平和基本素质如何是一个民族能否实现富强的关键。他指出,“西人富强之业,诚不越矿务及汽轮舟车数者,然其致富强固自有在。”^⑫所谓“固自有在”,就是“有本有末”。“本者何?人心风俗而已矣。”^⑬这里的“人心风俗”,实际上就是指一个民族的素质、道德水平和精神状态而言。经过在西方的实地考察,他为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西方人勇猛进取的精神所折服,认为这种“遇事求进无止”的精神难能可贵,赞叹“西洋人心日进”。有这样的“人心风俗”作为基础,“其勃然以兴,又何疑哉!”这样,郭嵩焘就把富强与一般民众更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从而显示出与洋务派的更大区别。

三

郭嵩焘与洋务运动的三巨头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都是朋友,加上他的丰富经历和独特个性,使他在湘淮两系的官僚集团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而持续了几十年的洋务运动,主要是由这两个集团的官僚们发起并进行的。并且,他在思想上开始放射光彩的时代,也正是洋务运动开始并得到发展的时代。他宣传的对西方的新认识,是对洋务运动的有力声援。他所孜孜以求的“富强”,也正是洋务派喊得最响的口号。——由

于这些原因，人们把他当作洋务派阵营的人物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却是不正确的。

如果说早期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是早期改良派，那么郭嵩焘无疑也不属于这个阵营的代表。他的富强观，他对富强之路的探索，他对洋务运动、洋务派的抨击，无疑有许多积极、进步的因素。他坚持主张通过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来实现国家的近代化，呼吁保护“商贾”的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早期民族资产阶级的愿望和利益。但是，他没有象早期改良派那样，要求引进西方的政治观念、行政体制来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只是笼统地强调政府要立富强之“本”，基本上没有涉及政治改革的问题。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急需舆论支持的时候，他却对它的前途抱着绝望的态度，不断发出各种悲观的论调。在晚年他认为，实现富强的根本是“人心风俗”，但“中国人心日退”，江河日下，不可收拾，与西方那种理想的人心风俗相比，“中土人无从希其万一也。”^①由此他认为中国富强事业的前景不佳，“以今日人心风俗论之，必有圣人接踵而起，垂三百年而始有振兴之望”，^②而在当时，中国人所应该做的，不过是“守国使不乱，以待奇才之出。”^③——因此，他也不属于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早期改良派集团。

这样，通常划分19世纪中后期中国政治人物的几个范畴，显然都不适合于郭嵩焘。其实也没有必要把他归入后人概括出来的什么“派”中去。他是在激烈动荡的历史转折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

独立的思想家，是一个正统的封建知识分子，然而又以其独特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早期资产阶级的利益。我们甚至可以说，郭嵩焘是19世纪中后期在维新派以前关于自由资本主义的唯一理论家。正因为如此，洋务运动没有因为存在这种反对而受到任何影响。但是，作为洋务运动批判者的郭嵩焘的存在，说明在当时的中国毕竟有人抗议了历史发展的畸形方式。

- ① 《铁路议》，《郭嵩焘诗文集》（以下简称《诗文集》）第553页。
- ② 以上皆引自《条议海防事宜》，《郭嵩焘奏稿》（以下简称《奏稿》）第339—347页。
- ③、⑦、⑨、⑩、⑬、⑰ 《与友人论仿行西法书》，《诗文集》第253—255页。
- ④、⑤、⑧、⑪、⑫、⑭、⑯ 《致李傅相》，《诗文集》第239—243页。
- ⑥ 《铁路后议》，《诗文集》第553页。
- ⑱、⑲ 《超览楼藏书贻手札》（一），郭嵩焘手札，第二十七通，《中和月刊》第六卷第一期，第26、17页。
- ⑳ 《铁路议》，《诗文集》第553—554页。
- ㉑、㉒ 《郭嵩焘日记》第3卷650页、第4卷19页。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林有能

《价值和价格论——对有关世界难题的思考和探索》出版

该书由经济学博士、中山大学副教授李聿同志著，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正面解答了西方经济学家在70、80年代的世界大争论中就马克思经济学提出的难题，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全书20.6万字，定价4.9元。欲购者请把书款（不必寄邮费）汇到中山大学经济学系资料室（510275）叶尔愉，并请写明购者的地址和邮政编码。

矢 诚 维 大 局

——民初黄兴心态一说

王 杰

评价民初黄兴的思想与实践，众说纷纭。或说：黄“日见右倾”、向袁世凯“妥协”；或曰：说黄妥协退让是“冤枉”、妥协值得“研究和商榷”——“不放弃原则的、从政治现实出发的妥协，并非不革命，而且有时是必要的。”等等。所有这些，似乎都是把黄兴搁在被动的位 置上进行研究，因而无法对黄兴矢诚维护民初政局、携手与袁世凯协作的主动动机和表现作出完满的解释。本文试图通过对黄兴的潜意识层作由内向外的逆向考察，分析他主动、坦诚与袁世凯携手协作的心理归因，揭示支配其协作行为的稳定与复杂的思想动机，以阐明黄兴民初民主政治建设的思想脉络及其对中国民主革命建设所作的贡献。

民国开元的历史是如此的纷繁多姿：继辛亥革命成功后，中华民国创建、孙中山首任总统、袁世凯逼清室退位、南北统一、袁取代孙执政，等等，竟然于两三个月内完成。急速的历史变迁，伴随着莫测的政治风向，不断地冲击着人们的心理平衡，驱使人们为适应现实而调整情绪状态。就是在这复杂情境的作用下，黄兴矢诚拥袁的心态由是促成。

一、对“非袁不可”的认同感

袁世凯取代孙中山执掌总统，是不以南方革命党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当黄兴还在武汉鏖战、中国政治舞台谁主沉浮尚未明朗的时候，“命运之神”便开始“做有利于袁世凯的事情。”那时，黄兴就敏锐洞察到：“全国人心皆有此意”——“项诚雄才英略，素负全国重望，能顾全大局，与民军为一致之行动，迅速推倒满清政府，令全国大势早定，外人早日承认，此全国人人所仰望。中华民国大统领一位，断推举项诚无疑。”①在战事未

卜、众望倒清和人心向袁的情势下，黄兴曾考虑：如果袁世凯“肯推翻清室，把尚未光复的半壁河山奉还汉族，我们给他一个民选的总统，任期不过数年，可使战争早停，人民早过太平日子，岂不甚好？”②为此，他致电汪精卫，让汪劝袁早日倒戈归向。

果尔，善辨风向的袁世凯，顺从民意，逼迫清室退位，因而声威鹊起，成了风云一时的“中华民国之骄子”。此间，控制着地方财力的国内资产阶级，趁机不遗余力地帮助袁世凯。一方面，公开鼓吹袁“挟其天生之聪明，政海之经验，强有力之军队”，其“身之向背，关系一国之安危”，③为“非袁莫属”之舆论推波助澜；另一方面，则对建元伊始的临时政府实行财政封锁，令孙中山筹款不着，有措无施，以至一度承认，“欲治民国，非具新思想、旧经验、旧手段者不可，而袁总统适足当之。”④选择袁继任总统，成了国人不可逾越的心理定势。

诚然，袁世凯主政之初，为了表示“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以及“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的“诚意”，⑤也曾使由革命党人所开创的“神州空前之伟业”得以延续一时，“湘鄂之野、吴越之区、百粤之地、蜀滇之中、秦晋之间，无工商无士庶莫不出现一种自由之风、共和之气。”⑥《民权报》就此曾这样描述：“数月以来，我国民馨香祷祝，日夜所仰望之政府，至是已崭然露头角，出现于东亚大陆，俾吾侪国民群享共和幸福，其一种欣欣鼓舞之状，如久旱枯渴，骤获甘霖，足为二十世纪初开幕之中国贺。”

如果说，黄兴的拥袁意向，是在武汉战事中

因尝了袁世凯的武力厉害时所萌发，而当时的拥袁心理感受与心理准备还不很充分的话，那么，这种心理倾向在弥漫全国的“非袁不可”的舆论声浪的冲击下，逐渐被唤发而内化为个人的意见，即产生从众拥袁意识。袁叛清之前，他曾表示“起义断无先后之别”，^①劝袁起义。袁倒戈以后，他觉得“此次民国成立，合南北军民一致，袁公之功，自不可没”。清室宣布逊位次天，他在致各地都督的电文中，便流露了对袁的感激之情：“数月以来，艰苦备至，时至今日，将见成功。黄帝之灵，吾民之幸也！今后共和建设，南北一家，无诈无虞，共成大业。”因而勉励各军将士“念前功之不易，思来日之大难，保统一之政权，服统一之命令，维秩序而保名誉”，^②而作为国民，自当拥戴新总统，真诚协助其“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伟功”。

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黄兴开始以主动的姿态，协助袁世凯安抚南方。他针对广东香山、惠州两军对袁继任表示不满，声扬决意北伐，急电伍廷芳、汪精卫和广东都督，指出：“如此，于大局实有关碍。”“禱切盼切”伍等“飞电劝阻”。^③此外，黄兴三番四复地要求骚扰各地的肇事者“尤宜各矢诚心，共维大局，……幸勿误会，致启争端。”^④黄兴辞留守职前的自我评估，不失为他拥袁心态的最好注脚：“我的功劳限于：我以自己的威望使南方人认识到自然的现实秩序和也许不完全符合南方人愿望的政府的必要性”，“我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安抚南中国，说服居民相信现行制度及其活动家是符合人民愿望的。”^⑤

应该指出，黄兴矢诚拥袁，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袁的伪装迷惑所致。其时，袁世凯背叛民国的每一举措，都是在“维护共和”的幌子下进行的。而黄兴显然对袁的蓄意阴谋缺乏必要的心理准备。俟其醒悟“袁氏当时戴假面具赞成共和”，“其主张实与吾党不同”^⑥时，旋即便成了袁政府通缉的海外流亡者！

二、对民初政局的忧患感

民国的建立，为中华民族步入资本主义近代化的世界行程扫开了路障。发展实业、苏民国、厚国力，跃而跻身世界民族之林，成了时人的话题：“今兹共和政体成立，喁喁望治之民可共此际会，建设我新社会，以竞胜争存，而所谓产业革命，今也其时矣。”^⑦资本家纷纷组织各种实业团体，呼吁实业竞争。他们认为，破坏告终，建设

开始，希冀民国造成一个稳定、和谐、宽松乃至良好的社会环境，以促进实业勃发、政治清明，实现国家中兴。

然而，现实却是如此的严酷，姑且不论发展实业的社会环境，光社会秩序便使人胆战心惊：“官外患则日逼南满，俄涎蒙古也；言内忧则会党充塞，匪盗如毛也”，“失业之民，全国皆是，焚烧劫掠，盗窃淫戮，商民之家，被其害者日必数起”，“每逢夜半枪声四起，睡不安枕惊惶起坐”，^⑧令人寝不成寐，食不甘味。“各地情况都是乱糟糟”的函电纷纷飞至黄兴手中，令他“不胜惊异”，或“不禁寒栗”，担心“内讧朝生，外患夕至”危机的降临。^⑨他认为，当务之急是要避免外患，尤先治内忧，要治理内忧，最迫切的是要人们以“共同的危机感”作为“团结的兴奋剂”，同心同德，稳定政局，进而建设良好的社会环境。所以，当袁世凯策划京津兵变，借口不能南下就职时，黄兴等人唯恐由此招来外患，即电袁世凯称：“外鉴时势，金认暂驻北京，早定大局”，并电喇黎元洪等各地都督“请飭各属各路军队一律安静，快睹新猷。”致袁世凯玩弄之权术轻易得逞。

基于内忧兆外患之思虑，黄兴尤为警惕军人乱政，他多次致电各省军事长官，阐述军人须“系民国之安危兴亡”于一身，以服从命令、保卫国家为天职，“无论如何，毋紊秩序，毋残种类。”他特别提醒各军：“稍一纷扰，外足以酿干涉，内足以兆割裂，堕奸党煽煽之术，中他人挑拨之谋，种族将亡，身家何有？生命莫保，权利何有？”另一方面，他又认识到稳定军队在保卫民国中的作用，因而“不禁涕泣”地“务望我军人，各革其心，各爱其身，各守区域，各尽责任，勿以元安扞而自惊，勿以有助劳而自足，勿攘夺私利而操同室干戈，勿把持财产而蹙中央之命，勿遗同志之耻，勿动全国之愤……为民保障，为国干城。”^⑩

既然黄兴如此重视军队，为什么他又同意裁遣由革命党人所控制的南方军队呢？这从黄兴与苏俄访员沃兹涅先斯基的谈话中可以找到解释。黄指出，“决定解散军队是万不得已的办法。这种办法动摇着刚建立的制度，并有可能使它遭受颠覆的危险。要知道，我的军队的全体军官一个月就需要约六十万元。……在我们解散了我的军队的三分之二（……）的时候，在北方解散军队

的速度大概是最慢的。如果知道那里军队甚至在继续加强，以防不测，我也不会觉得奇怪。在政府不巩固的情况下，对我来说是可以理解的。”这段谈话，正是对黄兴拥袁心态的印证：他体谅袁政权的财政困难，竭力为维护大局分忧排难，用心何其良苦！

三、弭息党争的自重感

民元以降，政党纷起，议事献策，热闹一时，堪称共和政坛之盛事。岂料不久，政党之间失去政见相商之宗旨，演成了意气之争、党名之争，甚至置国家大局于不顾。“两党党员，不啻两国”，若“水火不相容”。^①以至“则南北之疑虑，各党之攻击，无法可以解释。”时人因之痛陈：“前清时代，贤能之吏，精神才力，均消磨于猜疑应付之中，不料民国初立，此弊更甚前清。”^②报界为此嘘唏：“今世忧国之士，莫不痛心疾首于党争”。^③而以同盟会领袖身份出任南京留守的黄兴，则被首当其冲地推入了党争与猜忌的漩涡，蒙受着种种困扰。对此，他“无任感悚”，甚至“日夜惶悚”。

为什么南北统一以后，北方对南方革命党猜嫌日甚？为什么值各党纷起议政之时，要“销去同盟会党名”？“留守本是赘疣”，留任亦属“强被任命”，兢兢注力于裁遣军队，为何反被斥为“拥兵自重”，连南方舆论亦视之为“不顾大局而惟知引留守一职为沾沾自喜之地”？^④透过党争的表象，黄兴意识到，南北猜忌症结于缺乏共和精神的“融铸”。因此，弭息党争、消除猜忌、实现思想统一，是一个艰巨的而目下又亟需上马的工程。这个工程，就是要长期地向国民进行民主思想的启蒙与灌注。他认为，“尽管南中国共和省份联合的共和派将来与北方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纠葛”，只要双方同仁以大局为怀，自尊自重，开诚公布，分歧是可以弭息的。

为了启蒙民主意识，提高国民对政党的认识，以增强维护大局之观念，黄兴曾就政党专题作过几次深刻的阐发。他强调“政党活动，以国利民福为目的。”无论何党党员，“自当各尽其职，各摅其诚，以建忠于本党而建忠于民国。”党间论争，乃“政见相争”，非“党名相争”。就南北双方而言，“现在双方和解，南北一律，兄弟一家，彼此岂复猜忌？”他针对江北第二军参谋长袁祖成借题发挥、无理要求取消同盟会的来信，复书申明：同盟会“既无解散之理由，复无取消之办法，自应

改造政党，发闡政治，惟宜仍沿本党名称”。指出，政党不仅现时参议政治，“将来政治竞争”，亦应以“政见相折冲。”^⑤同时，要求同盟会首先树立自重的风尚，使本党成为带动他党“化除党见”的楷模。他说：“欲宏党风，须有包含一切之宏量。他党之攻击吾也，虽含种种疾忌而不好之点，吾人亦当引以为戒，认彼反对者为好友，不必反报，含养大度，培植党德，成一个最大政党，于攻击风潮中特立不移。”^⑥

黄兴不仅呼吁为弭息党争自尊自重，而且为维护南北统一身体力行，与袁世凯协作矢志始终；政治上，为维持共和大局吐心沥血，即使对袁世凯丧权借债行为表示愤慨，视为“民国公敌”，但他仍然认为“我的反对不是意见分歧，而仅仅是提醒”。告诫人们：“人惟权利之争，国有涣散之势”。^⑦军事上，他主动解散自己领衔组织的（南方）陆军将领联合会，示谕军人勿结党派，同德一心，共谋邦基巩固。财政上，他正视政府财源枯竭、民力难支的实情，在军队中发起减薪捐俸，以济时艰。对他积极提倡的国民捐，亦表示尊重中央的最后定夺。个人问题上，不争名利，克己奉公，为“使南北猜疑尽泯”，他主动挂冠而去，“掉臂林泉”，其恢宏大度、功成不居的高风亮节，委实感愧时人。

四、献身共和的使命感

民国开基，并不等于民主共和制度已奠下了坚实的基石，在共和新空气中还夹杂着颠覆共和国的阴风。由于“从革命胜利之时起，在共和派里面，也就是说在政府、军队和行政机关的现有成员当中，混进了异己的、甚至是敌视新制度的分子”。^⑧这些人不仅不能以革命的最初宗旨为出发点，而且还“希望凭借他们的统治经验，在不久的将来把新潮流扭回到旧轨道”去^⑨——“共和国的统一只是外表”。^⑩

黄兴以一个实干家的目光，洞察到封建专制复辟的危险性与可能性。他指出，要预防隐患，“永奠共和于磐石”，关键者，需要有一大批具有强烈的共和使命感的“年轻的新生力量”为崭新制度的确立而献身。

为了保证共和制度的顺利延续，黄兴提出在共和国的政府机关中重视两类干部的培养。一是：“今日任国务者，固不仅以醉心共和者为能尽责，要必以醉心共和者方能与选。”^⑪二是：“无论制度的破坏是怎样的合理，我们没有旧制度的有

经验的官员却是不行的。”^②鉴于这些有治理国家经验与才干的官员缺乏对共和制度的忠诚，应当尽力采用“和平些的方式”，协助袁世凯去稳定统一政局，并使其得以顺利进展，在这个前提下，进而对这些官员进行长期的、反复的共和思想的启蒙和民主精神的融铸，“尽可能地把西方伟大思想运用到中国的生活中去”，促成“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最简单的学说会以比欧洲快些和和平些的方式在中国付诸实现”。^③只有共和观念增强了，入心了，旧思潮、旧势力才不致复活。“张勋之所以存在，乃是因为共和观念在山东还不巩固”。^④

黄兴本着“实事求是为今日至要之图”的宗旨，着手剪除陋习，提倡新知，将民主启蒙融会到他的政务活动之中。从发起垦荒拓殖到呼吁杜毒禁烟，从对儒学的新释到述论政党政治，从提倡国民捐到谴责丧权借债，从抨击张勋复辟到反对袁世凯背叛民主的有理节的斗争，为民主精神的融铸倾注了最大的心力。他在离职前谈及辞职后的志趣时说：“致力于自己的社会活动，向袁世凯说明国内事情和情绪的真相，以便他能够同我们一道，不仅朝着同一个目标，而且沿着同一条道路前进”。^⑤这不能不说是他诚心协助袁世凯共创共和伟业的心态的表白。

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黄兴矢志维护民无大局的心理归因中，“认同感”和“忧患感”属情境归因，“自重感”和“使命感”则是个人倾向归因。支配黄兴主动与袁世凯协作的思想动机至少有两个：一是希望尽可能以和平的方式，团结可以左右时局的人物，促成和巩固南北统一，为建设中国的民主政治而奋斗。这是他的主要动机和最稳定的动机。这一动机支配着他的主要行为。二是希望通过共和的补课，启迪袁世凯的民主意识，激

励其依皈共和制度，致与共和派并肩成行。这个动机可以说是黄兴理智与情感处于矛盾的产物，属不稳定状态。只是由于黄兴对袁世凯的共和伪装缺乏认识，以至这一动机处于相对的稳定状态。恰好，由于这两个动机之间，内涵相关，利益趋同，从而激发了黄兴的极大热情，支配着他主动矢诚与袁世凯协作的行动。

- ①⑦⑧⑨⑩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 ① 《黄兴集》第94、83、124、145、130、336—337、139、145、141、240、193、142页。
- ② 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200页。
- ③ “评论”，《申报》1912年1月28日。
- ④ 《在上海国民党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85页。
- ⑤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44页。
- ⑥ 《大中华报》1912年7月14日。
- 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 未刊稿：《黄兴同俄国驻汉口领事馆秘书沃兹涅先斯基的谈话》（严昌洪译）。
- ⑲ 《民声日报》1912年2月28日。
- ⑳ 职民来稿：《共和危害》，《申报》1912年3月28日。
- ㉑ 《三党合并纪事》，《独立周报》第2年第12号（1913年3月）。
- ㉒ 《熊希龄集》（上册）第349页。
- ㉓ 《内阁制与党争》，《时事新报》1913年1月7日。
- ㉔ 《申报》1912年5月6日、5月28日。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科院
责任编辑：林有能



“翰海”是湖不是山

王廷德

《史记》中的“翰海”（后来通作“瀚海”）一词，过去一直认为是指漠北某湖泊，当今学者岑仲勉教授考证“翰海”即今蒙古之杭爱山后，从者相继，并且，1979年新编《辞海》承认了岑仲勉的观点。对这个解释，我不敢苟同，特提出商榷。

“翰海”一词最早出现于《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骠骑将军去病率师……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翰海。”

岑仲勉1958年著文说这“翰海”是山。

①新编《辞海》肯定了此说：“今人岑仲勉考证：既云‘登临’，则是‘山’而非‘海’。”接着学者柴剑虹先生说：“既是湖泊，‘登临’二字就费解。”②为什么费解？刘维钧先生作了说明：“尤其是《霍传》中的那一个‘登’字，是非常耐人寻味的。按照我们中国的语言习惯，到海里去，总是爱用：下、泛、涉；到山里去，总是爱用：上、攀、登。因此，我们认为这个‘瀚海’应在高处，与山有关，而与低处的沙漠联系不大。”③

很明显，是山论者皆抓住“登”字为立论的依据。这看似有理，实则有悖司马迁的原意，因为诸公忽略了一个最关键的字——“临”。

《说文》“卧”部：“临，监也。”“监，临下也。”《经籍纂诂》引皇侃疏：“临，谓以高视下也。”“日居月诸，照临下土”④之“临”即此义。水积低洼之所，常处于下，因此“临”常有下临水泽之意。例如：贾谊《过秦论》：“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渊以为固。”《淮南子·说林训》：“临河而羡鱼，不如归家结网。”临下与登高相反相成，不登高往往无以临下，故登、临二字常配合使用。《荀子·劝学》：“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宋玉《九辨》：“登山临水兮送将归。”更有登、临结合为一个词表示登高而临水的意思。例如：《晋书·阮籍传》：“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杜甫《登高》：“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所以，我们不能把“登临”的含义仅仅理解为攀登高处，还有下临江河湖海的意思。《史记·集解》引张晏语曰：“登海边山以望海也。”（这里所说的“海”就是湖泊）《集解》的解释才符合司马公的原意，它既看到了“登”字，又没忽视“临”字。

我们说“临”字最关重要，是因为“登”字可有可无，而“临”字则非用不可。霍去病逐匈奴的事，除《史记·卫将军骠骑列

传》外，《匈奴传》也有载，记作：“骠骑封于狼居胥山，禅姑衍，临翰海而还。”没了“登”字。班固《汉书·匈奴传》作：“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以临翰海。”也没有“登”字。但是皆有“临”字。这还不足以说明“翰海”应在低处，是湖，而不在高处，非山吗？

如果说这还只是据了“临”字的推测，那么下面古人的话则是实实在在的证明：

饮马翰海，封狼居山。⑤

登燕山而戮封豕，临瀚海而斩长鲸。⑥

这两句都是对偶句，一句说山，另一句言水，而且，曰“饮马”曰“长鲸”，“翰海”非水泽而何？特别是班固说的“饮马”尤其值得我们重视。他之生距司马迁之逝仅仅118年（一说125年），其父是史家，他又奉诏修《汉书》，因此，他对这一情况的了解，他资料的丰富翔实都是后人不可企及的，他对“翰海”的理解当真切实可信。

是山论诸公对“翰海”的具体所指有不同的认识，但是，是今杭爱山的音译这点却是一致的。对此，我也持否定态度。

刘维钧先生据“瀚”字分析说：“‘瀚’与‘翰’又并非同义词，这就说明‘瀚海’一词乃是音译。”接着沿用柴剑虹之说（见后）判定“瀚海”即“杭爱”的不同音译。又用岑参《天山雪歌送萧治归京》“阑干阴崖千丈冰”句与其《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瀚海阑干百丈冰”句比较，得出“瀚海”是杭爱山的音译，“阴崖”是“杭爱”的意译的结论。⑦

意译问题后文将涉及，这里先谈音译问题。刘的推论，前提与结论没有必然联系，即不能因为“瀚”与“翰”不同义说“瀚

海”是音译。“翰海”演变为“瀚海”，可能是因为翰海是湖泊，与水有关，下字海又系水旁，于是人们将“翰”写作“瀚”，与音译毫无关系。这类汉字演变现象并非鲜见。“媳妇”原作“息妇”。息，义为儿子，息妇即儿之妻。因为息下涉妇字有女旁，息妇又指女性，因而写作了媳妇。“息”与“媳”也不同义，能说“媳妇”是译音吗？与此类似的词俞樾列举了展转——辗转、狎允——狎狷、会礼——禴礼、是编——缜编等，⑧难道每组后面的词都是音译词吗？

岑仲勉认为，今杭爱山突厥人称日月山，“日月”古突厥语读为Kunai，变而成为khangai，“瀚海”的发音也是khangai，因此“瀚海”即当时“日月”山的音译，也就是今杭爱山的音译。⑨

当今的中国，懂突厥语的人不多，岑先生便是这为数不多者之一，他考证出突厥人称日月为kunai，我们不敢怀疑。但是，对它变化而成khangai，另一位学者柴剑虹则已提出异议：“其实，kunai与khangai区别很大。”⑩既然差别“很大”，怎么能说“瀚海”是当时“日月”山的音译呢？

柴先生指出岑老考证的缺陷后，另辟蹊径，以今维吾尔语支持音译说，曰：

维吾尔人习惯……将峡谷幽静处称为hanghali（音“杭海尔”），或将山谷背阴处称作hanghiro（音“杭海洛”），略去尾音均可译成“杭海”或“瀚海”。我去请教维族同志，他们认为这种称呼是古代突厥语传下来的……

现在可以确定“瀚海”一词的本义

与来历了：两千多年前，居住在蒙古高原上的突厥民族称高山峻岭中的险隘深谷为“杭海”。霍去病率大军登临峻岭险隘，听当地居民称之为“杭海”，遂以隘名山，后又将这一带山脉统称为“杭海山”“杭爱山”……《史记》中写成“翰海”。^①

我们认为柴先生的论证有三点不足：

一是凭维族同志“认为”怎样就下断语，缺乏科学的论证。

二是只举了今日维语作旁证，缺乏古代突厥语直接而确凿的证据。古今相距一千多年，语言变化不小，以今证古可靠性不足。

第三点：突厥族兴于北魏，距今一千多年。生在距今两千多年的霍去病，他怎能听到七八百年后突厥民族的声音？“两千多年前，居住在蒙古高原上的”不是突厥族而是匈奴族，因此，即使柴先生的证明完全成立，也不能得出匈奴人将今杭爱山脉呼为“翰海”的结论。这一点最重要，而且岑仲勉的考证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

古突厥人怎样呼今杭爱山的呢？这里顺带说几句。《资治通鉴》卷198叙李绩率军讨击薛延陀部至郁督军山，〈（通鉴）考异〉曰：“《绩传》作‘乌德鞬山’，《唐历》云即‘郁督军山’，虏语两音也。”郁督军山现在为何名，岑仲勉《隋唐史》第104页的注说得极清楚：“此山首见周书五〇，繆作‘于都斤山’，夏德证为古突厥文碑之ötukun或ütakun。隋书作都斤山，唐则有乌德鞬……等异译，当即今杭爱山高峰。”另外，突厥文之《苾伽可汗碑》，其中有一句话是：“神圣的乌德鞬山之人民，汝逃之出走：有东去者，有西去者。”^②上述引文不

仅指出了今杭爱山在隋唐时称于都斤山，乌德鞬山，而且提供了确凿有力的证据。“虏语两音也”说明是当时根据突厥人的口音音译的，突厥文碑，是书面语，它们都否定了古突厥人把今杭爱山称作khangai或hanghali的说法。

那么杭爱山的称呼始于何时呢？音译论者认为非常久远，至迟在西汉。“抑瀚海之称，传于汉世，其后竟寂寂无闻，逾千百年，迄元乃复传于我国。”^③这表明他们的认识是：杭爱山的称呼从汉至今都是统一的，没有变化，只是音译的差异。

客观地、辩证地看，山河的名字是生活在那一地区的人叫出来的，如果居住的民族没变，山河的名称一般没变化或变化不大，例如中原地区；所居住的民族变化大，山河的名称变化也大，如象蒙古高原。

众所周知，千百年来，蒙古高原上的各民族一直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迁徙频繁，居止无定，更加上民族间的斗争十分激烈，一个民族兴起、强大之后，便去融合、征服，排挤、驱逐弱小民族，这样，造成居住在杭爱山脉一带的民族一次次大换班，匈奴、突厥、回纥、蒙古等就是在不同时期相继统治蒙古高原的最赫赫有名的民族。共同的语言是一个民族的显著标志，不同的民族，语言必定不同，尽管有的民族间语言相近。一个民族长期主宰、居住杭爱山地区后，由于他们与前一民族语言不同，命名的习惯、方法不同等等，就会对它呼出与前一民族不同的名字；两千多年内，若干个居处此地的民族，对同一山脉称呼同一名字，是不大可能的。

有史为证：

《后汉书·突宪传》：“宪、秉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余里，刻石勒功，纪汉威德。”

《周书·异域志下》：“可汗恒处于都斤山，牙帐东开，盖敬日之所出也。”

《隋书·北狄传》：“（摄图）号伊利俱卢设莫何始波罗可汗，一号沙钵略。治都斤山。”

《北史·西突厥传》：“东拒都斤，西至龟兹，铁勒、伊吾及西域诸胡悉附之。”

《旧唐书·突厥传上》：“高宗赦其罪而赦之，拜左武卫将军，赐宅于长安，处其众于郁督军山。”又《回纥传》：“玄宗命郭知运讨逐，（回鹘）退保乌德健山南。”

《元史·地理志一》注：“（至元）三十年命戍和林汉军四百，留百人，徐令耕屯杭海。”

《清史稿·地理志·外蒙古》：“牧地在杭爱山东。”又：“西，杭爱山，在鄂尔坤河源之北，其山最高大，山脉自西北阿尔泰山来……杭爱译言‘橐驼’也，山形似之。当即古之燕然山。”

据以上典籍，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

第一，“杭爱”意为“橐驼”。橐驼即骆驼。杭爱山因山形似骆驼而得名，这就推翻了柴剑虹的“陂谷幽静处”说和刘维钧的“阴崖”说。

第二，杭爱山脉的称呼可大致分为三个时期：燕然山时期，于都斤山（郁督军山、乌德健山）时期，杭爱山（杭海山）时期。

把这三大时期居住、主宰蒙古高原的民族与之联系起来，杭爱山脉名称变化的原因就昭然若揭了。魏晋之前，匈奴的战马在整个蒙古高原任意驰骋，燕然山名是匈奴人给取的。魏晋南北朝时代，匈奴虽

衰，余威尚存。柔然族呼之为天山，但影响远不及燕然。北朝末期，突厥族才强大起来，始呼之为于都斤山。隋唐时期，广大的漠北一直是突厥族和回纥族的天下。大致可以说突厥呼为郁督军，回纥呼为乌德健，但因为这两个民族语言相近，又共用一种文字，①郁督军和乌德健古音相近，所以把它们归入同一时期。北宋之时，辽金虽盛，势力不达于西部，至南宋时，蒙古族忽然强大起来，到元代时达极盛，乌德健山成了他们的牧场，以山形取名，蒙古人呼它为“杭海”“杭爱”。直到现在，这一带山区都是蒙古族放牧生息的地方，也直到现在，它都名叫杭爱山。

总而言之，我们认为杭爱山之称，产生于南宋之后，是蒙古语的音译，不是隋唐时产生的，非突厥语的音译，更不是西汉时匈奴语的音译；霍去病登临之“翰海是湖不是山，与今杭爱山无关。

① 见岑仲勉《自汉至唐漠北几个地名之考定》。

②⑨⑩⑪⑬ 《学林漫录》二柴剑虹《“瀚海”辨》。

③⑦ 《文学遗产》1985年第4期刘维钧《唐代边塞诗注辨正》。

④ 《诗经·日月》。

⑤ 《汉书·叙传》。

⑥ 《隋书·虞世基传》。

⑧ 见《古书疑义举例》卷七。

⑫ 马长寿《论突厥人和突厥汗国的社会变革》，见中华书局87年版《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

⑬ 见《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耿世民《古代突厥文》。

作者单位：四川省德阳市市中区
教育局教研室

责任编辑：凌峰

洪宪时梁士诒密电签名是他人所为

陶季邑

多年来，史学界一直认为，1915年袁世凯筹备帝制登场时，朱启铃、周自齐、梁士诒等十人曾经向全国各省将军、巡抚先后发出一批密电，传示主子袁世凯的命令，按袁内定步骤指示实际的具体选举工作，促各省一律拥护袁世凯称帝。如：刘厚生的《张謇传记》、来新夏主编的《北洋军阀史稿》、谢本书等著的《护国运动史》等均持这一看法。但笔者根据所接触的史料来看，这一观点是与事实不符的。

1933年梁士诒逝世，当时广东番禺人郑洪年写了一副挽联，上联是：“辛亥筹筹而不自表，洪宪负谤而不自明，毁誉胥忘，公可谓大”。^①又据刘成禺回忆，“民国六年”，郑洪年对刘说：“段祺瑞初与梁燕孙（即梁士诒）约，我一文一武，万不可赞成帝制，误袁氏。后因五路参案，交通系人大惧，乃发电列名，均代梁为之”。^②从对联中的“洪宪负谤”和郑洪年的上段话可知，梁士诒不赞成帝制，而是交通系一些人盗用梁名义在密电上签了梁的名字。问题是郑洪年的对联和话，是否可信呢？我认为完全可信，理由如下：

一、郑洪年跟随梁士诒工作多年，是“交通系要人”，“与梁最密”，^③当然了解密电签名的内幕。

二、“民国六年”，袁世凯已死，发电促各省支持帝制者被列为“帝制祸首”，务必“缉拿归案”。如果梁的确在密电上签了名，那么为什么郑洪年一定要替梁开脱反而把“帝制祸首”罪名强加给他们交通系自己几个人身上呢？这只能说明，梁的确与密电无关，郑洪年的话可信。刘成禺与郑洪年、梁士诒有过来往，也认为郑洪年的上段话“当可信”。^④

三、交通系要人、曾被卷入“五路参案”的交通次长叶恭绰1933年11月为梁士诒立碑，碑文中有一段文字：“（袁筹备帝制时）（梁）默察时机，审大局之未易宁谧，遂怀退志。逮筹安议起（指1915年8月杨度等人成立筹安会，公开为袁鼓吹帝制活动），而公（指梁）遂出公府矣。既洪宪事败，某方聒当局以公负其责。公南归侍亲，终不一辩，其素然也。既当局审其诬，迭引参政事（但梁拒绝）。”^⑤梁逝世，其子梁定荃的悼词中也说：“（民国初年）先严默察国情，谕知持盈保泰之非易，复以用人时分畛域，行政未上轨进，苦口危言，至百十次，而终不见用，遂怀退志。逮筹安议起，而先严遂出公府矣。犹忆方事之殷，先严曾召季典家叔北上，密商脱险之计，语家叔云：‘筹安事，余面

谏至十四次，祸必及’。以侦逻密布，家叔亦计无所出，泣诀南归。……既筹安事败，某方以政略故怂恿当局以先严负其责。先严南归侍养，从不一辩，盖亦素性然也。既当局审其诬，迭欲引参政事（但梁未赴任）。”⑥叶恭绰、梁定菊都了解梁士诒，叶还参与袁世凯称帝筹备工作，因此二人的记载当属事实，据此，梁并未参与洪宪帝制活动。这就可以作郑洪年上段话旁证。

有人认为，如果说密电由“他人代签”，那为什么梁士诒“当时既不申辩”呢？⑦笔者认为，这首先和当时环境有关。梁不主张袁世凯称帝，袁于是对梁进行“监视。”⑧当得知自己的名字被人冒签后，梁在袁的严密监视与控制下只能表示“默然”⑨不能“申辩”，否则招来杀身之祸。其次和梁性

格有关。梁临终时说：“余一生所负毁誉，不可胜计，向不置辩，自信世界上必有深知我者。”⑩梁六十大寿时，段祺瑞赠梁印章，上面说：“负重致远”。⑪可见梁具有面对诬陷、诽谤，从不申辩的性格。上引郑洪年、叶恭绰等人的话也可证明。

- ①、⑧、⑨、⑩、⑪ 凤冈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册，第351、350、290、613、5页。
- ②、③、④ 刘成禺：《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1960年第1版，第201页。
- ⑤、⑥ 《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下册第621、615页。
- ⑦ 周志俊：《袁世凯帝制活动与粤皖系之争》，《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第90页。

作者单位：贵州师大历史所
责任编辑：林有能

《中国钱币文献丛书》年内出版

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马飞海、王贵忱编辑的《中国钱币文献丛书》，选收历代钱币谱录130余种。其中如姚朔民整理本宋佚名著《货泉沿革》，是据元刊本类书为底本，他如精抄本清吴钩未刊稿《逸钱斋笔记》十五卷续三卷、原拓本清廷济题识《清仪阁钱谱》二十册、近人顾树圻稿本《圆铁庵历代铁泉谱》六册、上海寿泉会辑《寿泉集拓》十五辑和钱币学家书简集等，皆为不可经见之书稿。还有名家的稿本、批校本、原钱精拓本和罕见的明清两代刊本等珍贵版本。内容丰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是集历代钱币文献大成之作。本书按成书年代编次，照书本原大影印，保持原本风貌，分编为32辑，共40册（每册容900—1000页），1990年第四季一次出齐，定价5000元。欲购者，请向当地新华书店、古籍书店预订。（吴旭民）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与隐忧

——兼论香港、东京、新加坡三大金融中心的关系

何小锋

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是香港经济的“生命线”之一。在经济发展势头最猛的亚太地区，香港、东京、新加坡三个金融中心同有长足的进步，特别是近年来，东京、新加坡金融中心锐意改革、迅速扩展，似有取代香港金融中心之势。在内部面对“九七过渡”，外部面临激烈竞争的情形下，香港金融中心能否保持其国际地位，显然是现在和未来国际金融界人士十分关注的问题。

一、香港金融中心的性质、作用与特点

所谓金融中心，是指开放式的、多层次的、多功能的、大型的资金融通集中场所和金融网络的中心枢纽。按照一般的划分，国际金融中心有三种类型：第一，全球性金融中心（超级金融中心），其资金来源是世界各地和本地，资金使用于世界各地，伦敦、纽约属于这类中心；第二，境外金融中心（离岸金融中心），其资金来源主要依赖于海外，资金用途主要不是用于本地而是用于海外，香港和新加坡同属这类中心；第三，帐面金融中心，其实际上无甚资金交易，只是在此注册和过帐，以便逃避税项，如一些被称为“逃税天堂”的百慕大、开曼群岛、所罗门群岛，皆属此类。

作为离岸金融中心，香港主要是以外币的形式吸收非居民的存款，然后贷款给非居民使用，有如一个金融中介者，为交易双方提供一个低成本的交易地点。表1显示出香港对海外银行负债及资产总额在80年代得到了高速增长，正反映出离岸金融中心的特色。

香港金融中心的作用主要是使资金能由丰裕地区流向短缺地区，并且使银行之间互通有无。表2

表1 香港的海外负债与资产

单位：百万港币

年份	对海外银行负债	增长率(%)	来自海外银行的资产	增长率(%)
1983	4655.8		3498.3	
1984	5164.6	11	4143.6	18
1985	6515.1	26	5520.2	36
1986	9857.1	51	9343.3	66
1987	18014.7	83	16110.3	72
1988	21321.1	18	19272.5	20

资料来源：香港统计月报（英文）1989.1

显示香港金融机构的对外负债主要来自西欧与中东，而对外债权的用途地主要是亚太地区。香港成为世界金融交易网络中的一个重要交汇点，把亚太地区与全球其他地区联系起来。

经过20多年的发展，香港在金融机构数量、银团贷款、基金管理、黄金买卖和金融基本设施等方面来看，仅次于伦敦和纽约，有“世界第三金融中心”之称。但由于在货币市场方面仍相对落后，特别

表2 香港金融机构对外债权与对外负债的差额（分地区）

（1988年12月31日，单位：亿港元）

地区	亚太区	非洲	北美洲	拉丁美洲	加勒比海区	中东	西欧	东欧	合计
净流出	3267.6	158.6	169.3	61.7	316.5	-204.1	-737.3	73.4	3105.3

注：表内数字：净流出 = 香港银行和接受存款公司对海外银行和非银行客户的债权 - 香港银行和接受存款公司对海外银行的负债。

资料来源：同表1。

在政府债券、存款证、商业票据和贴现等方面的信用工具仍逊于某些久负盛名的金融中心，因此也有人对其是否处于世界第三金融中心的地位提出质疑。尽管如此，香港无疑已经具备了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一些特点。

1. 经营国际化。其表现：一是外国金融机构不断涌入香港，香港的金融机构也迅速向外扩展，使香港成为国际金融机构的注册和活动的、高度自由的中心；二是香港在海外的金融活动非常活跃，对海外的资产和负债都以高速度增长，成为国际资本流动的集散地；三是香港金融机构的资金供应和存款中，以美元、日元和西德马克为主的外汇存款和供应额增幅可观，使香港成为亚洲主要外币存款市场和外汇供应的中心之一。

2. 结构多样化。其基本结构是：由政府金融司和汇丰、渣打银行执行着类似中央银行的若干职能。并且拥有以汇丰集团、中银集团以及外资银团为核心，以168家注册商业银行为主体，并有251家接受存款公司、148家外国银行驻港机构、276家保险公司、739家证券经纪公司、563家基金组织、6892家投资顾问公司，83家期货交易所成员以及一些法定基金组织等所组成的庞大的金融网络。

3. 业务多元化。在国际化和自由化的趋势下，香港各金融机构不拘于传统的金融业务，极力向多元化服务发展。在银行业，包括接受储蓄、往来及定期存款、物业抵押贷款、工商信贷、汇兑、商业票据的承兑和贴现、出入口押汇、汇款、代理收付款等，还扩展了种种新的金融业务，包括发行港元与美元汇款证，参与银团贷款，发行与包销各种有价证券，协助收购与合并公司业务，策划新公司上市集资，整顿公司财务，代客买卖股票，楼宇租赁，买卖及托管，推销保险业务，投资基金管理，推广遗嘱执行人信托财产和税收业务，贸易资信调查，代理贵重物品保管箱，发行信用卡，发放礼品券，黄金白银买卖，设备租赁，旅游，教育，广告，私人帐务管理等等。

4. 操作电脑化。香港金融机构过去属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经营重心放在琐碎繁重的手工操作上，如大量例行性的票据、文件、资料处理工作。随着金融国际化、多元化的发展和竞争的日趋激烈，西方日新月异微电脑技术很快在香港金融管理业务系统中得到广泛应用，大大缩小了国与国之间的距离，使香港成为亚洲金融业务电脑化管理水平最高地区之一。例如银行界，在零售业务上，已有汇丰的“易通财咭”(ETC)电子化服务项目、“自动柜员机”(ATN)系统、“易办事”(EPS)电子付款系统等电子货币，在银行之间各种票据结算、转帐方面，有香港银行公会推出的“票据交换所自动转帐系统”(CHATS)，统一提供准确、快捷的资金转帐及信息传递服务；在同国际金融业沟通与离岸业务管理方面，有“国际性银行通讯组织”(SMIFT)，“国际现金管理服务”等项目。

5. 深受政治因素的影响。香港金融市场的外部影响因素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世界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的影响。一项研究表明，香港股市与美国股市的相关系数在1977—1988年为0.16，①这个数字比美国与南朝鲜(0.03)、台湾(0.15)、新加坡(0.15)的相关系数要高。二是受中国的影响。除了中国经济方面的影响外，受中国政治变化的影响成为此时期香港经济的重要特点。这几年金融市场的水涨潮落与中国政局及香港政治前途的风起云涌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去年国内发生的政治风波引发香港6月6日前20天内，恒生指数暴跌1307点，跌幅达89.6%，随后房地产价格普遍下跌约二成，公司迁册外地，专业人才外流的趋势增强。这些都说明了香港经济对国内突发政治事件具有很大的敏感性，虽然这些突发事件的影响具有短暂性，香港金融体系也有一定的自动调节力，但由于香港回归中国已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必须从殖民地体制过渡到“一国两制”，这种史无前例的重大转变增加了香港金融市场的风险因素，并成为香港和国外驻港金融机构业务发展的重要评估内容之一。

二、香港金融中心与新加坡、东京金融中心的比较分析

香港与新加坡同属亚太地区的境外金融中心，但在成长模式上，香港金融中心属“市场自发带动”型，因此境内金融与境外金融交织。新加坡金融中心属“政府主动塑造”型，境外金融与境内金融分

开，另立国外帐户。在总的共同点方面，香港与新加坡金融中心都具有，自由企业制度、低税、海岛式的地理环境以及处于24小时全球贸易的中介时区、高技巧劳动力、英语使用普遍、健全的法制结构、信息能够自由传递，等等。这些共同优势成为两地吸引外国金融机构、发展本地金融市场的成功因素。而就总的差异而言，香港与新加坡在政府政策特别是税收政策、以及管理要求上都有很大的不同。而且新加坡在发行美元存款证和债券业务上占有优势，在金融期货、外汇成交量等方面都有不俗表现，尤其是得益于东南亚国家经济蓬勃增长的强势，金融中心地位不断加强。

与香港、新加坡金融中心不同，东京金融中心起步较晚，自由化、国际化的程度较低，但是其经济背景和发展潜力却非常巨大。日本的经济实力居亚太地区之首，全世界500家最大企业中，日本占了约100家，日本十大银行的总资本已分别居世界之首，日本的外汇储备也是各国之最，东京股市的资本额和成交量也居世界前列。这些强大的金融实力支持着东京向全球性金融中心的方向发展，有可能在将来扩张为与伦敦、纽约鼎足三立的地位。这种绝对实力与发展势头是香港、新加坡这些“小岛开放经济模式”所不可比拟的。

下面将从税收制度、银行和货币体制，以及各个金融市场等方面对三个金融中心作出比较分析。

1. 税收制度。

香港政府的税收政策是以量入为出、长期收支平衡为出发点，因此实行的是简单而有效的税收制度。例如其所得税方面只有利润税、薪酬税和物业税三种，公司所得税率只有16.5%，且税率对任何法人一视同仁。这种税收制度有利于境内外资金和人员的自由进出。

新加坡政府的税收政策是以实行差别待遇从而刺激经济发展为出发点，因此实行一套相当复杂的税制。例如，其所得税面向所有个人和企业的所有收入来源而征收，公司所得税率达32%，虽属低税制，但比香港高近一倍，且税率对居民和非居民有不同的待遇。这种制度对外国企业和人员的进入有所不便。

日本的税收政策是以增加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收入、减少赤字为出发点，因而其税制复杂，税种较多（近60种），税率也较高。根据1989年4月实施的新税制，主要税率有：所得税率为10—50%；公司法人税基本税率为37.5%，小额储蓄和邮政储蓄的利息所得税率20%；对一亿日元以上的商品销售征收80%附加价值的销售税，此举提高了商品的销售价并成为宇野下台的经济原因之一。此外对不同的个人和企业规定了各种免税额、宽减额、扣除额。这种税收制度，客观上推动日本企业到外国低税地区设立企业，但却不利外国企业和个人的进入。

2. 银行制度。

香港银行最特殊之处是没有正式的中央银行，其中央银行的职能由政府金融司和汇丰银行来执行。汇丰银行不仅同英资渣打银行一起成为法定的发钞银行，而且还是其他商业银行的票据交换中心，承担相当大的现金储备保管业务。港府金融司负责执行货币与信贷政策，并管理外汇基金和作为银行体系的最后贷款者，还有港府的银行证券监理专员分别担任监管银行体系和证券与期货市场的职责。在银行结构上香港实行“三级制”，第一级是注册商业银行，为香港金融体系的主体，第二级为持牌接受存款公司（DTC），第三级为注册接受存款公司，后二者统称为接受存款公司，也就是一般而言的财务公司或商业银行。此外还有外国银行驻港办事处。各种不同的机构有不同的要求（见表3）。外资银行在港设分行需要政府批准，其中一条要求是所有资产净值应当不低于140亿美元。至于银行监管方面，香港本地银行必须要有5%到8%的最小资本充足比例，而且所有金融机构都要维持25%的最小流动资金储备。

表3 香港银行三级机构的比较

机 构	最小实收资本 (百万港元)	接受存款条件
注册银行(本地)	150	存款、存期不限，利率由银行公会定
持牌接受存款公司	100	50万元以上，存期不限，利率自定
注册接受存款公司	25	10万元以上，存期三月以上，利率自定

新加坡中央银行是新加坡金融管理局 (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除了发行货币以外, 它发挥着所有中央银行的功能, 而货币发行则由货币委员会 (The Board of Commissioners of Currency) 负责。在银行结构上, 有注册银行、财务公司、商人银行, 以及邮政储蓄银行。只有注册银行和财务公司需要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审批成立, 并分别需要最小实收资本额 300 万和 50 万新币。另外, 外国银行需要最小实收资本 600 万新币, 其分行应最少在总行净资金中拥有 300 万新币。注册银行分为三种: (1) 领取全面性 (Full) 执照的银行, 可不受限制地接受任何存款; (2) 领取限制性 (Restricted) 执照的银行, 不允许从非银行顾客接受低于 25 万新币的储蓄存款或定期存款; (3) 境外 (Offshore) 的银行, 不允许从非银行客户中接受生息存款。财务公司则不允许从非银行客户中接受活期存款。而在银行监管方面, 新加坡并无最小资本充足比例的具体规定, 由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视情形而掌握。注册银行和财务公司需要维持的最小流动资产比例分别是 18% 和 10%, 还要拿出相当于存款数的 6% 以上的法定现金准备金在新加坡货币管理局, 这是其银行业发展的一个不利之处。

日本中央银行是日本银行, 它面向金融机构服务, 管理国库和发行货币, 集“银行的银行”、“政府的银行”和“发行货币的银行”多功能于一身。其银行结构是很独特的, 包括: 商业银行 (城市银行和地方银行)、长期性金融机构 (长期信用银行和信托银行)、外汇专业银行、中心企业的金融机构 (如相互银行等)、农林渔业金融机构 (如农林中央金库等)、政府金融机构 (如日本输出入银行等)。这些不同类别的金融机构多达二三十种, 它们各有职责和活动范围, 这种专业化与多样化的特点, 使日本的金融体制与众不同, 可说是世界独此一家。

在对外国银行进入的态度方面, 三个地区是有着差别的。香港政府一律欢迎外国银行在港设分行和办事处, 对其业务种类亦无限制。新加坡政府一般也鼓励外国银行进入, 但它们须按照发展战略和优先次序而被有所挑选。为保护新加坡银行, 外资银行只能从事有限度或离岸银行业务。日本在允许外国银行进入方面起步较晚, 这与政府过去采取的保守政策有关, 近几年来政策逐步开放, 外国驻日银行机构也迅速增加, 但相对数量仍然很小, 与日本在世界金融中的地位和日本银行在海外扩张的规模相比, 很不相称, 1986 年 3 月止, 在日本的外国银行资产额占全日本的银行资产总额之比例仅为 4.1%, 且许多银行业务仍受限制。外国在日本的分行和现地法人在 1986 年末仅 124 家, 远低于日本在海外的银行 380 家的数量。

表4 外国金融机构的数目比较

	香港 (88年底)	新加坡 (88年底)	日本 (86年底)
银行总数	158	134	282*
其中外国银行数	123	121	124
占%	78%	90%	44%
外国银行办事处数	148	47	120
股票经纪公司	739	25	214
外国经纪公司办事处	不适用	21	38
保险公司	276	105	45
其中外国保险公司	149	不适用	8

* 仅指商业银行、外汇专业银行, 长期性的金融机构, 相互银行和外国银行。不包括政府金融机构, 以及众多小型的信用金库、信用协同组合、农林渔业金融机构。

3. 货币制度。

港币是完全自由兑换的货币, 它以外国资产——外汇基金为后盾。近 6 年来, 香港一直实行联系汇率, 与一美元的比例一直保持为 7.8 港元左右。两个发钞银行每发行一批港币, 都要按此汇率在政府外汇基金中存入相应外汇, 并以此汇率与香港其他银行进行票据结算。在利率决定方面, 香港银行同业拆借利率通常跟随美元的同类市场的趋势, 而某些银行存款利率由香港银行同业公会所决定。

新加坡货币也是自由兑换的，与香港不同的只是：（1）新币以金融管理局和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外国金融资产为后盾；（2）新币的汇率是自由浮动的，但金融管理局能通过买卖外汇来影响汇率；（3）新币的银行同业拆借利率和存款利率是由市场力量自发决定的。

日元交易原则上是自由的，根据1980年底实施的改正外汇法，即使在必须限制时，也只限于最低限度的管理或调整。汇率也由市场力量所决定，只是在汇价急剧更动时，日本银行才出面进行适当干预。大额存款利率自由浮动，短期放款利率基本上由重贴现利率连动决定，公开市场利率自由浮动。

4. 银行市场。

香港与新加坡的存、贷款市场的开放程度都很大，但在外汇存、贷款占总的存、贷款比例上，新加坡比香港更有优势。在银行外汇贷款与债权占总贷款与债权的比例方面，1988年末，香港为58%，新加坡为71%；在银行外汇存款占总存款的比例方面，1988年末，香港为59%，新加坡为61%。这是日本不能比拟的。但是，在外汇资产与负债的绝对量方面，日本银行显然占有绝对地位。（见表5）

表5 1988年第四季度存款银行外汇负债与外汇资产（亿美元）

	全球	香港	占全球 %	新加坡	占全球 %	日本	占全球 %
外汇负债	52658	2695.8	5.1	2523.8	4.8	7724.2	14.7
外汇资产	50316	3097.4	6.2	2481	4.9	7336.9	14.6

资料来源：IMF《国际金融统计》1989.5

香港、新加坡和日本的国际银团贷款都很活跃，但从数量上看，香港显然略胜一筹。至1986年，香港是仅次于伦敦、纽约、巴黎的世界第四大银团贷款中心。1980—1986年，香港签定了665项，357亿美元的国际银团贷款，同期新加坡也有239项，182亿美元的交易额。当然，香港的国际银团贷款中，很多是来自日本和新加坡的。

5. 外汇市场。

香港、新加坡和东京都是世界外汇交易中心，它们同处纽约与伦敦金融中心的中介时区，又各有一二小时的差距，因此形成既互相竞争、又互相补充的关系。但在平均每日外汇买卖成交额上，三者之中日本居第一（1989年4月统计的1152亿美元），新加坡居第二（1989年头9月统计的620亿美元），香港最小（1989年4月统计的490亿美元）。②而且出现了一些银行和公司的外汇交易从香港市场转到新加坡市场的趋势，说明二者在此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

6. 债券市场。

香港的债券市场比较落后，特别是政府债券方面，由于政府奉行审慎理财哲学，以财政收支大体平衡、略有盈余为目标，所以这几年都不用发行债券来增加财政收入。公司债券目前也不到10种。不过，最近世界银行决定在港发行港元债券，对香港债券市场发展是一个良好的刺激。

新加坡是亚洲美元债券和美元浮息存款证的重要发行地。亚洲美元债券最多在1987年发行了18种，金额达13.1亿美元；美元浮息存款证在1987年发行4种，1.2亿美元。③

相对来讲，日本的债券市场比较发达，其种类有：国债、地方债券、政府担保债券、金融债、公司债、可转成股票的债券、国际债券（包括外国债券和“欧洲美元”债券）。特别是近20多年的赤字财政刺激了国债的发展，近几年每年发行额都在23万亿日元以上（见表6）。1989年2月止日本未还本的国债就达157万亿日元。④此外，凭借强大的金融资源地位，日本的国际债券业务急剧增长。日本从1985年开始就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特别是1988年末日本在海外的资产净额高达2917亿美元，年增21%，这些增加额主要归因于日本私人界购买外国金融证券和长期债券。1988年末，私人界拥有的外国长期债券达4272亿美元，年增幅为25.8%。⑤同时，日本开始在海外发行日元债券，并由此建立了欧洲日元市场，1988年从中集资超过200亿美元。⑥

表6 日本债券发行和累计量(1987)(亿日元)

	长期付息国债	地方债	公营公司债	金融债券	工业债券	可换股债券
发行量	1913.7	259.4	551.0	3012.8	130	525.6
累计量	13751.9	2043.9	4626.9	4994.1	991.9	983.3

资料来源:日本统计月报 1989.4

7. 股票市场。

香港股票市场从1986年四所合一后实力大增,并于1986年成为国际交易所联合会的会员,标志着进入国际化的新阶段。但从市值来看,香港股市在亚太区仅居第5位,排在日、台、南朝鲜、澳洲之后。此外,香港股市仍有其一些特点:第一,外国股票经纪公司可成为联合交易所的成员;第二,香港股市设有买空市场(Call options market);第三,香港股市设有第二市场;第四,中资背景的公司上市在香港股市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新加坡股市虽然上市公司不少(326家),但从市值和每日成交量来看居香港之后,其他方面与香港相比优劣互见。第一,新加坡不允许外国股票经纪公司进入,后者只能与当地证券公司合资,且股份不能超过70%,目前有9家这样的合资公司;第二,新加坡有股票买空市场,亦有股票的第二市场(SESDAQ),目前有13家较小规模的公司二级市场上市;第三,新加坡证券交易所已和美国证券交易商自动报价系统(Nasdaq)挂钩,使该系统其中32种股票可在新加坡证券交易所买卖;第四,新加坡政府鼓动非新币证券的交易,对非居民在外国证券贸易中的收入仅征收10%的税率。

东京证券交易所从市值成交量来看,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股票市场,(见表7)而且允许外国金融机构进入股市,目前已有约60家外国公司在日本设立机构,其中的22家已成为东京证券交易所会员。东京股市也有第二市场。但是,由于日本1948年设立的证券交易法受美国格拉斯—史特格尔法的影响,禁止银行兼营证券业务,即禁止银行经营公司债券的包销,以顾客为对象的证券买卖等业务,仅可经营国债包销、买卖等有限的证券业务。这使日本证券制度与世界主要国家的证券制度相脱离,致其国际竞争力有所影响。

表7 香港、新加坡、东京股市比较(1988)

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数	其中外资公司	上市股票市值(亿美元)		股票成交量	
			世界排名	12月31日总数	世界排名	总数(亿美元)
东京	1683	112	1	37890.3	1	22342.3
香港	304	22	21	744.1	16	236.3
新加坡	326	194	29	240.1	24	63.0

资料来源:证券月刊(香港)1989.7

8. 其他金融市场。

第一,金融期货市场。香港有黄金期货和恒生指数期货两种业务,1988年共成交10万手(lots)。近期可能推出港元利率期货。新加坡国际货币交易所(SIMEX)有九种金融期货合约:欧洲美元利率,德国马克,日元,英镑,黄金,日经(Nikkei)股票平均指数和三种期权(options)合约。1988年共成交290万手。特别是新加坡国际货币交易所是美国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ME)一手扶持起来的,其结算公司联保制、监察制度、不拖欠制度、保证金分立制、赔偿金制度颇为完善。日本政府过去认为期货交易的投机性很危险,对于期货市场采取保守态度。因此,东京工业商品交易所虽然是日本最大的商品期货交易所,也只有黄金、银、白金、橡胶、棉花和羊毛纱线六种合约买卖。在1988年东京开放政府债券期货市场后,日本的金融期货市场发展很快,1989年6月初增设日经指数期权市场,6月底东京金融期货市场正式营业,标志着日本已建立起包括货币、利率、债券和股票的全面的期货市场。

第二,黄金现货市场。这方面香港在亚太区独占优势。香港黄金市场是在伦敦和苏黎世之后的世界第三大市场,1988年黄金净进口量估计为480吨,高于日本的292.3吨,但是香港金市的成交活跃程

度正在减缓，而东邻地区特别是日本、台湾的黄金及贵金属市场相对蓬勃，日本商品交易所的白金买卖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对于香港金市的国际地位，较多的批评是本身实行有异于国际黄金市场的规例，包括黄金衡量单位，报价货币、市场运作、交收办法，以及金银贸易场的保守作风。但是，由于东京商品交易所对外国人的限制及金市国际化步伐仍慢，台湾金市的保守政策（如禁止黄金出口），看来一段时间内香港金市的国际地位仍不致被取代。

第三，基金管理。香港基金管理比新加坡较完善，其所管理的基金（1000万美元）也高于新加坡（200万美元），然而两地都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日本的基金管理市场比较活跃，基金种类有：家庭基金、“零存整取”型股票基金、可换股债券基金、公司债信托投资基金、中期国债基金、无分配型国债基金。

三、香港金融中心的前景与必须解决的问题

1.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仍可维持。

从上面的分析可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具有许多优势：例如，税制简便、税率较低；第二，香港银行的国际化程度不断加强，特别是在1989年1—7月，港府仍发出了11个银行牌照，说明海外银行对香港金融业的前景仍有信心；第三，联系汇率经受了游资冲击和银行挤提的考验，证明港币的基础稳定；第四，香港在国际银团贷款和欧洲货币贷款方面仍具有优势，虽然在中国贷款方面会受到暂时事件的影响，但由于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方针长期不变，特别是广东、福建和四个经济特区的外向型经济的蓬勃发展，其发展潜力始终对香港工商界具有吸引力，所以，香港仍将在中国筹集资金方面具有重要地位，从长期来看，香港的中国贷款业务会逐步恢复并得到扩展；第五，在股市方面，虽然曾有较长时期的股价疲软，但大多数上市公司业绩仍佳，且1990年前在亚太地区中香港股市的市盈率最低、息率最高，加上股市运作灵活和高度自由，因此对外资仍有较大的吸引力；此外，香港的黄金市场仍然具有独特的优势。这些优势显示出，香港金融中心的内部机制仍较健全。这些优势加上香港固有的地理条件和良好的社会条件，使香港金融中心保持国际地位具有良好的客观基础。

不容置疑，香港金融中心也有一些劣势，例如，本身包括外汇、债券和期货等金融市场仍相对落后；劳力和融通成本比新加坡高，并面临主权移交的风险因素，更重要的是，曾经突出一时的“信心问题”使人才外流，资金转移问题加深。这些劣势不可避免地对香港金融业带来影响。但是，随着中国政局的稳定发展和改革、开放方针的长期贯彻，凭着香港经济的富于弹性、灵活善变的成熟风格，加上港府的稳健的适当干预政策的努力，这些问题是可以在这段时间内有所解决的。

2. 未来亚太地区将出现香港、新加坡与东京金融中心鼎足三立、互相竞争与补充的兴盛局面。

亚太地区经济的蓬勃发展，中国经济的巨大潜力以及东南亚各国经济的良好前景为三个金融中心提供了强有力的后盾。而三地金融市场发展的历史、特点及与外界的关系将决定各自的地位和共同存在的价值。

在这三个地区中，东京金融中心立足于国内雄厚的经济实力和金融资源，目前尚属基本内向型的金融中心。但是，随着东京金融市场的正在逐步走向自由化和国际化，特别是最近进一步开放境外金融市场，“日元经济圈”的逐渐形成及正在设计的东京湾国际金融中心的新建，东京金融中心将发展为全球性的国际金融中心，并且与纽约、伦敦并列为世界三大超级金融中心。从总体金融实力上看，香港是无法同日本竞争的。但作为境外金融中心却仍具有竞争力，这是因为东京离岸金融中心建立时间不长，其自由化、国际化程度仍低于香港，而且东京土地和人力的成本高昂，外国进驻的金融机构经济效益受到影响。从另一方面看，东京金融中心的发展会给香港带来巨大的“外部效果”，例如，日本金融机构增加驻港分部，日本资金大量流入香港，并借助香港的优势组织国际银团贷款等等，因此，香港与东京金融中心在未来更多地具有互相借助、互相补充的关系。据统计，1987年末有419.5亿港元净流入到日本银行，但在一年之后却从日本银行净流入270.2亿港元的资金，联系到这一年日本建立了境外金融市场，金融国际化改革步伐加快，更说明了日本金融中心的国际化发展会带动更多资金流入香港金融市场，从而使香港扮演的资金“转口”者的角色更为重要。

新加坡与香港属“同类型竞争”，在某些金融市场很可能出现此消彼长的关系。从总体金融实力来看，目前香港金融中心仍比新加坡强大，短期内不易被取代。而在“互相补充”方面，香港金融机构在1988年底从新加坡银行业净流入421.5亿港元的资金，比一年前有所增加，说明新加坡金融中心的发展与香港有一定的互补关系。例如，某些贷款可能在香港记帐而在新加坡借出，或者新加坡从资金富裕的邻国如中东和文莱筹集资金，香港则利用较佳的条件提供投资管理服务。

3. 保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所必须解决的三个重要问题。

第一，中国大陆政治局势的稳定发展，香港社会的安定繁荣，香港<基本法>的贯彻实施，使香港最大程度地减少主权移交的不确定性风险，是保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最重要的条件。在这方面，经过“信心”上的多次反复和磨炼，香港市民将会逐步认识到，在过渡到“一国两制”的过程中，保持活力和创造力，以大多数面对现实、坚守岗位的市民为依托，用积极的态度去正视史无前例的挑战，努力创造新的奇迹，才是唯一可行之道。

第二，香港政府应该为保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有新的作为。虽然过去香港金融市场得助于港府积极的不干预政策，但新加坡金融市场由于政府的积极指导而迅猛发展也是不容争辩的事实。特别是新加坡外汇证券和期货市场直接引进国际上发展成熟的先进制度，使其国际化、规范化发展颇见成效，这些做法值得香港借鉴。在1997年之前的新形势下，港府对经济作出更多的适当干预看来是有必要的。例如，通过健全法律和行政监督制度，克服香港金融市场仍然存在的各种缺陷，大力推广新技术、新工具在金融界的运用，积极筹建跨1997年的各种基础设施工程，加强金融人才的培训和外地人才的引进，主动与中国大陆及外国加强联络，推广港内外之间的经济贸易合作与交流等。

第三，金融界人士不必因为突发事件而轻言放弃这个金融中心，亦不应沉湎于香港金融中心的某些优势而自满自足。“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未来香港各金融市场需要更加努力地自我完善结构、运作制度和管理技术。特别是证券业的发展缓慢，已成为香港金融中心发展的“瓶颈”，对此尤需进行革新和自律。这样才能从容应付东京、新加坡甚至台湾、南朝鲜金融界的竞争和挑战，给这颗“东方之珠”注入源源不断的能量。

① 证券月刊(香港)1989年1月何炳基文。

② 日本、香港的数字见信报财经新闻(香港)，1989.9.16。新加坡的数字见经济参考，1990.1.18

③ 见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统计报告。

④ 见日本统计月报(日文)，1989.4

⑤ 星洲日报(新)1989.5.27

⑥ 印尼日报(印)1989.6.14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责任编辑：黄振荣

香港与中国内地的经济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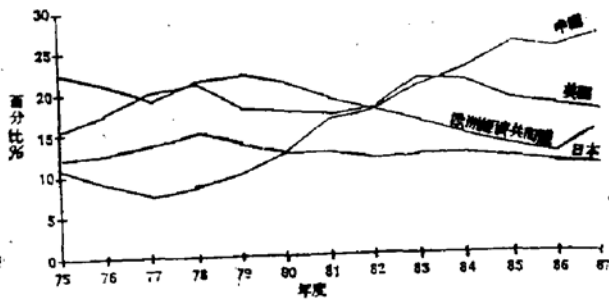
美国斯坦福国际研究所课题组

(林江译)

过去的十年，中国内地对香港经济发展的作用十分明显，这从贸易和投资的增长，香港作为转口港的重现，以及香港的制造业扩展到华南地区等方面表现出来。了解香港与中国越来越密切的经济联系及其未来走向对于形成香港经济前景的观点至关重要。

香港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联系在过去的十年里发展迅速。这一经济关系的显著发展从以下事实反映出来：1979年前，港中贸易不足170亿港元；到1988年，贸易额已增长至超过2880亿港元，增长近15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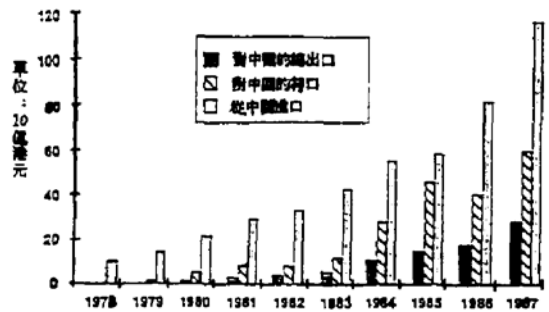
中国已经在1985年超过美国，成为今日香港最大的贸易伙伴（见图一）。中国是香港最大的



资料来源：G.T. Management PLC

图一：香港的贸易伙伴

进口来源地，最大的转口市场和港产品出口的第二大市场。从历史的角度看，1978年中国仅仅吸收香港出口的0.2%；而1988年，则吸收港产品出口近17%。同样地，十年前，在香港的进口额中，中国仅供给17%；今天则已达31%（参见图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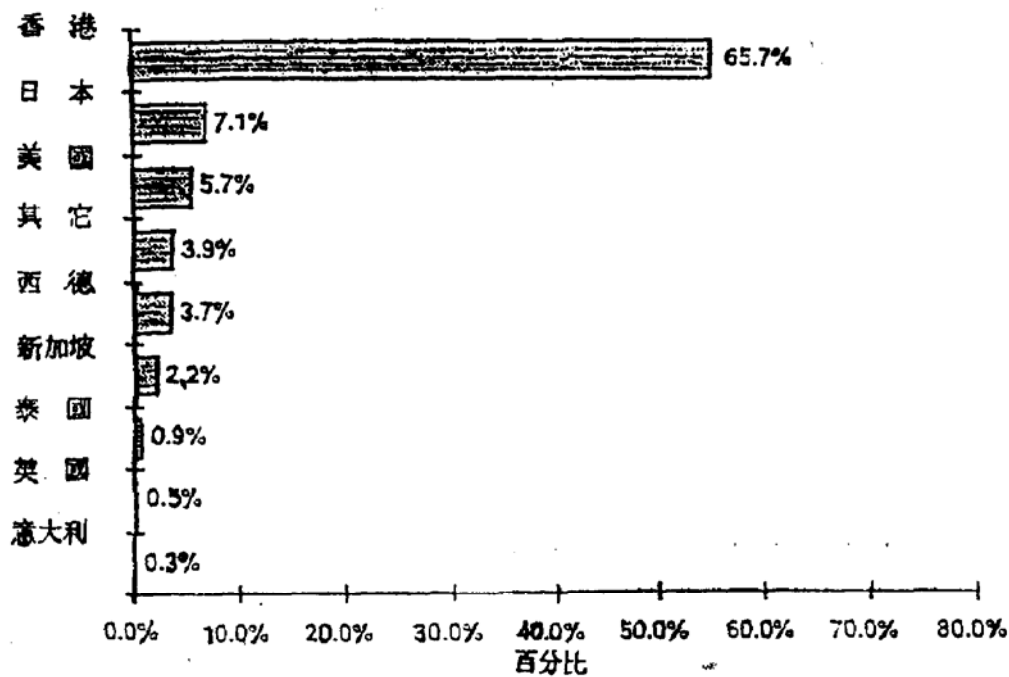


图二：中国贸易

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有近2/3的已实现的外来直接投资是由香港的企业进行的（见图

*：美国斯坦福国际研究所课题组花了10个月的时间，作出关于香港经济前景问题的研究报告《共建繁荣》。报告分四个部分：（1）香港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2）香港的经济角色；

（3）香港的经济基础；（4）香港的经济前景。本译文是其中第一部分的第三章，专门论述香港与内地的经济联系问题。译文中出现的“中国”应指“中国内地”。



資料來源：Nomura Research International, 1988

圖三：外國和地區在中國的直接投資

三)。据估计，广东省大约有150至200万工人直接或间接地受雇于香港的合资企业或外向型加工企业。

根据中国的资料来源，全港的银行存款总额中估计超过20%是存放在由中银集团经营的银行里。人们估计中国投资在香港地产、零售业务、航运以及制造业的总投资额超过780亿港元，使中国超过美国、日本，成为在香港居领先地位的外来投资者。

据估计，中国的外汇收入中有25%至30%直接来源于香港或通过香港取得。这使香港成为中国最大的外汇来源地。

每年利用香港港口设施的中国船超过3000艘次。每日往来香港与中国的货车达11000车次。通过广东省口岸罗湖进出香港的人数超过了

香港机场。

以上事实清楚显示自1979年以来香港与中国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

(1) 贸易关系

自从1979年中国不断开放贸易以来，香港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得到了发展。1979年前，港中贸易水平非常有限，但自那以后，港产品出口到中国年平均增长85%，转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84%，而从中国进口则年平均增长31%。

香港作为一个市场和一个转口港对中国同样重要。中国出口到香港的产品中近24%是在香港消费的。自1987年以来，香港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

近年转口业发展迅速，标志着香港作为一个转口港对于所在地区，特别是对于中国而言，其

重要性重新表现出来。1988年间，转口第一次超过了出口。香港在中国外贸中的作用与香港能从中国进口什么越来越没有关系，因为这受到香港消费市场规模的限制。香港的作用更多的是与香港能作些什么以促进中国的出口联系在一起。1988年，来自中国的货物中有74%又在此转口，而中国货物的转口则占了香港出口总额的47%。除了消费或组织出口外，香港作为一个接触点、营销网和外汇来源地在为中国出口业提供便利服务方面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

随着中国的发展以及中国的消费者需要更多的高档商品，香港对中国的出口将持续增长。1989年第一季度，中国超过美国成为香港最大出口市场。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由香港厂商进口然后再出口到中国的货物的转口业发展迅速。另外，作为一个转口港，香港已成为台湾和大陆间接贸易的一条重要渠道。

(2) 投资关系

自中国向国外投资开放以来，香港的直接投资一路领先，特别是在华南省份。由于兴办合资企业和外向型加工业，创办经济特区以及鼓励沿海地区的发展，直接投资的步伐加快了。1988年，已实现的香港直接投资总额约600亿港元。

香港投资华南地区企业的主要原因包括：中国比较低的劳动成本、香港劳工短缺、香港高昂的土地成本、方便出口产品到其它国家、以及开发中国的新市场。大部分企业从事为香港商人的产品加工和组装。而这些在中国的企业采取的主要方式包括合资、合作、补偿贸易、来料加工和装配。

在香港于华南地区投资不断增长的同时，中国在香港的投资也得到了大发展。据估计中国在香港的投资近780亿港元，已成为香港占领先地位的外来投资者，中资的许多投资集中在银行业、贸易和运输业，但中国也投资在制造业上。已有报导说，数家中资公司希望能在香港股票市场上市并且公开出售一定比例的股份。

中国也在加强其金融业务。1988年，中国银行集团占香港银行总存款额超过20%。据透露，1988年间中国银行在香港的存款有超过28%的增长，比香港所有接受存款机构的年平均增长率26%还要高。

显而易见，香港与中国双边贸易和投资关系越来越密切，而许多新型经济关系的焦点集中在华南地区的珠江三角洲。

以1988年工业总产值计算，广东是中国增长最快的省份，该年实际增长率超过35%，广东的出口增长了34%，达74亿元。目前广东约占中国出口总额的1/5。

在广东省境内，香港投资的大部分集中在发展迅速的珠江三角洲地区，该区包括4个市和12个县，由广东的主要河流的三角洲组成，汇集后形成珠江三角洲。

这个地区在该省最繁荣和最肥沃。据中国的资料来源显示，珠江三角洲只占该省一小部分的地域以及全省人口的16%，但1987年其工农业生产总值占全省的31%。自1978年以来，三角洲的产值每年增长21%，而全省只有17%。1987年三角洲共赚取全省收入的25%，外汇的20%，并占出口的28.7%和进口的32.6%，广东90%的外国投资集中在三角洲。

深圳和珠海两个经济特区吸引了多数出口导向的合资项目，三角洲的城市，特别是所谓“四小虎”——东莞市、中山市和顺德县、南海县则主要从事原料和半成品的加工出口。1988年香港统计署的一项调查表明，对中国出口总值的48%是提供给外向型加工工业的。

珠江三角洲实际已成为香港制造商的庞大的加工区，雇佣工人超过100万。1987年加工费总收入达30300万美元。（表一有珠江三角洲“四小虎”的比较。）

深圳是自1980年以来建立的五个经济特区中的第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深圳位于广东南部的珠江口上，南部与香港新界接壤，面积有872.5平方公里。深圳特区仅6年时间已建成五个新市区，占地48平方公里。

特区给外国投资者提供优惠政策，包括降低所得税、免除出口税和关税以及提供法律和劳务协助。中国资料来源显示，自建立特区以来，深圳从超过1200家外资企业里接受了超过46亿美元的外来投资，其中400多家属于工业制造业。40%投资在电子业，投资在纺织业和机械业的分别为7%和6%。1987年工业总产值为15.5亿美元，其中53%的产品出口。

表 一
珠江三角洲“四小虎”的经济统计比较(1987年)

四 小 虎	东 莞	中 山	顺 德	南 海
1. 主要经济指标				
(单位: 百万元人民币, 除非特别说明)				
国民生产总值(估计数)	3,498.7	2,759.0	无	无
国民收入(估计数)	2,901.9	2,195.0	无	无
工农业生产总值	3,644.9	3,830.3	3,822.0	3,787.7
——工业产值	2,921.1	3,296.7	3,443.0	3,385.6
——农业产值	723.7	533.6	379.0	402.1
消费品的零售总额	1,579.5	1,228.9	1,098.7	1,042.9
出口总值(百万美元)	263.6	210.9	126.6	无
政府收入	202.2	206.4	236.1	208.3
城乡居民存款	1,887.9	1,561.9	1,417.9	1,057.9
2. 与1986年比较的增长率(%)				
国民生产总值	29.05	35.21	无	无
国民收入	26.27	21.51	无	无
工农业生产总值	38.10	26.25	25.50	33.40
——工业产值	46.91	31.09	28.78	37.28
——农业产值	11.16	2.81	1.75	7.76
消费品的零售总额	22.17	22.52	24.80	29.60
出口总值(百万美元)	12.61	13.90	113.40	无
政府收入	26.32	12.40	14.80	8.79
城乡居民存款	43.73	48.65	49.70	53.48
3. 人均主要经济指标(人民币元/人)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2,754	2,530	无	无
人均国民收入	2,324	2,013	无	无
人均工农业生产总值	2,919	3,513	4,383	4,280
人均农村人口的净收入	1,039	1,134	无	1,296
城镇工人的平均工资	2,067	2,259	无	2,124
人均可支配收入	1,265	1,127	1,260	1,178
人均政府收入	162	189	270	235
人均储蓄存款	1,512	1,432	1,626	1,873

备注: 1. 出口总值包括外贸部门、加工来品以及外资独资企业、合作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的出口。

2. 工业总产值包括乡镇企业和村办企业。

3. 无 = 该项资料空缺。

资料来源: SHK研究有限公司

珠海经济特区位于珠江口西岸，澳门以北，离香港36英里，占地面积15.16平方公里，中国资料来源显示，1986年底，珠海特区已经与215家合资企业签约，涉及金额19亿美元。目前该特区有400家企业，主要从事电子和纺织业。1987年总产值为8亿美元。

与出口导向为主的经济特区不同，“四小虎”已发展成为香港公司的加工和装配中心。位于珠江东岸、距深圳100公里的东莞市，占地面积21464平方公里，分成34个工业卫星镇。1987年东莞的总产值为8亿美元，比1984年增长了4倍。该地区有超过148家中外合资企业和3000多家加工和装配企业，其中大部分从事轻工业，食品加工、电子和纺织业。据中国资料来源，1987年东莞赚取了2.66亿美元的外汇，成为中国赚取外汇最多的地区之一。从广东的其它县来东莞合资企业工作的工人超过20万。

中山市占地面积168平方公里，离广州约80公里，其港口距香港50英里。中山拥有100家中外合资企业，签订了8000份外商加工合同，有4000多家工厂从事纺织、电子、化工和轻工业等行业的生产，1987年的总产值为10亿美元。

佛山市占地面积3808平方公里，位于珠江三角洲的腹地距香港245公里。佛山下辖南海和顺德两县。1987年总产值为40亿美元，有2000多家企业使用外资以及有1700多家企业为外商从事加工业务。主要工业包括纺织、电子、塑胶和食品加工业。南海拥有60多家合资企业，出口总值达2000多万美元。顺德有合资企业100多家，400多家企业从事加工工业，总产值为10亿美元；顺德在家用电器和塑胶业方面发展尤为迅速。

整个珠江三角洲正迅速发展成为一个与香港企业相联系的制造业中心。无论是特区内的从事出口制造业的合资企业，还是参与为香港企业服务的外向型加工合作企业，这个区域的发展有力地显示了香港与华南地区拥有经济潜力去发展两地越来越密切的经济联系。

(3) 一种新型互补关系的因素

香港与华南地区之间互补性的关键因素是香港的资本基地和企业家管理与中国的劳动力和土地结合起来。香港目前正面临劳工短缺、土地费用高昂的困扰，而华南则可提供低成本劳动力和土地的便利条件（参阅表二）。中国不仅需要外国投资带来的资本、管理专才、市场营销技术和

设计才能，而且也需要通过增加出口来赚取外汇。

表 二
1987年香港与珠江三角洲年平均工资
(单位：港元)

香 港	45,876
深 圳	5,621
珠 海	4,395
东 莞	4,340
中 山	4,340
佛 山	4,168

资料来源：香港统计年报、广东省统计年报。

1985—1988年间，随着香港外部需求剧增和劳工短缺日益严重，这种互补关系使香港的制造商在中国扩展了操作业务，并通过合约方式完成特别加工和装配任务。这个体系迄今尚未受到经济放缓或衰退的检验，难以确定在中国或香港的业务哪一部分易受其害。

除了土地和劳动力因素之外，珠江三角洲拥有一个开放、灵活的环境而可提供比中国其他地区更优越的条件。一般来说，在资金的优惠以及减少繁文缛节方面，经济特区和“四小虎”已试图给外国投资者提供一个具吸引力的商业气候。

在此我们把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作一个比较。中国的资料来源显示，珠江三角洲20%的工业是出口导向企业，通过加工产品销往海外赚取外汇9000多万美元。而在长江三角洲，所有工业中这个数字只有4%，创汇2000万美元。两区最主要的差别不在于其地理位置，而在于它们对外部世界的相对开放度。两个地区的政府对于外国投资的政策、官僚机构作风以及行政控制方面是有差别的。

随着1978年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对外开放，香港与华南的经济联系开始发展。使到这种联系持续发展的一个因素是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这是沿海地区出口增长、外国投资和外向型加工活动增加的结果。在放宽政府管制、刺激外国投资以谋求出口导向的沿海地区发展方面，广东一向表现最为积极。结果，广东借助与香港这种日益密切的经济关系繁荣起来了。

总之，一系列促进因素促成了香港和华南的经济联系。香港高昂的土地费用、相对于珠江三

角洲的高工资以及劳工短缺推动了制造商进入华南。与此同时，一个较为灵活的商业环境、较多的企业精神以及政府对经济监管程度的降低，直至目前为止，吸引着投资者前往华南。

(4) “华南经济区”正在崛起

随着互利的经济联系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一个包括福建、海南、广东、澳门及香港在内的“华南经济区”的机会是存在的。这个拥有一亿人口的区域之大，足以抗衡大部分亚太地区国家。这个区域除了具有成为一个外向型加工出口中心的潜力之外，也足以成为一个重要的内部市场。

福建具有许多与广东相似的土地和劳动力优势，海南则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包括稀有金属矿产）以及作为一个旅游胜地拥有天然的吸引力。海南已经被确定为自由贸易区，管制甚至比经济特区还要少。从海南出口将可免税并不受出口配额限制，而外国投资者将有权进口货物以供生产和作业之用，也可以把他们生产的货物出口而不受政府的管制。把海南作为一分子纳入这个正在崛起的华南经济区将进一步加强这个区域的经济。然而，目前海南尚未得到足够的发展以实现与区域其它部分真正的互补性。

这一区域经济能否得到发展的关键因素是政治方面的。北京对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承诺以及允许沿海省份拥有相对自主权的政策对于整个区域的发展至关重要。尽管人们对有需要去监管这些省份之说表示担心，但这种区域发展模型对整个中国带来的益处是巨大的。这个充满活力的华南经济区域除了可以带来产出、收入和出口的增长外，还可以成为全国的示范区，显示如何吸收外国投资和技术。

在另一方面，香港也应该认识到华南经济区对香港的将来越来越重要。香港制造业和金融业

的前景以及作为一个转口港，是越来越紧密地与这个经济区的将来联系在一起。现在，香港必须采取步骤，在华南地区更广阔的范围为经济发展奠定强有力的基础。

在考虑华南经济区的发展时，还必须考虑台湾因素。一些观察家认为台湾与该区域的联系将日益密切，把台湾的技术和制造业的本领融合在这种新型的互补关系中。台湾加入华南经济区后将会使该区的人口基数与日本相若（1.2亿），地理面积也跟日本相当（370万平方公里）。

台湾省与中国大陆的贸易和投资关系近年来通过香港作为转口地，已大为宽松。台湾省、中国大陆和香港的贸易总额已从1983年的100亿美元增长至1988年的460亿美元（港中贸易是370亿美元，台湾贸易是79亿美元，中国大陆与台湾省贸易是13亿美元）。

中国三个省（广东、福建和海南）、香港和台湾省的比较优势和劣势使她们有很大的潜力成为经济发展的伙伴。这就是把台湾的技术和制造业、连同香港的市场营销技术和资本与广东和福建的丰富的土地和劳力、以及海南的矿藏资源联成一块。此外，沿海城市的迅速发展会给香港和台湾创造新的市场。然而，台湾与华南经济区一体化的过程需要慎重，因为必须要克服众多的政治障碍。同时，香港将可以继续作为台湾贸易和投资的第三者渠道。

尽管最终形成上述经济区域格局的可能性颇大，但可能实现这个目标须在2000年之后，与此同时，香港可从这个区域成员逐步的一体化过程中得到益处。

译者单位：香港招商局集团研究部
责任编辑：黄振荣



香港汇率制度变化的前景与可能性选择

杨杰明

(一)

由于港元与美元挂钩，美国经济和美元走势对联系汇率制度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美国经济在里根任内取得了显著的成就，70年代困扰美国的经济停滞和通胀加剧并存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并获得了80年代经济的持续增长。但同时造成的财政与外贸“双高”赤字又给布什政府留下了难题。布什如何解决这两个棘手的难题成了人们所关注的焦点，也成了美国经济和美元汇价何去何从的关键。

由于布什上台后执行的仍然是里根经济政策的翻版，所以就目前美国低失业率、高通胀和经济过热的情况来看，布什政府在近期内既不会实行高度紧缩的政策来进行经济的调整，也不会放手增加货币供应量，以免通胀复燃，比较可能的是，采取一种中间性的局部调整政策，即既着手财政紧缩，以减少预算赤字和贸易逆差，又不会过分收缩银根，大幅提高贴现率，而是保持适度的利率水平和相对宽松的货币供应，以刺激经济增长，并吸收一定的外资流入以弥补逆差。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个人消费仍可保持一定的水平，而出口订单由于美元贬值而增加，因此一般估计在一段时期内美国经济仍可维持低增长，通胀率大致保持略高于去年的水平。当然，在西方经济严重失衡的情况下，也不能完全排除出现这样的可能性，即由于美国经济失衡的严重发展，在一定条件下，意外地造成西方金融货币市场的巨大冲击，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调整经济政策，最后导致经济危机。但就一般情况而言，美国经济以至整个世界经济在90年代中不会出现衰退。

目前，在美国面临经济增长放慢，还有通货膨胀压力的同时，其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仍然十分庞大，因而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美元汇价

弱势地位难以扭转。但如果没有特殊的意外因素出现，美元兑西方主要货币汇价可望在目前的低水平上保持相当长时期的稳定。主要原因在于1988年美国对外贸易赤字有较大幅度的削减，这使美国暂时不需要借助美元进一步大幅度贬值来刺激出口，而美元回升又将对美国出口增长和外贸赤字的进一步改善不利，这种形势将使美元兑主要西方货币汇价能够处于相对稳定状态。此外，美国将继续与西方主要国家进行经济政策协调以进一步维持美元汇价的相对稳定。1988年4月的七个工业国财长会议再次重申了联手稳定美元汇价的立场。而事实上，西方各主要工业国都害怕美元再大幅下跌，因为再听任美元大幅下泻，将影响各国的经济增长，甚至带来衰退。可见，美元汇价今后的长期走势尽管仍然趋降，但会处于相对稳定状态。

对香港而言，由于现行联系汇率制度的关系，其货币政策势必追随美国而作相应的调整。通过以上对美国经济及美元汇价走势的分析，我认为在整个香港经济过渡时期内，如不出现大的经济波动，香港现行联系汇率制度是不会改变的。当然，这种乐观不是毫无根据的。其理由，首先是来自于对尽管财政、外贸双赤字缠身的美国经济及世界经济的乐观。正如哈佛大学国际事务研究中心主任塞缪尔·亨廷顿所说：“第一，1982年以前，美国的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并不十分严重；第二，这种局面的转变已经开始，并可能加快；第三，赤字和消失赤字的过程需要美国政府付出重大的代价，但毕竟是有望克服的”。其次，就历史上来看，也是有先例的。过去港元亦曾长期与英镑挂钩，并随英镑的弱势而下跌，期内只在英镑正式贬值时调整过固定汇率。但港币兑英镑的固定汇率制却保持了长达30多年，直至英镑危机

恶性发展才改变。因此，如无不可预料的事情发生，将来即使美元继续下跌，只要不是暴跌，港币就有可能随美元跌下去，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现行联系汇率制度。预想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相信美元不至于积弱成英镑第二。

(二)

任何一国(地区)金融管理当局对汇率制度作出重大的改变，往往是因为原制度存在着某种无法克服的缺陷，或是其机制不足以抵挡某些突如其来的事变所致。换句话说就是原有制度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从近年来香港经济的稳定发展和对美国经济以及美元汇价走势的乐观预测来看，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并没有走到非要变革不可的关头，而且港府也一再强调不会放弃联系汇率制度，并采取了一系列的积极措施来加强此制的实力。我们之所以对香港汇率制度的走向进行预测，只是希望从理论上探讨假若未来有一天随着各种因素的变化而最终导致联系汇率制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关头时，香港可供选择的几条道路。

现行联系汇率制度变革可供选择的途径无非以下四条：

第一，仍保持现行的港元兑美元之固定联系汇率制，但使联系汇率水平上调；

第二，象1974年11月一样，恢复浮动汇率制；

第三，改与美元挂钩为与另一种货币挂钩的固定联系汇率制；

第四，改与美元单一货币挂钩为与一篮子货币挂钩的固定联系汇率制；

对于第一条途径，即既保持港元与美元的固定联系汇率制度，但使港元汇率上调来说，这可以满足美国政府要求港元升值的愿望，但对香港的经济却有较大的影响，而且负面居多。因为：(1)港府自联系汇率制度实施以来一直强调保证不改变现行汇率，并多次成功地抗击了炒汇风潮，港府的保证可谓深入人心。一旦现行汇率有所变动，不但会使国际炒汇集团大获其利，而且会令港府失信于大众。(2)改变联系汇率会引起外汇市场巨大波动，投机盛行。当今国际金融市场的游资总量超过了3万亿美元，这是一股非常庞大的力量，港币汇率的变化必定会助长投机者投机港币汇率的欲望，这不但不利于香港的实业投资，而且香港经济似乎也承受不了如此巨大的冲击。(3)汇率变动对香港的进出口贸易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港元

升值，会令香港的制造商、贸易商提高成本，削弱港币的国际竞争能力，易引起外商延期付款，要求减价，甚至退货，减少或取消合同订单等问题，给进出口贸易带来不便。(4)美元存款者受到直接的冲击，会造成人们抛售美元或资本外移的后果。(5)作为国际旅游城市的香港，因港币升值，会使其旅游业受到一定影响。

综上所述，这条路看来对香港经济影响甚大，是港府最不应付诸实施的。

第二条途径是恢复浮动汇率制，对此唱赞歌的人不少，认为：(1)1983年10月由浮动汇率制改为港元与美元挂钩的固定联系汇率制度主要是为了当时由中英关于香港前途问题会谈引起的港元狂跌风潮，现在既然政局已告稳定，前途已经明朗，联系汇率制度的使命也就完成了。(2)联系汇率制度是强制性的，这与港府所奉行的经济不干预政策格格不入，而浮动汇率制度才是市场经济自由发展所应施行的政策。(3)联系汇率制度的基础是美元币值必须相对稳定，波动较小。但是目前美国“双赤字”十分严重，而且美元疲弱之势在短期内是不可能克服的，如果要坚持目前7.8港元兑1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势必令港元成为人们抛售的对象货币，这就会令港元过多地投放到流通领域，加速香港的通货膨胀，使其成为美国输出通胀的对象，而对此危机即使利用利率杠杆也无法克服。这个危机可谓已是“山雨欲来”。

但话又说回来，就目前香港而言，我认为实行浮动汇率制肯定是不适宜的。因为正如前文分析的那样，香港没有中央银行，港元的货币发行量只有通过利率的升降及发行7.8港元必须有1美元的外汇储备，进行双重控制。港元强势，则利率下降；港元疲弱，则利率上升。如果实行浮动汇率制，则失去了此双重控制的功能。

当然，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防止国际游资对港元的冲击，但是由于没有固定联系的比价，不仅容易因投机引起汇率的暴涨暴跌，增加国际贸易对外报价与成本核算的困难，而且会造成外汇市场的混乱。香港作为世界主要的金融市场之一，这势必加剧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更为严重的是，由于砍去了发行7.8港元必须有1美元的外汇基金存款的限制港元货币发行的一个有力措施，从而使控制港元发行量更为艰难。由此看来，目前恢复浮动汇率制度在香港是不适宜的，至少在建立有效的货币发行机制以前，恢复

浮动汇率制度将弊多益少。1974年11月至1983年10月浮动汇率制度对香港经济的冲击至今人们仍历历在目。

第三种选择是改与美元挂钩为与另一种货币挂钩的联系汇率制。但这种选择是无法实现的，也是不现实的。因为当今世界上还没有哪一种货币具有取美元而代之的实力。而且就香港而言，可以说，如果取消了港币兑美元的固定联系汇率制度，就意味着应取消港元兑某种单一货币的固定联系汇率制，这种说法是不过分的。

第四条道路是选择建立与一篮子货币挂钩来代替与单一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这不失为港元汇率制度除现行汇率制度外的最好途径。万一由于种种不可预测的意外发生而使港元兑美元的固定联系汇率制度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之时，如果将港元跟与香港贸易联系最密切的，并对世界金融影响最大的几个国家的货币，如美元、日元、西德马克、英镑等四种货币组成的货币篮子挂钩，形成每天对各种货币挂牌价的结构，将港元对货币篮子的汇率维持在特定的水平上，从而使现行的固定联系汇率制度下稳定港元与美元的汇率发展为港元与货币篮子的汇率相稳定的结构，这将使得港元汇率在总体上变得更易稳定，既可以减少外汇市场的波动，而且又能很好地反映在国际金融中篮子货币的地位，有利于香港经济的稳定和发展。至于实行港元与一篮子货币挂钩的固定联系汇率制度的具体操作及其作用将继续在下节作粗浅的探讨。

(三)

要实行港元钉住一篮子货币的固定联系汇率制，首先港府必须选定货币篮子的成分货币及相应的权数，然后从这几种货币的汇价和权数，计算出一个加权平均值 (Weighted Average)，然后宣布把港元与这一加权平均值实行固定联系。这是说在新的汇率制度下，这个加权平均值代替了旧汇率制度下的所谓“7.8港元汇价”。

成分货币及加权数的选订，要端视每种成分货币对香港经济的重要性，通常可以将香港对外贸易或结算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国家之货币来组成货币篮子。对于香港而言，在其对外贸易或结算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货币大致是：美元、日元、英镑、西德马克及人民币等几种货币，但由于人民币本身就是一种汇率盯住货币篮子的、不能自由流通的、在世界贸易或结算中没有什么地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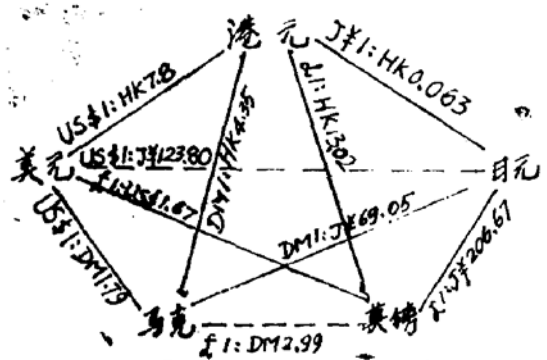
货币，因而不适宜选入货币篮，故在港府选定的货币篮中主要应包括四种货币：美元、日元、英镑和西德马克。这四种货币本身就是世界货币体系中最重要，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货币。至于这四种货币的加权数可根据该货币国在对港贸易中所占的地位或由该货币在对港贸易结算中所占的地位而定。在此，我倾向于用前者，即用香港对某成分货币国的贸易额，在香港对所有成分货币国家的贸易总值所占的百分率作为该货币的加权数。所有加权数的总和应等于1，即100%。

例如，假设美，日，英，西德四国对香港的贸易额比例为4：8：2：1，而当时的汇率为——
 $US \$ 1 : HK \$ 7.80$;
 $DM 1 : HK \$ 4.35$;
 $J ¥ 1 : HK \$ 0.063$;
 $£ 1 : HK \$ 13.02$ 。则加权平均值可以用以下方式计算出来：

$$\begin{aligned} 7.8 \times 0.4 &= \$ 3.12 \\ 0.063 \times 0.3 &= \$ 0.02 \\ 13.02 \times 0.2 &= \$ 2.604 \\ 4.35 \times 0.1 &= \$ 0.435 \end{aligned}$$

HK \$ 6.179

图一、各成份货币彼此的汇价



右上图一显示了当时各成分货币间的汇率，因为有国际间的套购活动，所有的货币汇率会成比例。

根据以上的各种汇率，所计出的加权平均值为HK \$ 6.179，表示现时一篮子货币兑6.179港元。

假设港府选订以6.179港元与所选定的一篮子货币挂钩，港府便宣布美元的官价为7.8，而发钞银行便要以此汇率作指导性汇率与商业银行兑换港元钞票，其作用与现行联系汇率制相同。

若美元对其他货币贬值或升值，会影响到港元兑其他货币的比价。当美元对其他货币贬值时，港元对其他货币亦贬值；相反，当美元对其他货币升值时，港元对其他货币亦会升值。

假设美元对其他货币贬值10%，而与港元汇率保持不变，经过套购之后，各种汇率就如下图二所示。港元则相应地对西德马克贬值11.3%，对英镑贬值11.1%，对日元也贬值11.1%。

现在港元兑一篮子货币的平均加权值已变成6.519港元，具体做法是：

$$\begin{aligned} 7.8 \times 0.4 &= \$ 3.12 \\ 0.070 \times 0.3 &= \$ 0.021 \\ 14.469 \times 0.2 &= \$ 2.8938 \\ 4.842 \times 0.1 &= \$ 0.4842 \end{aligned}$$

HK \$ 6.519

图二、美元兑其他货币贬值10%



可见，港元兑一篮子货币的平均加权值下跌5.5%。

为维持6.179的固定联系平均加权值，港元兑美元的汇率就得更改，要计算出港元兑美元的新汇率，假设其为X，解出下列方程式的X即可：

$$\begin{aligned} (X \times 0.4) + (4.842 \times 0.1 \times \frac{X}{7.8}) + (0.070 \\ \times 0.3 \times \frac{X}{7.8}) + (14.469 \times 0.2 \times \frac{X}{7.8}) = 6.179 \\ X = 7.393 \end{aligned}$$

所以，要维持以6.179港元与一篮子货币的固定联系汇率，港元兑美元的汇率必须变为US\$1 : HK\$ 7.393，即升值5.22%。当港元兑美元

的汇率有所变化时，套购就会发生。最后，港元兑马克、英镑和日元也会成比例地变动，为此都应乘以一个比例系数（X/7.8）。图三显示了港

图三、调整后的汇率



元兑美元之升值5.22%后，所有汇率的变动。若要找出港元对西德马克和英镑以及日元的贬值情况，只需比较一下图一和图三的数即可。港元兑马克由4.35变为4.589，贬值5.49%；港元兑英镑由13.02变为13.714，贬值5.33%；港元兑日元则由0.063变为0.066，贬值了4.76%。

由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若实行港元兑一篮子货币的固定联系汇率制，港元就不会太过于受美元汇价的影响。若美元对其他货币贬值，则港元将会对美元作少许升值，而对其他货币作少许贬值；而美元对其他货币升值，则港元也会对美元作少许贬值，而对其他货币作少许的升值。这样就使港元浮动的压力分散化而呈现相对稳定，这是有利于香港经济稳定发展的。

其次，如果实行港元兑一篮子货币的固定联系汇率制度，投机活动的压力便会减少。政府可以根据需要而调整美元的官价，但港元兑一篮子货币的固定联系汇率却是固定的，而这个与一篮子货币的固定联系汇率因建立在对各成分货币的汇率浮动的基础上，故这将因各成分货币的汇率变动有相互抵消的功能而处于相对稳定的地位。这样港元在世界货币体系中，既不会过于强势，也不会过于疲弱，这将使投机者无从下手投机。

再次，在港元兑一篮子货币的固定联系汇率制下，自动调节功能仍然存在，港府仍无需干预，套购会维持其固定联系汇率于指定的水平。港府仍旧有充足的外汇储备。发行港币时，发钞

银行以一篮子货币兑港元的固定联系汇率水平（如上例是6.179）向外汇基金上交美元等外汇以换取债务证明书来发行港币。当然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即一篮子货币兑港元的汇率是固定联系的，但货币篮内的成分货币汇率则是浮动的，发钞银行应分别以多少数额的各成分货币上交外汇基金以换取债务证明书呢？这个问题至今仍未有很好的解决办法。不过就我个人认为，发钞银行的外汇储备只要按照货币篮内各成分货币的权数之比例进行管理，就可以不会受到汇率波动太大的影响。因为货币篮内各成分货币，或者这种货币升值，而其他货币贬值了，或者相反，但升贬值经市场套购的结果是相互抵消的，最终仍能保持固定联系汇率如6.179的水平。所以如实行发钞银行的这种外汇储备管理将能预防各成分货币浮动带来的风险，从而保证港元兑一篮子货币的

联系汇率制度之运行。

综上所述，港元兑一篮子货币的联系汇率制确实具有使港元对各成分货币保持总体上的汇率固定，各别上的汇率则按照实际情况小幅度浮动的优点。同时，这种一篮子货币联系汇率也可以与利率浮动一道控制港元发行。但这种汇率制度亦存在许多诸如操作相对复杂等弊病。所以我认为非不到万不得已，现行联系汇率制不会改变，这也是港府一再坚决强调的。在这里我只是从理论上对与一篮子货币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之可行性作一粗浅的探讨，说明在一旦现行汇率制度因种种原因而无法维持时，采用港元兑一篮子货币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亦不失为一条可行之路。

作者单位：广东省华侨实业投资公司
责任编辑：黄振荣



释《离骚》“忽忽”

江林昌

《离骚》“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王逸注“日又忽去，时将欲暮。”后人遂遵王说而引申曰，“忽忽，疾行貌。”实误。今按，此“忽”当与“暮”近义，作幽暗解。试论之：

屈赋中“其”“之”诸字常用作连词“而”（“之”“其”“而”古音同属之部，故音近义通）。则“其”前后之词，其词性往往相同而词义相近似。如“纷总总其离合兮”，“忽纬緌其难迁”。“总总”即“离合”，“纬緌”即“难迁”。类此者甚众，兹不赘举。同理，此句“忽忽”与“暮”亦当为同义词，共明“日”之状态。

余疑这“忽”为“晷”之借字，《汉书·古今人表》：“仲忽”作“仲晷”。《汉书·扬雄传》：“时人皆晷之。”均“晷”与“忽”互借之例。《中华大字典》：

“晷，尚冥也”，《说文》段注：“冥者，幻也，幽也。”《老子》第二十章“俗人昭昭，我独若昏兮，俗人察察，我独闷闷兮，忽（晷）兮其若晦，恍兮其若无所止。”这里“忽（晷）”与“昏”“闷闷”“恍”同义，与“昭昭”“察察”相比对。是“晷”为昏昧义也。又汉《樊敏碑》“奄晷灭形”，“晷”作幽暗解更著。姜尧夫师指出，忽忽（晷晷）“皆与时间、年岁之词相连，形容时日悠悠忽忽，去于无形也。”（《屈原赋校注》）

“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意谓我想要稍稍停留在这灵琐之前，但太阳却昏暗下来黄昏即将降临。于是下文紧接着便命“羲和弭节”，“望崦嵫而勿迫”。如此，则文气畅达而无碍了。

论舆论监督向权力监督转化

张继红

舆论监督在当前整个廉政工作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但如何强化舆论监督，特别是怎样把舆论监督及时转化为权力监督，使之真正发挥作用，却尚未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本文拟就这一问题，谈几点粗浅看法。

一、将舆论监督转化为权力监督才能使软监督变为硬监督

舆论监督是公民通过报刊、电视、广播等新闻媒介表达具有普遍性的意见，对党务、政务以及其他公共事务所实行的一种监督。作为运用舆论力量促使国家政治生活沿着法制和社会生活共同准则的轨道运作的一种社会行为，舆论监督毫无疑问要特别重视宣传廉政建设中的好典型、好经验，对一切正面的东西加以褒扬和鼓励。但它更主要的是依据法律或社会公德，正义凛然地揭露、批评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的种种腐败现象和违法违纪行为。它的最高层次及其最主要的形式是批评。由于舆论监督是用舆论的力量而不是别的什么力量来进行监督，它所批评揭露的问题要得到有效解决，还得依靠国家机关及其有关职能部门的权力监督。这是因为：

第一，舆论监督具有及时性、公开性、广泛性和民主性，但却缺乏强制性。既没有党委纪检部门依据党纪对腐败现象进行处理的权力，又不具有司法监督所具有的那种法律效力，也不具有行政监督运用行政权力的性质，因此，它不是党和国家强制力的硬性监督和控制，而是一种软性的监督和控制。它有批评监督权，但没有行政处分权，更没有法律惩处权。舆论监督这一特点，决定了它所揭露的问题，一般要通过有关权力部门运用行政的、纪律的或者法律的力量才能够得到处理。

第二，舆论监督有别于上下之间大权力对小权力的纵向监督，也不同于有关部门之间的横向制衡。实施监督行为的新闻舆论单位与监督对象一般较少存在权力管辖范围或行政隶属上的关系。因此，在舆论监督没有转化为权力监督时，其效果往往取决于被监督者思想觉悟的高低。觉悟高的，看到批评报道可以改进工作，纠正不正之风，处理违法乱纪的人和事；觉悟低的，则可以置之不理甚至倒打一耙。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借助于权力监督对监督对象施以强制力的监督，舆论监督的作用才能得到充分体现。

第三，目前我国舆论监督的发展处于初级阶段，监督机制尚待发育成熟，相当部分干部群众对舆论监督的意义和作用不太了解，特别是有些干部民主意识薄弱，对舆论监督缺乏应有的心理承受能力，不能正确对待舆论批评，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对舆论监督产生抵触情绪，自觉不自觉地阻挠这一监督的实施。据此，舆论监督要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就更需要有关权力部门的密切配合和大力支持，及时对新闻舆论界反映出来的问题、批评，予以高度重视，并采取有力措施切实解决。

总之，舆论监督对腐败现象、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的批评、揭露，如果不能及时转化为权力监督，那么，舆论监督就会失去意义，终归是“纸上谈兵”。也就是说，舆论监督要不流于形式，就应该和权力监督紧密结合起来，促使前者向后者转化。

二、建立健全有关制度，推进舆论监督向权力监督转化

舆论监督要顺畅地转化为权力监督，最主要的是要有一个良好的民主气氛浓厚的社会环境，这里，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的民主意识和民主作风的培养树立是十分重要的条件。

舆论监督转化为权力监督，另一个关键环节在于有关监督机构和其他权力部门要积极配合，同时要有配套的制度和措施。纪检、监察、检察、审计等监督机构以及其他有关职能部门，是依照宪法、法律和党纪、政纪实行权力监督的主要部门。这些部门应高度重视和充分利用舆论监督覆盖面广、渗透力强、信息反馈准确及时的优势，对舆论监督批评揭露的问题，象接力赛一样把“接力棒”接过来，及时做好监

督的衔接、转化工作。为此需要理顺舆论监督与权力监督之间的关系，建立健全衔接、转化工作的有关制度。

首先应当健全对舆论监督的专门受理查处制度。这些年来，对舆论监督批评揭露的问题，有关监督机构和其他权力部门没有建立起专门的受理查处制度，或是制度不完善、不明确，或多或少存在推诿、扯皮、无人负责的情况，这不仅不利于舆论监督向权力监督转化，而且挫伤了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因此应完善有关制度，逐步建立起一整套有效的办法。有关监督机构和职能部门要按照管辖范围和“归口处理”的原则，对舆论监督批评揭露的问题，及时收集，建立档案，专人负责，认真调查，做到有报必查，每报必查，并分别以检查、审查、纠处、惩处等工作方式及时解决。凡核实清楚的，不管是谁，该处分的处分，该撤职的撤职，该法办的法办，绝不心慈手软，养痍遗患。特别是要敢于碰硬，对那些大案要案抓住不放，并选择有普遍意义的按一定程序把查处结果由新闻媒介向全社会公布。建立专门的受理查处制度，不仅能解决舆论监督揭露的问题的程序规范化、制度化，而且有利于提高廉政工作的效率，加快廉政建设的步伐。

其次，建立舆论监督的反馈制度。对舆论监督及时反馈，是将其转化为权力监督的具体表现。有关部门应定期对前一段落实办理新闻媒介舆论批评的情况进行认真检查，并及时向新闻舆论单位加以反馈。需要公开答复的决不遮丑，需要内部答复的决不拖延，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结果。特别是对所有公开揭露的重大问

题，更要公开交待处理结果。

第三，建立舆论监督的质询制度。舆论监督公开批评、揭露的有影响的重大问题或案件，新闻舆论机关可通过人大、政协、人民团体或由以上机构对有关部门和单位定期质询，以监督案件的查处和问题的解决。

建立健全以上制度，完善舆论监督向权力监督转化的配套措施，从而完善权力制约机制和综合监督机制，就能够在制度上保证两种监督之间的相互配合，相互支持，携手并进，保证舆论监督、群众监督的合理意见通过正当途径为有关国家机关采纳和处理，这对加强监督、促进廉政建设将起着积极的作用。

三、强化法律机制，保障舆论监督向权力监督转化

舆论监督向权力监督转化，要成为廉政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中一种制度性的可以长期发挥作用的东西，还需要有健全的法治原则和规范，以保证这种转化的整个过程都纳入法律调整范围，严格依法进行。为此迫切需要加快新闻立法，强化法律机制，保障这种转化的良性运行和发展。强化法律机制，应该侧重在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切实保障公民和新闻舆论单位依法行使舆论监督的权利和自由。

一是保障公民和新闻记者的知情权。党务、政务、公共事务和一切为公众注目的人和事，新闻舆论单位都享有真实报道权和公正评论权。因此，应继续公开办事制度和办事结果，在有利于政治稳定、经济稳定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增加透明度，为舆论监督组织立体透明的评头品足提供

充分条件。二是保障记者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各种渠道获得各种新闻材料。记者有权采访各种公开会议及其活动，被采访者在法律允许范围内有义务提供材料。三是保障公民和新闻舆论单位的批评权。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据此应具体规定公民和新闻记者根据法律和社会公德报道、评论生活中的各种不良现象，特别是揭露抨击不正之风、违法乱纪事件和各种腐败现象的权利。除此之外，关于建立舆论监督受理查处制度、反馈制度和质询制度，包括被批评者对新闻舆论单位的批评有作出答复的义务，也应用法律形式规定下来。切实保证人民群众和新闻舆论单位的以上权利，并用法律予以规范，是舆论监督得以转化为权力监督的最基本因素。对此新闻立法应尽快提供行为依据和法律保障。

第二，有效制约公民和新闻舆论单位滥用舆论监督的权利和自由的行为。

由于党风和社会风气的不良因素的影响，加上有偿新闻的出现，新闻报道的公正和准确都会受到影响，这就不可避免地会给舆论监督带来困难和阻力。因此，新闻立法应该具体规定舆论监督主体的责任，坚决防止其在实行监督过程中侵犯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和公民的合法权益，以保证公民和新闻舆论单位既能依法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又能在法律的制约下十分审慎和负责地进行舆论监督工作，从而保障舆论监督向权力监督转化时方向对，步子稳，少差错。这种制约主要应体现在规范、引导公民和新闻舆论单位行使舆论监督时必须正确处理好以下关系：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开展舆论监督的关系。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也是开展舆论监督必须遵循的政治方向。舆论监督应有利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而决不是相反。那种认为舆论监督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的认识，是极端错误的；任何违背四项基本原则、损害安定团结的舆论监督，都应该反对。

——动机与效果的关系。必须明确舆论监督的目的是惩治腐败，搞好廉政，增强党和政府在人民中的凝聚力，舆论监督中的揭露、批评或评论，决不能凌驾于党和政府之上，站在党和人民的对立面来进行所谓“监督”，而是要着眼于帮助改进工作，解决问题，因而应该是诚恳的，与人为善的，认真负责的，有建设性的。如果不是出于这种动机，而是为揭露而揭露，为批评而批评，甚至为了猎奇，为了展示和渲染落后现象而有闻必录或不顾社会效果随意乱报，那就很难说会取得好效果。

——权利和义务的关系。开展批评报道是新闻单位和记者的权利和职责。但他们的社会责任不仅体现在揭露和批评上，也表现在维护国家、社会、集体和公民的合法权益上。一张报纸、一本刊物，读的人千千万万；任何事一上广播电视，听的人、看的人也是千千万万。如批评报道失实，有可能对受指责者造成伤害。因此舆论监督应严格遵循“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批评事实要准确，抨

击现象要真实，绝不能捏造或夸大。如报道失实出了差错，应实事求是地更正或采取其他补救办法，同时允许反批评。新闻报道的依法进行并接受社会和公众的监督和批评，是权利和义务有机统一的推进器。

——公开和保密的关系。舆论监督公开揭露、抨击各种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以达到对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行监督，但这种公开决不能与保密相悖。属于国家法律和政策规定保密的，要坚决保密；不属保密范围的可以公开。决不能只顾公开、强调透明度而自觉不自觉地泄露了国家秘密，又不能不适当地强调保密，限制了国家政务公开和报刊的公开报道，阻碍了舆论监督的进行。所以应把公开和保密有机地连结起来，明确保密范围，又不影响正当的新闻公开。

概而言之，法律对舆论监督的保障和制约是统一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相因相生、相辅相成的关系。只有致力于建立起保障和制约功能齐全的法律机制，使舆论监督主体的权利同国家、社会、集体和公民的合法权益在良好的法律环境中维持着一个适度的张力，它们两者共存一体而又能和谐地发展，舆论监督才能够积极健康地向权力监督转化。

作者单位：广东医药学院马列教研室研

责任编辑：石成

广东省党校系统

讨论加强党政干部学哲学的意义和方法

通讯员郑俊钦、刘波报导：广东省党校系统1989年哲学年会于1989年12月5日至8日在江门市召开。与会专家、学者就中央提出全党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意义，以及如何落实这一任务进行了研讨。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党在理论上的提高，是党的领导的正确性、科学性的根本保证。因此，中央提出干部学哲学，既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又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有的同志认为，干部学哲学一是为了国内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需要；二是迎接国际共运中某些社会主义国家急剧变化的挑战；三是迎接国际敌对势力“和平演变”战略的挑战。因此，当前学哲学的一个最根本目的，是在国内建设和国际交往中更好地贯彻党的政治路线。

有的同志把当前学哲学的重要性概括为三个需要：（1）弄清理论是非、搞好治理整顿的需要。（2）统一思想认识的需要。（3）提高干部素质的需要。

与会学者认为，必须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整个马克思主义体系的理论基础的意义上，以及哲学是世界观、方法论的高度上来认识学哲学的重要性。当前新情况新问题错综复杂、千头万绪。这些问题的解答涉及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许多

学科，但能从最一般规律的高度上给予解答的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正确分析和解决当前实践中的种种问题，必须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即借助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伟大的认识工具。有的同志认为，中央强调学哲学，是针对前段时间某些领域存在的唯心主义泛滥，形而上学猖獗，非理性主义、实用主义、经验主义流行的状况而提出的。前段时间社会普遍存在的“短期行为”、对生产力标准的庸俗化理解、“跟着感觉走”等都可以从这里找到认识论根源。因此，只有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干部头脑，才能坚持实事求是，反对主观片面性；坚持唯物的辩证思维，克服非理性主义。

与会者认为，这次学哲学与以往两次学习具有以下不同的特点：

（1）从党的思想路线看，延安时期学哲学是要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清除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1978年学哲学破除“两个凡是”，是要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这次学哲学是要解决在改革开放时期如何正确贯彻执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继续反对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

(2) 从政治路线看,延安时期学哲学是要解决怎样形成和完整贯彻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路线。1978年学哲学是要形成新时期的基本路线,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使我们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这次学哲学是为了解决如何坚决、自觉、全面贯彻“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反对两种倾向,坚持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渡过难关,迎接社会主义的新的发展的时期。

(3) 从对干部的思想要求看,延安时期学哲学是要把全党干部的思想统一到为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民主革命胜利这一任务上来。1978年学哲学是要使全党从个人迷信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统一到改革开放之路上来。这次学哲学是要把全党尤其是中高级干部的思想集中统一到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上来。

有的同志认为,三次学哲学的特点是:第一次学哲学是我党第一代领导核心开创了全党广大干部学习和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新局面。第二次学哲学是第二代领导核心带领全党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第三次学哲学是第三代领导核心将带领全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与会者认为,要使这次学哲学取得较好的效果,就必须加强学习中的针对性:一是学习对象的针对性,二是学习内容的针对性,三是学习方法的针对性。同时,要进行必要的社会调查,才能对不同层次干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水平,以及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等有个准确的认识,只有这样,干部学哲学才能收到较好效果。

弘扬孙中山精神,高举爱国、统一、进步旗帜,造福中华、造福人类。

孙中山基金会在中山市成立

本刊记者林有能报道:酝酿、筹备多年的孙中山基金会,在孙中山先生逝世65周年之际成立,成立大会于1990年3月11日在孙中山先生的故乡中山市翠亨村隆重举行。中共广东省委、省政府、省顾委、省人大、省政协、新华社澳门分社、广州市、中山市等的负责同志以及香港、澳门、台湾、日本、美国等地区和国家知名人士、学者共300余人出席了会议。省政协副主席、孙中山基金会副会长祁烽主持了会议,省顾委常委、孙中山基金会会长欧初致开幕词,卢钟鹤副省长宣读了广东省省长、孙中山基金会名誉会长叶选平的讲话,基金会顾问蚁美厚、霍英

东、马万祺、何鸿燊、吴桂显、孙穗芳,副会长谢明仁、陈锡祺以及日本孙文研究会代表中村哲夫等分别讲了话,充分肯定孙中山为中国革命所作出的贡献,赞颂他的爱国精神。会上,基金会向与会顾问颁发了聘书。大会收到全国各地及港、澳和美、日等地区和国家贺电、贺辞100余封。在成立大会开幕前,全体与会者还在孙中山故居举行了孙中山逝世65周年的纪念活动;成立大会闭幕后,召开了孙中山基金会首届理事会会议,商讨会务开展事宜。成立孙中山基金会这一盛举,必将有力地推动孙中山研究的发展和中华文化的弘扬。

国务院四部委八学会联合开会研讨 山区优化开发综合治理

本刊记者谭湛明报导：建国以来首次由林业部、农业部、水利部、国家民委、广东省和全国8个学会联合主持召开的全国山区优化开发综合治理研讨会，于1989年底在广东省韶关市召开，有关部门的领导、专家、学者董智勇、边疆、石山、卢良恕、梁昌武、刘兆伦、马西林、关君蔚、任继周、杜竞一、何永祺、王平、马恩成等出席了会议，广东省委副书记郭荣昌、省农委主任陈白、韶关市委书记冯灼峰、市长高祀任等领导同志和来自全国各地的有关代表共200多人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主要就如何挖掘山区潜力，改变山区目前的落后面貌，在总结山区开发治理的典型经验的基础上，探讨对不同类型山区经济发展的出路，在政策、理论、技术上作出科学的分析，提出合理的建议。这是我国多学科、多部门综合探讨山区生态、经济问题的首次大型研讨会。

与会的领导、专家、学者和代表，经几天的参观考察研讨，对广东省，尤其是韶关市从1985年以来优化山区开发和综合治理的成就进行了高度的评价。中国林学会会长董智勇同志说：近几年来，广东省把工作重点转到山区上来，提出靠山养山，治山致富的指导思想，制定了加快山区发展的政策措施，使山区建设取得了很好的

成效，韶关山区的巨大变化就是一突出成功的例子。他认为：韶关在治山致富的实践中开拓了一条崭新的路子，韶关的做法是符合当地的自然环境和客观规律的，今后沿着这条路走下去，韶关一定会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局面。他十分感谢广东为全国树立了一个好的样板，并说如果全中国都能象广东这样，那么全世界就风景这边独好了。农业部农业政策研究会会长边疆则评价说：韶关的农业可概括为“立体开发，领导先行，综合经营，多元结构，全面发展。”

与会代表认为：综合治理和开发建设山区的问题过去一直得不到高度重视，今后应将其提到国民经济建设的重要位置上来。中国的山区（包括丘陵和高原）占国土总面积的69%，蕴藏着多种多样的生物资源，绝大多数矿产资源、水能资源都集中在山区，然而由于资源利用不合理，很多地区长期进行掠夺性开发，致使生物资源衰退，矿产资源浪费，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恶化，造成综合治理的难度加大。在我国，丢掉了山区，就丢掉了平原和城市。

与会代表提出：应制定“因地制宜，统一规划；林草为本，综合开发；优化结构，重点突破；综合治理，协调发展”的

山区开发建设的总方针。山区是一个自然生态同社会经济相结合的生态经济系统，建设好山区必须在统一领导、统一规划之下，协调各个部门各尽其力。同时要因地制宜地选定当地最能取得生态经济效益的资源，重点突破进行多层次的系列开发，以求生态经济协调发展。

与会代表进一步强调：山区开发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应当把它作为关系到我国国民经济前景的一项重大的课题来加以研究。并提出以下对策：

1. 中国人口多、耕地少的矛盾日益尖锐，不能再将农业发展长期地维系在有限的耕地范围之内，应着眼于山区农业资源的合理开发，避免再走毁林开垦的老路。

2. 各级政府应建立山区经济发展基金，进行多渠道集资。国家和地方的资金用于农户无力承担的交通、水利、农田基

本建设等大型项目的扶持，同时鼓励农户进行有效的劳动积累。

3. 鼓励科技上山，对在山区工作和进山区工作的科技人员实行优惠政策。高等院校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要把山区作为教学与科研的基地。

4. 山区的经济政策要放宽，对山区农户不是国家规定所摊派的税费应停止征收；对重复征税的项目应当免除；新开发治理的项目应当在有收益后免税三年。

5. 建议国务院成立山区综合开发治理领导小组，并指定国家计委成立山区综合开发治理的办事机构，以便协调有关部门的工作。

6. 建议由国家科委将山区综合开发治理列为国家重点课题，先行进行综合规划布局 and 各个不同类型区综合开发治理模式的研究和试点工作。

香港著名实业家、广东历史学会、

广东华侨历史学会、广东地方志学会荣誉理事

姚美良先生约请广东文史学界人士共商 纪念中国近代史开端150周年事宜

今年是中国近代史开端（1840年鸦片战争）150周年，为了缅怀一个半世纪以来为国家民族独立而奋斗的先贤，弘扬民族精神，振兴中华，广东省将举办一系列

纪念活动，进行近代史暨爱国主义教育。广东省政协委员、香港南源永芳集团公司董事长姚美良先生决定赞助五项重要活动：

一、赞助举办“纪念中国近代史开端

150周年”活动，举办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1990年12月，广州），出版图片集、论文集和纪念专刊；

二、筹办“伟大的爱国者林则徐史迹展览”；

三、主办“纪念黄遵宪先生诞辰142周年国际书画篆刻展览”（1990年10月，广州）；

四、赞助出版《孙中山年谱长编》及“孙中山与亚洲国际学术研讨会”（1990年8月，中山），论文集；

五、进一步协同海内外各方，倡办林则徐基金会。

为了做好纪念活动的筹备工作，姚美良先生于1月18日下午约请广东省文史学界人士共商有关事宜。出席座谈会的有省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黄浩、杨应彬、张江明、肖如川、唐瑜、王善荣、黄勋拔；文史学界专家教授关山月、楼栖、吴宏聪、陈锡祺、张磊、陈胜舜等60余人。

姚美良先生热爱中国历史文化，崇敬历史伟人。为弘扬民族精神，发展中华文化，近年来先后为内地文化教育福利事业的发展，捐赠人民币2000多万元。在内地投资2亿多元人民币，是一位引人注目的后起之秀、著名的爱国青年实业家。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40周年的国宴上，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称赞他为故乡和内地做了许多好事，并向他祝酒和合影留念。

为表彰姚美良先生热爱中国历史文化的精神，广东历史学会、广东华侨历史学会和广东地方志学会在座谈会开始时，宣布了学会的决定，聘请姚美良先生和他的顾问梁通先生为荣誉理事。姚美良先生和梁通先生欣然接受了聘书。姚美良先生在致词中说：“今天，广东历史学会、广东华侨历史学会、广东地方志学会聘请我和我的顾问梁通先生为荣誉理事，我感到非常荣幸和高兴！因为从此以后，我会有更多机会向各位专家教授请教，增进我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了解，因此，我和梁通先生非常感谢诸位的感情美意！但我们能不能当好这个理事？实在没有把握。不过，对弘扬中华文化，纪念历史伟人的事，我们还是很乐意理的。我常常想，小至一个人，办一件事，大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兴盛，没有精神支柱是不行的。纪念历史伟人，弘扬中华文化，就可以增强我们的精神支柱……广东是中国近代史开端之地，过去得风气之先，今天改革开放又走在前头。今年应该怎样纪念这一伟大的历史开端？我能力有限，但愿尽点绵力。‘马’年就快开始了，凡是我可以理又能够理的事，我愿意‘一马当先’；我衷心祝愿纪念中国近代史开端150周年的倡举马到成功！出现一个万众一心，振奋民族精神的‘万马奔腾’的新局面！”

（李鸿生）

梁士诒功过评说纷纭

通讯员张富强报道：在1989年12月召开的梁士诒史料征集研讨会上，与会者对活跃于清末民初中国政坛上的风云人物梁士诒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就下列问题发表各自的见解：

一、关于对梁士诒的定性。一种观点认为，梁士诒长期追随袁世凯，权位显赫，有“二总统”之称，为袁世凯的反动统治和改制称帝竭尽犬马之劳。袁世凯倒台后，又在北洋政府担任过显要官职，曾被孙中山斥为“帝制罪魁之一”，“伪国务总理”，并明令全国通缉之，可见在政治上他是个反面人物。另一种观点认为，把梁视为彻头彻尾的反面人物，是不够客观的，如果将其政治生涯以1923年为界，显然有个从前期反面人物到后期中间人物的转变过程。第三种观点指出，梁是个极其复杂的人物，仅用反面或中间人物来定性不足以对其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纵观其一生的政治态度，可发现他从赞成共和、敦劝清帝逊位——倒行逆施、支持袁氏恢复帝制——反对张勋复辟、同情和支持孙中山广东护法政权、和平统一南北的活动轨迹。因此，只有对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经历作出具体的分析，才有可能对他的一生作出全面的、客观的评价。

二、关于梁士诒的经济活动。一种观点认为，现有的材料表明，无论在经营铁路、办理金融、主持海关或是创办实业等

方面，梁士诒都受到为早日实现中国富强的愿望的激励和驱使。他视教育与实业为改造中国之根本方策。“教育者，所以充其精神，实业者所以裕其物质，而政治即令其精神物质充裕之手段而已。”这一观点，无论从当时或在目前来分析，都是有一定道理的。至于他在长期从事经济活动中所表现的经济思想、理财经验，以及进行经济建设的许多原则和做法，更是有许多值得研究、批判和借鉴的东西。另一种观点认为，梁士诒虽称不上一位爱国主义者，但也有一些爱国的言行。他在向外国筹措借款时，从未卑躬屈膝出卖过国家权益。相反，他提倡均衡外交，反对倒向某一列强，并有为国家争还主权的行為，例如，将哈尔滨戊通航业公司收归国有，就是他倡议并促成的结果。

三、关于梁士诒与孙中山的关系。一种观点认为，梁士诒虽因为政治上的原因受过孙中山的指责和通缉，但这并不影响他与孙中山之间的合作。1923年初，孙中山为重建广东根据地，特邀梁士诒“共襄国事”，梁即予以响应，除了答应派旧交通系要员叶恭绰等人辅佐孙中山，还以“局外人”的身份，在香港帮助孙中山筹措借款，并在粤、奉、皖三角反直同盟的活动中起了较为活跃的作用。另一种观点认为，梁士诒和孙中山同是广东人，由于政治立场的不同，分属地主官僚资产阶级和

民族资产阶级而服务于各自的阶级，但另一方面，他俩在政治思想和立场的“大异”之下也有某些方面的“小同”，这就导致孙梁之间能在晚年维持一种不亲不疏、不冷不热的关系。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无论从

民主意识、爱国热情，或是智慧魄力而论，梁士诒都根本不能与孙中山相比，但梁是一位理财能手，在经营财政、金融和交通事业方面的成就，则超过了孙中山。

广东省中国语言学会学术代表团访问澳门

通讯员韦恩报导：应澳门中国语文学会邀请，我省中国语言学会学术代表团一行六人于1990年1月7日——11日到澳门进行学术访问。代表团由省中国语言学会会长詹伯慧教授担任团长，学会顾问黄家教教授、副会长唐启运教授、李新魁教授，理事陈垂民教授及省社科联秘书长梁渭雄同志随团出访。

代表团在澳门广泛接触语文界人士，互相交换学术信息，沟通对当前穗、澳两

地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澳门中国语文学会为广东同行的到访组织了学术座谈会，会上由詹伯慧作关于广东省中国语言学会近几年来开展学术研究、学术活动情况的专题发言，梁渭雄也向与会澳门朋友扼要介绍了我省社科联的情况。

代表团还访问了澳门日报和澳门东亚大学，受到报社李成俊社长、李鹏翥总编辑和东大薛寿生校长、李天庆副校长等的热情接待。



基层企业党组织如何发挥政治核心作用

——广东韶关第一棉纺织厂的调查

黄广保 张硕城 梁桂全 郭基亮

企业在实行厂长负责制之后，既要保证厂长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中心地位，又要发挥企业党委的政治核心作用。它们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如何协调配合？这是治理整顿、深化企业改革中提出的新问题。韶关一棉厂近几年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的探索，并取得了一些经验，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集中体现在理顺党政工关系中发挥党的政治优势

韶关一棉厂党委认为，企业实行厂长负责制，厂长理所当然是企业经营管理的中心，而企业职工代表大会，代表着广大工人阶级管理企业的权力，是实行企业民主管理的基本保证；企业党组织，是党在企业中的基层单位，是党的方针政策在企业中得以顺利贯彻的重要的保证，是党领导企业的具体体现。要使它们之间依照企业的运作规律，各得其所地充分地发挥各自的作用，就必须理顺关系，形成合力。作为党委，其政治核心作用集中体现在政

治优势的发挥之中。这种政治优势主要是，在实行有计划商品经济和改革开放的同时，保证企业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保证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在企业中得以贯彻，保证工人阶级的在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保证企业在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具体做法主要是：

1. 要充分发挥党委在方向、方针、政策方面的保证监督作用，但对具体的生产经营活动不越俎代庖。1985年开始，该厂由党委领导下的厂长分工负责制过渡为厂长负责制。当时，职工群众还按以往习惯办事，遇到问题，总是向党委请示汇报；厂长也常把党委当作自己行动的拐杖，不敢大胆决策，有时贻误了时机。为了使厂长的经营决策又快又准，党委对如何发挥保证监督作用作出如下规定：保证不包办，监督不旁观，支持不迁就，还权不卸担。并着重把好两个关：一是把好企业的方向关，保证企业按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办事，在实行商品经济、搞活经营的同

时，保证企业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二是把好用人关，对干部的任免奖罚，按干部管理权限，采取分线提名，集中研究，共同考察的办法。对干部的使用注意群众公论，不管哪条线的干部，意见不一致时，不匆匆忙忙地下结论。

2. 要找准党委的工作位置，管到点子上，避免越轨撞车。他们确定了党委工作的三个位置：一是在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党的建设方面处于核心位置。按照党要管党的精神，他们先后开展了党史教育，还开展了“重温入党志愿书”、“了解党，热爱党，跟党走”、“我为党添光辉”、“好歌献给共产党”等活动。二是在生产经营方面处于“参谋”位置。即在厂长决策前，搞好调查研究，掌握市场信息，摸准企业底数，为厂长提供参考意见；在厂长决策中，献计献策，使厂长决策符合实际，又不违反政策；在厂长决策后，深入实际，了解动态，反馈信息，提出改进或修改意见，减少失误。三是在矛盾协调方面处于“中枢”位置。厂长全面负责后，成了各种矛盾的交汇点。在这方面他们也规定了几条：当厂长有了成绩时，争当“报春花”；当厂长遇到困难时，甘当“铺路石”；当厂长工作受阻时，愿当“清道夫”。

3. 要强化企业党委的监督功能，决不能缩手缩脚。“党要管党”决不是“党只管党”，党的保证、监督职能，相互联系，缺一不可。这些年来，该厂党委始终保留了对生产、行政工作的参与权、建议权、批评权。他们与厂长商定做到：企业的重大决策未经工厂管理委员会讨论，不拍板；企业的重要方针、规划计划未经职代

会审议，不定案；企业的调资、奖金、奖罚等方案未经职代会同意，不出台；有关福利基金使用、房屋分配、职工生活福利未经职代会作出决议，不实施；对民主评议中群众意见大的干部不重用。前几年，在加速企业转轨变型中，厂部从工作需要出发，从工人中招聘了一批经营人员。但由于侧重考虑业务专长，忽视思想素质，致使一些被聘对象在营销业务中出现渎职违纪行为。党委坚持选聘人员的标准要德才兼备，招聘手续要完整齐备，对其中不符合条件的人员要及时调整。厂长接受了意见，完善了有关措施，解聘了不称职的人员，保证了经营队伍的纯洁和健康成长。

实践证明，他们这样做，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党委并没有因为实行厂长负责制而坐冷板凳，党的工作和作用，比以前更加集中，更加明确，广大工人、干部心目中，党委的地位不是降低了，而是更重要了。

加强党组织自身建设，增强党组织的活力，是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基础

该厂党委认为，党组织的政治优势，根本上来源于党组织自身的政治素质和活力。因此，他们积极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努力提高党组织的思想政治素质，增强活力。

1. 抓好党员的思想建设，提高党组织的战斗

党的思想建设是党的建设的核心。只有一支思想觉悟高的党员队伍才具有强大战斗力，才能带动干部、职工建设四化。前些年，由于受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自由

化思潮的影响，少数党员动摇了自己的信念，有的对待工作大利大干，小利小干，无利不干。针对这些情况，他们在党的建设中，以确立共产主义信仰为主要内容，采取了几种方式开展教育。

一是灌输与疏导相结合。1986年，他们从本厂挑选了十二名政工干部，每人一课，每月一讲，整整用了一年的时间，对全厂党员正面灌输党的基本知识。与此同时，他们还用形象直观的办法，进行疏导教育。如请来了老山前线的战士，让他们讲“猫耳洞”里的理想；请本厂标兵上台，讲“老黄牛”的精神。报告会一场接一场，聆听者一批接一批，理想的火花在党员心中再次燃烧。几年来，全厂党员中涌现出“老黄牛”、“女铁人”、“红管家”、“活雷锋”等先进典型25个。职工群众以典型为榜样，爱企业，求进步，讲贡献。

二是引导和防范相结合。1985年，该厂一些青年党员多次要求厂党委办舞厅，搞舞会。党委认为，对此只能引导，不能压制。他们不仅办起了舞会，而且党政领导干部同群众一起跳舞。健康有益的业余文化生活使党员和群众心理上的满足转化为巨大的生产热情，使该厂从低谷中走了出来，被评为市的先进企业。这件事使他们悟出了一个道理，对党员的合理要求，如果引导得当，党员的积极性就会象原子反应堆一样接二连三地迸发出来，企业的工作将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同时，他们认为，引导不应忘记防范。引导得法，本身就可以起到防范的作用。他们通过组织“舞姿美、服装美、语言美”的“三美”评比活动，就较好地防止了舞会上一些低级庸俗的东西滋生蔓延。他们

还通过党纪教育，党风监督举报，外事纪律教育等一系列防范措施，防患于未然。该厂党员干部出国考察或出境办事，一律要到厂纪委接受一小时的外事纪律教育，这已成为制度。由于防范得力，该厂干部在境外从未发生过丧失人格、人格或违法乱纪的现象。

三是寓教于文与寓教于乐相结合。他们组织党员成立读书小组，读马列、读党史；举行“党的知识知多少”知识测验，在全厂党员大会上当场答辩或摇奖；开展“我为党旗增光辉”演讲比赛，发动党员写自己、讲自己，自己教育自己。与此同时，还拨出一定的经费，把党日活动与郊游、登山、野炊、渡江、联欢等结合起来，教中乐，寓教于乐。1988年“七一”之夜，该厂七个党支部组织党员联欢。当联欢会上唱起“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支歌时，台下的观众都情不自禁地唱了起来，成了几百人的大合唱。一些老党员含着热泪说：“好久没见过这场面，好久没听过这支歌了”。

2、抓制度建设，提高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吸引力。他们先后建立健全了党的“三会一课”制度，党员思想汇报制度，党员考察评议制度，预备党员考察制度，建党对象培养制度，纪委工作制度，党风、厂风监督举报制度等等。为了使这些制度落到实处，他们从1986年起便实行了思想政治目标管理，将这些制度分解成工作指标，落实到科室、支部、小组和个人，每月一考核，每季一评比，半年一小结，年终一表彰。经考核，一次不合格者限期整改，两次不合格者黄牌警告，三次不合格者追究领导责任，促使各级党组织聚精会

神地抓好党的建设，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都明显提高，不正之风得到了抵制。有一次，某建筑队的工头为了把厂里的一项工程要到手，送了一封信给主管副厂长家，里边有2000元。当这位副厂长回家看到信后，马上把钱全部交给了厂纪委。

几年来，全厂每年吸收新党员近四五十名，厂的标兵中党员占了80%。

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把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落实到广大群众之中

该厂党委认为，只有使每个共产党员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才能在广大群众中树立起党组织的良好形象和威信，才能使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落到实处。因此，他们要求全厂党员，都要做到“为党争光、为厂流汗、为民谋利”，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来影响带动职工。

1、带头做爱厂如家的铁心人。纺织作业三班倒，被人说成是“白天不见太阳，晚上不见爹娘”，不少人总想离开纺织厂。针对这种情况，他们要求党员带头做爱厂如家的铁心人，以自己的模范行为影响群众、教育群众。共产党员、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纺织工业战线劳动模范司徒桥同志进厂16年如一日，以苦为乐，以厂为家，铁心爱厂的事迹已成为新工人进厂的活教材。每次招收新工人，他们都组织一些党员给新工人上好入厂第一课。年复一年，坚持不懈。

2、做多纺快织的带头人。女共产党员何爱芬心红手巧，多纺快织，是该车间首先实现月超千斤年过万的女能手。1987年，她休产假5个月，同年统计产量时，她仍

然保持自己创下的纪录。象何爱芬这样的能手、标兵，全厂有56个，其中党员占了67%。榜样的力量是无声的命令，党员带了头，群众跟着上，姐妹们都不甘落后，一个“比、学、赶、帮、超”的竞赛热潮便在工厂里形成发展。这也是该厂的生产年年上新台阶的重要原因之一。

3、做为群众排忧解难的热心人。在该厂，职工遇到困难，有了忧虑，总喜欢找党员，找干部。这是因为该厂的党员乐于为群众排忧解难，雪中送炭。为使这些工作落到实处，他们建立了谈心家访制度、为职工贺岁制度、节日慰问制度、调解工作制度，逐步做到制度化、经常化，每年都涌现不少党员关心职工的好人好事。

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是最扎实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它使该厂的生产面貌和职工的思想面貌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仅1985—1988年间，就有6个产品获省优，1个产品获部优，优质产品产值率达56.53%，产品畅销香港、日本，远销欧美。更可喜的是一支“四有”职工队伍茁壮成长。几年来，该厂有56人次破省行业操作纪录，49人获省操作全能或单项标兵，有7人次分别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优秀政工干部、全国工会十一大代表、团中央候补委员、全国纺织工业战线劳动模范和全国纺织系统优秀政工干部。该厂还向省内外兄弟企业输送人才265人，其中调出后担任经理、厂长的20人。韶关市有纺织企业11家，其中6家的厂长、经理或书记是从该厂调去的。

作者单位：中共韶关一棉厂党委
广东省委政策研究室

责任编辑：晨一

《辩证逻辑概论》评介

陈先达 赵总宪

最近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刘景泉教授的著作《辩证逻辑概论》一书。这是一部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述思维辩证法即辩证思维方法论的新著。

逻辑哲学问题既是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逻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用唯物辩证法研究思维形式及其规律和方法所发现的思维辩证法，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辩证逻辑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正确和深刻理解思维辩证法，才能正确和深刻理解当代辩证逻辑所研究的思维形式及其规律和方法的具体内容和特点，才能准确地阐发和表达辩证逻辑的内容，才能恰当地评估辩证逻辑对于现代科学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概论》作者着重从中外辩证思维发展史和黑格尔的《逻辑学》与马克思的《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辩证逻辑理论及应用著作出发，探讨了思维辩证法的内容和特点。这种探讨对于加强辩证逻辑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尤其在当前存在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作用的思想倾向的情况下，这种探讨还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在探讨过程中，作者尽力如实反映辩证思维发展史的原貌，挖掘黑格尔《逻辑学》的合理思想，阐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辩证逻辑理论与方法的原意。与此同时，作者还针对近几年来探讨思维辩证法的不同学术观点，发挥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并对不同观点作了简要评论，这无疑对于我国学术界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指导下，开展百家争鸣，活跃学术空气，加强辩证逻辑研究将发挥促进作用。

《概论》共分绪论、思维规律、思维形式和思维方法四篇，共计14章，25万余字。绪论篇讨论了辩证逻辑的对象和实质，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

的关系，阐述了辩证逻辑产生和发展简史。作者将辩证逻辑定义为运用辩证法研究思维的科学；提出了逻辑与历史的关系是辩证逻辑基本矛盾的观点。作者将辩证思维发展史分为古代朴素的辩证思维、唯心主义的辩证思维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三个基本阶段。作者在肯定形式逻辑作用的基础上，着重指出了形式逻辑的局限性和学习辩证逻辑的意义。思维规律篇阐述了辩证法基本规律的一般内容和辩证逻辑基本规律的具体内容以及辩证逻辑基本规律与辩证法基本规律的关系。作者主张辩证法的基本规律是辩证逻辑的基本规律，而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作为思维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又具有其运用于思维领域的特点，认为从抽象到具体、逻辑与历史统一不只是辩证思维的重要方法，而且是辩证思维的特殊规律。

思维形式篇在回顾研究思维形式历史的基础上，讨论了概念、范畴、判断、推论和假说诸种思维形式的辩证法。作者考察了亚里士多德逻辑、斯多葛学派逻辑、弗·培根的逻辑、数理逻辑思维形式理论的主要内容及其研究方法的基本特点，着重指出黑格尔建立的辩证逻辑学是内容和形式统一的逻辑，是运用辩证法研究思维形式的结果，其基本内容是阐述各种思维形式的内在联系和相互转化，进而分析了《资本论》逻辑中内容和形式的辩证统一关系，其内容和形式的相互转化，内容和形式联系的多样性；强调指出，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研究思维形式的根本区别在于二者所运用的观点和方法不同。作者认为，要正确把握概念的本性，必须用辩证法的观点和方法去揭示概念的矛盾，概念是现实世界辩证运动的反映，矛盾是概念的本质因素；而形式逻辑不容

许思维中存在矛盾，认为概念只把各种现象中的共同点抽象出来。形式逻辑规定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之间有反比关系；而辩证逻辑规定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之间成正比关系。作者阐述了辩证逻辑关于概念运动三个环节的特点、相互关系以及研究概念运动三环节的意义。作者指出，只有坚持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和方法，才能正确地、科学地把握范畴的实质和体系；认为辩证逻辑的范畴论应当研究本体论范畴、规律性范畴和认识思维范畴这三大系统的范畴。作者提出，辩证逻辑所说的判断是对客观事物矛盾本性进行断定的思维形式，是概念与推理的逻辑中介。作者详细地评述了黑格尔将判断分为实有判断、反思判断、必然判断和概念判断四类的判断分类思想，认为这种分类法总结了人类思维发展过程和规律。作者认为，推论是判断与概念的统一，辩证逻辑推论要遵循实践性、具体性和矛盾性三原则；辩证逻辑应将推论分为实有推论、反思推论和必然推论三类。思维形式篇还讨论了假说的重要性、特点和种类，指出假说是科学发展的形式，分析了假说向科学发展的过程，强调指出假说要有客观依据，假说要反映客观世界的矛盾以及把实践引入假说的必要性，提出假说可分为自然现象假说、社会现象假说和哲学假说三种。

最后思维方法篇讨论了研究方法、叙述方法和验证方法。作者认为，研究方法包括调查、观

察、比较、抽象、矛盾分析等方法，研究要透过现象认识本质，要抓住因果关系的链条，要把握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相互转化，要把握必然性与自由的相互制约关系，进而阐述了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的辩证关系。作者认为，叙述方法包括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和系统方法，主张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只是叙述方法不是研究方法。作者阐述了逻辑与历史的涵义及其相互关系，一般系统论的基本原则和方法，〈资本论〉和系统论的关系，指出〈资本论〉的科学体系是从抽象到具体的体系，是体现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体系。作者认为，验证方法包括实践检验和逻辑论证；实践检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实践标准具有确定与不确定二重性；有些问题实践无法直接检验，需要逻辑证明才能确定其真理性，逻辑证明的基础是实践，逻辑论证能指导和丰富实践检验、促进实践检验发展、使实践检验具有理论形态。

〈辩证逻辑概论〉的出版将会在我国哲学界、逻辑学界和科学方法论界引起反响，将成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学和科学方法论的很好的参考书籍。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范英



珠海市体育服务总公司



本公司是全民所有制(下属企业部分是中外合资)企业,是工业、商业、服务、广告、保健、卫生等多功能经营的综合性公司。现与国内20余个省、市及港、澳、台建立了经常性业务来往。愿与各地客商在平等互利基础上进行来料加工或合资合作经营,为繁荣特区经济作贡献。



总经理: 孙志强
地 址: 珠海市香洲区人民
中路胡湾体育场
电 话: 224091 228698
222352
电 挂: 7555
邮 编: 519000

总公司下属珠海文体用品中心,批发、零售文化体育、科教、旅游工艺品、服装等,商场内设名牌体育用品部,兼营进出口代理业务。

经 理: 李艳辉
电 话: 226430
电 挂: 7555



总公司下属珠海体育服务总公司经营部,全方位多种经营,代理多种进出口业务,经济效益显著,信誉良好。

经 理: 高 晶
电 话: 332325
电 挂: 7555



请用正宗化州橘红系列药品



橘红痰咳液



(膏、冲剂)

全國首創 · 最新產品

荣获广东省
技术开发成果奖

祛痰定喘疗效高
寒咳特别好

本品以中国著名特产——正宗化州橘红等10多种名贵药材炼制而成的纯中药制剂，用于各类疾病引起的痰多咳嗽气喘，疗效显著，深受国内外患者欢迎，畅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老少可服。

国内经销：

广东省药材公司工业经理部

电话：883077

电挂：1055

邮政编码：510120

广东省中药研究所监制



中国 化州中藥廠 广东

厂址：广东省化州县宝山路

电话：22978

电挂：2720

邮码：525100

粤卫药宣字（1989）05第119号